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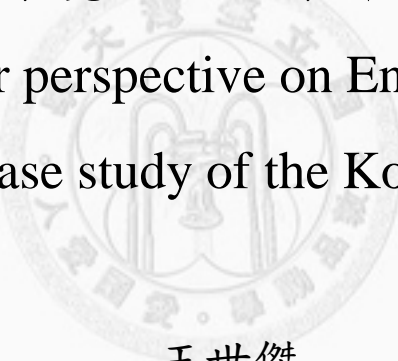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性別視角的環境安全-以京都議定書為例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the Kyoto Protocol



王世傑

Shih-Chieh Wang

指導教授：林子倫 博士

Advisor：Tze-Luen Lin,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性別視角的環境安全-以京都議定書為例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the Kyoto Protocol**

本論文係王世傑君（學號：R9532203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
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99年7月28日承下列
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林子偉 (簽名)

(指導教授)

黃競涓

陳世傑

謝辭

這本論文是以性別視角為核心關懷的著作，周遭朋友皆相當詫異我撰寫關於此領域的論文，但作為論文的主人，我很清楚地理解，這論文不光僅是求取文憑的一份成果，而是對於自己成長過程與思想的探索。因此，縱然我並非以自身作為分析對象，但每每研讀女性主義論述與理論時，皆是一番透徹的心靈洗滌，從中可以擺脫既有思想的禁錮與枷鎖，得到些許的解脫與自由。

而這篇論文並非僅一己之力即可完成，在此首先要感謝業師，林子倫博士在這漫長的問題意識探索過程中，提點我該注意的細節與方向，並常告訴我要以自己的興趣為優先考量。另外，特別感謝兩位口試委員—競涓老師與世民老師在寫作過程中的關心與指導。競涓老師的鼓勵與信心喊話，以及在理論建構部分給予的寶貴意見；世民老師對整體論文架構與學術格式細心的審查。都是讓這篇論文能更為完整的重要原因。

除了師長們在寫作過程的指導與鼓勵外，我也特別感恩我的家人—親愛的媽媽與父親，感謝你們養我育我，並在過去徬徨時期對我的教誨與支持；也謝謝岳父岳母對我無條件的信任與關愛；更感謝我最寶貝的老婆—小蘭，是你不斷地鼓勵我向前追求自己的夢想，賦予我堅持的能量。此外，也要感謝在這段過程中勉勵與陪伴世傑的一兄長、國家圖書館的同事與長輩、研究所的同學與學長姊（特別感謝書寧學姊對論文題目與摘要的協助）、佳融、宜楷、國暉、冠霖、慧子等好友以及一路上關心我支持我親戚與長輩。你們的關懷與鼓勵，世傑必銘記在心！

本篇論文，不光僅是世傑的小小成果，更是獻給你們的禮物！願大家一切平安、幸福與快樂。

王世傑（台大社科院）

民國 99 年 8 月 5 日

國立台灣大學 98學年度第二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性別視角的環境安全-以京都議定書為例 論文頁數：126

所組別：政治學系(所) 國際關係 組(學號：R95322031)

研究生：王世傑 指導教授：林子倫 博士

論文提要內容：

近年來隨著屬於環境安全的氣候變遷議程成為國際間的討論焦點，環境安全的概念亦開始逐漸受到安全研究社群的重視。但回顧當前的環境安全研究論述，本文發現其相當缺乏一個性別觀點；而這樣的現象實與性別觀點並未進入國際關係領域的核心有關。究其原因則可歸納為以下兩點，首先，傳統國際關係學者誤解女性主義途徑並無法進入當前的國際關係作實際的探討或問題解決，甚至批判其根本不是一個理論。次則為女性主義者亦懼怕進入傳統的框架下將有失女性主義的色彩與價值，特別是對於以單一架構或觀點作為切入議題的邏輯，正是當前父權價值主導國際關係的現象。因此女性主義者往往拒斥提出一個一統的觀點，而是堅持開放性、多元性、解構與懷疑主義角度來分析當前國際關係的議題。

因此本文認為，正是這樣觀點與研究取向使得性別觀點受到誤解並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置外者(outsider)。然而，有別上述策略性別利益取向的關懷，這樣的困境可透過女性主義所提出的「實際的性別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取向，即是強調女性對自身的地方生活經驗以及所面臨的問題而衍生出的各種短暫利益與需求，來解決這樣的困境。故此種實用性利益是短暫的、與現存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包容性，而非志在建構一個烏托邦的夢想。故有鑑於此，本文將以此取向來梳理及分析當前環境安全的理論論述，並據此點出其中的性別盲(Gender Blind)現象。而最後本文將以一個初步地性別環境安全論述，切入實際的環境議程—「京都議定書」，分析其建制談判過程、發展與運作成效。

透過上述的過程，本文將環境安全論述分為三個取向，分別是環境衝突、廣義環

境安全以及生態安全取向；並透過性別的觀點來對其進行分析與批判。而這樣的過程除有助於研究與決策者對環境安全論述與理論有更深入的理解外，亦可消彌環境安全理論的性別盲現象，並建構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安全論述。而以此性別視角的環境安全論述切入實際的經驗性議程（京都議定書）後，本文亦發現，女性的環境經驗與安全觀及其為主要的環境 NGO 是促成京都機制談判成功，使議定書得以簽訂完成的關鍵角色。故本文認為這樣的性別觀點將是未來建構整體主義環境安全建制重要論述與理論基礎。

關鍵詞：環境安全、性別、女性主義、京都議定書、實際性別利益取向



ABSTRACT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CASE STUDY
OF THE KYOTO PROTOCOL

by

SHIH-CHIEH, WANG

July 2010

ADVISOR: TZE-LUEN LIN, Ph.D.

DEPARTMENT: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GREE: MASTER OF ARTS

Over the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growing concern with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ue to an upsurge in the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 On the other hand, despite its wide engagement in various agenda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wever, gender perspective is still not accepted as an approach by academic commun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is. First, most traditional scholars have been mistaken in believing that gender approach cannot be a way of problem-solving and even cannot be a theory. Secondly, feminists also fear that using a single framework or viewpoint as an entry point for issues is exactly one among the phenomena of the dominance of patriarchal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us, feminists always insist on openness, pluralism, deconstructivism and skepticism, and refuse to offer a single, unified view or solution.

In my point of view, personally, it is exactly such an orientation itself that leads to a misunderstanding of gender perspective, and that renders itself an outsider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y. Rather than 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 which adopt a plural,

deconstructive and skeptical approach, the dilemma of this can be approached from 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 which focus on women's local life experience, short-term interests and needs that derive from the problems facing them and without challenging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or women's subordinate position in society. Therefore, such practical interests are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social structu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do not intend to build up a utopia. Owing to these concerns, I use this approach to analyze discourses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to point out the phenomena of Gender Blind with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iscourses. And finally I will to construct a preliminary Gender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o anatomize the process of negotiation, development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agenda of environmental regime – the Kyoto Protocol.

In sum, I find that categorizing the current discourse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which are the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 Conflict, general Environment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bringing the gender perspective into each of them can help researchers and decision makers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more and also can tackle the problem of Gender Blind in the current discourses either. In addition, I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experiences of woman and the Environmental NGOs which mostly are composed of women, playing a vital role in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ereupon, I think that this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a critical key to construct a holism environmental regim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Gender; Feminism, Kyoto Protocol, 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

論文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英文摘要.....	v
論文目次.....	vii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前言.....	1
第二節、當前性別視角的环境安全理論批判.....	5
第三節、研究設計.....	18
第二章、主流环境安全的論述.....	22
第一節、环境安全的發展背景.....	22
第二節、當前主流环境安全的論述.....	27
第三節、小結.....	43
第三章、性別觀點對主流环境安全論述的批判.....	46
第一節、主流环境安全論述間的批判.....	46
第二節、女性主義的环境與安全論述.....	48
第三節、女性主義對主流环境安全理論的批判.....	57
第四節、性別环境安全觀點的初步建構.....	69
第五節、小結.....	73
第四章、京都議定書的性別环境安全觀點與批判.....	75
第一節、當前主流建制的环境安全論述趨勢探討.....	77
第二節、京都議定書的批判與展望：一個性別視角的批判.....	82
第三節、小結.....	99
第五章、結論.....	101
參考文獻.....	108

圖次

圖 1-1 生態女性主義邏輯圖	13
圖 1-2 論文研究概念圖	19
圖 2-1 溫度變化與戰爭圖	31
圖 2-2 環境匱乏的來源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圖	35
圖 4-1 環境安全論述光譜初步分類圖	70



表次

表 1-1 環境衝突取向的環境安全研究分類	7
表 1-2 廣義環境安全途徑與環境衝突途徑差異表	9
表 1-3 環境安全的研究取向比較表	11
表 2-1 批判環境安全概念的學派	26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前言

壹、研究緣起與動機

近年環境議題是國際關係領域中一個很重要的探討焦點，主要原因即是近 30 年來科學社群強烈認為環境匱乏將會是近代人類生存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在層出不窮的極端氣候佐證下，政治決策者與研究者亦開始重視此問題。故環境安全 (Environmental Security) 的概念也因此成為國際安全研究的新興議題。

但環境安全的概念就政治學的角度而言，其不同於自然科學以討論生物空間及情境下的安全問題，¹而是著重於環境破壞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例如國際、區域、國家間或國家內部的政治不穩定與衝突，而這些威脅是否或如何影響了政治層次上的國家（或人類）在國際、區域、國家間及國家內部的和平與生存，即是政治領域的環境安全所討論的重點。因此，其承接了傳統（國家安全）及新興國際安全（如人類安全）的研究框架。由此，許多學者開始探討環境安全的概念（Margaret et al,2000），例如 Thomas Homer-Dixon（全文將以 Homer-Dixon 稱之）探討環境匱乏與政治暴力衝突的因果關係，其研究結果證明了單純地環境匱乏與暴力衝突並沒有絕對的直接關係，而透過他的研究，政治結構因素似乎仍是主要的變數（McNeill, 2000）。²

而安全議題在 1980 年代以前仍是以傳統安全為核心的領域，直到前東歐共產國家與蘇聯政權相繼在 1990 年代初瓦解，傳統主流國際安全的研究開始受到批判與反省後才開始逐漸對於安全主體進行反思（Booth,1997；陳欣之，2003）。

³此時女性主義亦開始對 1980 年代之前立基於本質論述的兩波女性主義浪潮論述進行檢討。這波女性主義者認為應該透過懷疑所謂共通的人性、男性或女性

¹例如實驗環境的骯髒程度對於研究者的危害或某個國家的環境生態不良所可能帶來的污染問題。

²Dixon 所建構的模型中雖有放置該因素，但並未有再進一步清楚的解釋。

³例如冷戰期間的核嚇阻理論、體系理論、結構現實主義...等。

的「本質」概念，來根本泯除「本質論」的論述，⁴故這波女性主義的發展因此被稱為「第三波的女性主義浪潮」。⁵

女性主義除對自身的理論反思，也同樣地對當代的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檢視。其重構與解構傳統的「國家」、「主權」、「政治認同」以及「安全」等議題，並將性別的觀點帶入相關研究領域之中。這種作法有兩個重要意義，首先，透過性別觀點進入相關這些研究議程，豐富了國際關係領域理論與知識多元性；次則，該觀點具有撼動傳的氣質二元對立論的架構的能力，因此，透過這個途徑可還原更原初的國際關係樣貌（Peterson et al, 1992）。

而這些想法與思考，主要是女性主義藉助自 1980 年代開始發展的後現代主義觀點。後現代主義將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存的思維、習慣、習俗和道德視為是「人（男性）為」且不具有「真理性」的結構。因此在談性別（Gender）的概念時，其認為性別是社會所建構，而這個社會又為父權價值所型塑（Butler,1990；Johnson,1992；Poovey,1992）。後現代的女性主義透過解構精神對於現存社會體制保持高度的警覺，並體認出當前社會價值是為了讓社會得以運作的暫時性制度安排，故一旦發覺這些制度轉變成霸權式的主宰文化，從而壓制了其他意識型態與知識的發展時，就需要進行解構（Digeser,1994；Kendall and Wickham,1999；楊容，2002）。

由此，後現代女性主義在探討性別不平等的根源時，其將問題根源直指西方文化的核心與本質（即是傳統的偉大言論和形而上的二元對立思考邏輯）。並指出正是二元對立的文化邏輯決定了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現實。⁶而更甚者，女性主義藉助後現代主觀點對二元對立進行顛覆，以打破傳統社會男性統治女性與女性

⁴第三波女性主義藉由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其認為「本質」之概念是長期人類社會文化發展中將某種特質「解除歷史化」(de-historization)後所造成歷史固定化的結果。因此，只要透過歷史的「考古」或「系譜」分析，就能夠追蹤與還原出「本質」的天經地義概念下的歷史偶然性和獨斷性。

⁵ 可參照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C%AC%E4%B8%89%E6%B3%A2%E5%A5%B3%E6%80%A7%E4%B8%BB%E7%BE%A9>

⁶即是所謂的氣質論述，如理性/情感、主觀/客觀、主動/被動...等二元價值，同時依照性別僵化地歸類所屬之氣質。

從屬男性的結構，並試圖將男女關係拉回到原初平等的地位。而這些論述為女性主義的理論建構與理想實踐提供了有利條件，並提供了一個掙脫既存結構與價值的解放途徑 (Nicholson,1992; Wicke and Ferguson,1992; 李銀河, 2003; 黃競涓, 2007)。

而回到國際關係的研究領域上亦是如此，1987年 Jean Bethke Elshtain 所著之《女性與戰爭 (Woman and War)》可算是開啟女性主義觀點進入國際關係領域的重要著作，之後如 Enloe (1990; 2000; 2007)、Tickner (1992; 1997; 1999; 2001)、Sylvester (1994) 與 Peterson (1992) 等學者，以及包括國際關係的傳統學派，都表達了對於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上的重要性及發展性 (Keohane,1989b); 而又如 Richard Ashley 及 R.B.J Walker 在國際關係研究季刊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ISA) 中亦談到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長期受到邊緣化就如同於女性長期在研究領域的被忽略一般 (Ashley and Walker,1990)。至此，這些聲音開始將性別的視角與理論透過第三波的女性主義浪潮下，開始進入國際關係領域。⁷

故就環境安全的議題，經由筆者的文獻回顧發現，環境安全雖是國際安全的新興領域，有許多各個層次與議題的研究 (Allenby,2000; Dalby,2002)，⁸例如氣候變遷議題、糧食議題與環境難民以及聯合國安理會亦在 2007 年 4 月針對環境安全的各項議題進行討論。但這些議題所存在的南北差異、環境外部性以及氣候變遷建制大國主導等現象，又不難發現其仍是一個以父權價值展現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同時，筆者亦發現 80 年代末期以來已進入國際關係領域的性別視角與關懷，卻未出現在環境安全的論述與議題中，故本文認為以性別的視角思考環境

⁷本文不認為女性主義即等同於性別分析，即便雖透過了後現代的解構性思考，女性主義有了大幅的進步 (尤其是反本質論的論述，不再使用女性氣質優越論的觀點)，但女性主義全然的切割 (例如，女性主義光從字面上而言(feminism)，仍具有本位色彩)。但其對於性別分析的關懷仍是當前最有力量性別分析工具，因此為筆者所採用。

⁸依不同的關注面向，如 Deudney (1999) 從地緣政治角度、Dalby (2002) 針對南北問題做探討、Homer-Dixon (1999) 研究環境匱乏與政治暴力衝突的關係、Goldstone (2001) 探討中國人口危機對環境帶來的問題、Butts (1999) 從軍事層次的角度來思考環境安全等。

安全研究有其重要的學術意義與價值。⁹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一、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在哲學層次上佔有重要地位，其有三個面向，首先，研究者意識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產生但不知如何解決的心理困境或好奇；次則是其代表研究者在特定時點對某些問題的意識狀態，特別是該問題具普遍性時，則會對於問題有局部性的意識並符合多少社會價值，可是卻又充滿著疑問；最後一個面向為，研究者欲對該問題提出分析，並試圖就此問題的相關事物作出反應並進行解釋或賦予意義，或者為嘗試解決問題並試圖給予答案的行為。

因此，問題意識是一種起初遇到困境不知如何是好的心理或好奇的狀態；並在特定時點下對於問題的存在有所意識與察覺，並在最後發展出嘗試解決問題並試圖找出答案的過程。

由此，筆者的問題意識可如此般了解，本文的問題意識來自於筆者發現女性主義研究途徑在國際關係領域的議題中雖逐漸受到重視，但作為新興研究議程的環境安全，其研究層次卻仍屬於傳統的研究途徑；而女性主義迥異於傳統 IR 領域的本體論與認識論的研究途徑，常被視為是一種無法解決與應用於當前的 IR 議程的外在觀點。但女性主義學者則認為，這是因為主流觀點對於女性主義所重視的多元與軟議題取向的國際關係研究途徑的觀點有所誤解，而這些誤解阻礙了全面性理解國際關係樣貌的機會 (Tickner, 1997)。因此，這些議題的發展與爭議，激盪出本文探求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的樣貌，以及藉此性別觀點思考其應用在環境安全的實際議程中能得到什麼樣的分析成果。

而關於性別環境安全觀點與經驗性資料的探討，筆者發現聯合國氣候變遷會

⁹新安全觀的「環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相關著作大多數討論的面向不外乎立足於人類(男性)中心論、國家(男權)中心論。研究威脅該如何解決及評估威脅是否會發生的研究論述；另一面向則是以生態中心出發來討論環境安全的重要，這種論述則擺脫了性別包袱，提出了嶄新的觀點，但由於其將關注的主體錯置，因而得到的共鳴較小。國際安全的主流架構、研究焦點與論述仍屬前兩者(有區別的人類中心)。本文雖仍以前者出發，但企圖透過性別的分析視角來解構傳統人類中心的環境安全論述。

議自 1992 年開議以來已 17 個年頭，而其所通過的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及依據其架構而簽訂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是主要型塑當前國際環境建制與政治的依據，因此就國際環境政治的場域而言，其重要性相當顯見。但其機制成效的失敗以及後京都機制談判的停滯，促使本文試圖分析並梳理該京都機制（議定書）的環境安全論述，¹⁰並以一個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探此環境建制發展的歷程，對未來後京都機制的提出本文的見解。

二、研究目的

在筆者的問題意識使然下，本文將透過回顧環境安全研究的發展以及女性主義對環境安全的批判，梳理出一個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論述，並透過這樣的觀點，檢視當前的國際安全建制中的環境安全論述，並進一步評估當前重要的京都機制下的談判過程、運作與結果並展望未來的後京都機制開展。

故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首先，透過女性主義的性別視角豐富環境安全理論的研究；其二，透過性別的環境安全的觀點，直接分析及批判環境建制（京都機制），以突顯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重要性，並對正在進行中的後京都談判提出本文的建言與期待。

第二節、當前性別視角的環境安全理論批判

本節主要目的在於回顧當前性別觀點對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以便於讀者理解後續章節安排與研究方向。因此，基於上述考量，本部分將針對兩個面向進行初步文獻分析。首先是對環境安全的研究論述做初步的梳理；第二部分則就當前的性別觀點對個別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進行回顧。

¹⁰一般強調其廣義的文本時會以京都議定書稱之，而強調其功能與制度時則稱京都機制，但大抵而言是一樣的概念。

壹、環境安全研究

環境安全的概念在過去的十幾年來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視，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此概念不論是在學術或政策領域上都成為連結傳統安全的一種新趨勢，然而有關環境議題的安全研究相當多，但若就一個全面性或系統性的討論則相當少 (Brown,2005)。而這些少數的研究更幾乎沒有關於性別視角或具備性別敏感度 (Gender Sensitivity) 的討論 (Detraz,2009a)。本文回顧目前國際關係領域的相關著作後，亦僅發現學者 Detraz 與 Betsill 是少數關注此議題的研究者，而其提出的環境安全分類框架與性別切入的視角亦恰與筆者所進行中的研究目的與核心關懷高度相符。因此，在本節所回顧環境安全論述分析基礎框架，是以其提出的諸多觀點為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基礎。¹¹

而 Detraz 所提出的框架是將自國際關係冷戰結束以降所逐漸發展出的環境安全論述與研究區分為三大研究取向，分別為「環境衝突 (Environmental Conflict) 取向」、「環境安全 (Environmental Security) 取向」以及「生態安全 (Ecological Security) 取向」 (Detraz,2007；2009ab；Detraz and Betsill,2009)。而這樣的分類即可將以環境安全或其他諸多名稱作為廣義概念的研究含括進這個框架。¹²但筆者認為 Detraz (2009ab) 的「環境安全 (Environmental Security) 取向」分類實易與本文題目—「環境安全」混淆，故本文將其重新定義成為「廣義的安全取向」，以避免在概念上引起誤會。

一、環境衝突取向

環境衝突取向主要針對的是環境匱乏與暴力衝突的探討，這類型的討論在近期相當廣泛且多元 (Brown,2005)。就環境的面向上，有以廣義環境的概念作為主軸或者直接針對氣候變遷結果的探討，例如氣候變遷、全球暖化或環境

¹¹Detraz 於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畢業，目前任教於曼菲斯大學政治系 (University of Memphis)；Michele M. Betsill 為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國際環境政治等。

¹²Brown (2005) 有對環境安全的研究取向進行分類，但其分類的焦點僅就環境衝突的論述進行討論，因此仍失之過窄。

難民等議題 (Myers,2001 ; Myers and Kent,2001) 。而依其對衝突探討的重點亦可再分為軍事安全取向以及廣義衝突取向兩種論述 (參閱表 1-1) 。

表 1-1：環境衝突取向的環境安全研究分類

	環境匱乏層面	氣候變遷議題
廣義衝突	環境匱乏與衝突	氣候變遷與衝突
軍事衝突 (國家安全)	環境匱乏與國家安全	氣候變遷與國家安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就環境匱乏與衝突的研究，Dixon (1999) 做了相當廣泛地經驗性研究，其從供給面、需求面與結構面的環境資源匱乏出發，結論出環境匱乏會變成潛在影響人類福祉進而引發衝突的間接性因素，而這樣的匱乏若搭配其他的因素將會造成各種暴力衝突 (特別是市民社會的衝突) ; Barnett (2001) 則認為包括人口增長、移民與資源匱乏等條件皆屬於造成整體環境匱乏的主因，而這些因素若不能有妥善的治理予以配合，將會造成嚴重的暴力衝突 (Goldstone,2001) 。

氣候變遷與廣義衝突的研究則是認為氣候變遷是最主要的環境安全議程，因此專注於其所造成的各種現象進行探討。而這類型的著作比以環境安全概念出發的研究較多，並認為氣候變遷的問題將會造成廣泛性的衝突，如資源爭奪、環境難民遷徙調適問題、經濟甚而包括了軍事戰爭 (Barnet,2003 ; Brown & Hammill and Mcleman,2007 ; Nordas and Gleditsch, 2007 ; Scheffran, 2008)

而關於環境匱乏與國家安全的研究相當多，這類型論述主要針對各種環境問題與國家 (軍事) 安全的連結 (Finger,1994) ，如糧食安全 (Scanlan, 2009) 或者以廣義環境安全的概念做經驗性的的探討 (Myers,1989 ; Matthew, 2001 ; Durant, 2002) 。

氣候變遷與國家安全的論述方面，這類型的研究專注於氣候變遷議題與

國家（軍事）安全的關連性，這類型的研究受到高度的重視，例如在 2007 年美國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報告中即參酌了政治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中的第一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1）的資料，¹³認為氣候變遷不僅與總體經濟發展有關，更連結了國內與區域的安全問題，並更將進一步影響國家安全，因此在該報告的結論中認為透過加強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治理以及減少面對氣候變遷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強化未來美國的國家安全（Busby, 2007）。

故此以衝突作為環境安全研究主體的論述雖可區分在關注議題層面上的些許差異，但其仍是同多於異。其相似處第一在於，這些研究皆是以人類中心為主體的研究論述；第二、重視潛在暴力衝突而多於資源匱乏的取向；第三、強調的仍是傳統安全面向，而環境僅是新增的安全要素之一（Detraz, 2009a：347-349）；第四，不論關注的衝突主體有多元，國家角色最終還是核心行為者。

二、廣義廣義環境安全取向

而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關懷則有別於衝突取向，其與人類安全的概念類近。故其與衝突取向的研究最大不同在於，衝突取向仍是直接連結國家為核心安全的內涵，但廣義廣義環境安全取向則關注所有人類的個體或群體的生存與安全。簡言之，就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環境安全論述而言，其所指涉安全的對象是人（people）而非以某個政治實體或國家。也因此，任何環境破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包括人口增長問題、疾病傳染或永續發展議題等，皆是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關注焦點（Detraz, 2009a：349-350）。

此種取向的論述相當廣泛，就國際建制方面，較具帶表性的是 1994 年的聯合國發展規劃署（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的報告中提到了

¹³ IPCC 第四次評估中的第一小組報告主要針對自然科學基礎做探討，主要討論關於氣候變遷的成因與未來可能影響，可參照以下網址：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ontents.html

人類安全的七大面向，而環境安全為其中一項。¹⁴在學術社群方面，則是以討論全球環境變遷與人類脆弱性為主（Vogel and O'Brien,2004；Adger,2006）；其他研究則從當前全球化現象所造成的人口增長與流通、疾病傳輸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與環境變遷連結進行討論（O'Brien and Leichenko,2000；Folke,2006）

因此，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論述與將研究焦點限縮在國家或軍事安全的環境衝突取向不同，環境安全關注的是全人類的任何環境議題。而此種廣義的研究取向又並未讓研究者失之焦點，因為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並非真的研究包山包海的環境，而是以人類所面臨的環境危機作為基本取向，因此也自然會限縮它的研究議程，同時也具備務實性（Detraz, 2009a）。

故不即便是環境衝突取向研究亦可算是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內涵之一。¹⁵以衝突取向的研究而言，其關注的是國家與軍事安全，但最終目標仍與解決因環境或氣候變遷議題所造成對人類不安全的問題相符，因此國家作為主要的國際行為者與國內主權行使者，對於解決環境所帶來不安全的結果地確有著重要的影響力。但本文認為在實際區分兩者的差異時，仍可從焦點取向與意圖（Intentionality）取向區別兩者的不同（參閱表 1-2）。

表 1-2：廣義環境安全途徑與環境衝突途徑差異表

	廣義環境安全途徑	環境衝突途徑
焦點取向	環境 v.s 個（群）體	個（群）體 v.s 個（群）體
意圖取向	低	高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就焦點取向方面來看，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是聚焦在人類行為與生態運作的連結所造成的環境問題對人類的不安全結果，這些行為如資本主義的消費型

¹⁴該報告可以總結為兩方面，即是，「免於匱乏之自由」（Freedom from Want）以及免於恐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 Annan）在 2005 年擴大之自由：「邁向共同發展、安全及人權」（An Larger Freedom: towar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報告中，即是以前述的方向為主軸，提出聯合國的新政策方針，可參閱 <http://hdr.undp.org/en/reports/global/hdr1994/>。

¹⁵這即是學術社群一般在稱呼環境安全的概念時有相當不同的定義與取向之因。

態 (Barnett,2001)、快速的人口增長 (Pirages,1997)。而這類行為若搭配生態運作的變化則會造成相當程度的環境不安全，例如物種滅絕、海平面上升或各種極端氣候的變化 (Pirages and DeGeest,2004)。而環境衝突的觀點則是就環境問題結果下所可能引發的衝突現象進行探討，因此衝突取向的研究傾向是衝突爆發的可能性。簡言之，廣義環境安全途徑關注環境不安全是關於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等各面向，故環境所對人類 (包括個 (群) 體) 的衝擊才是其焦點；而衝突途徑則關切環境衝擊所造成的個 (群) 體之間的暴力衝突的連結，故個 (群) 體間衝突的因素是否與環境有關才是其主要焦點，因此其焦點取向偏重的仍是傳統的安全研究取向，而環境僅是其新增的不安全因素之一。

而儘管環境問題來自人類所造成，但就廣義環境安全途徑而言，其對於意圖的認知較不強烈，因此其關注環境問題對人的不安全；而衝突途徑則認為人類有高度的意圖，因此環境問題的出現相當程度即是反映自然資源的爭奪與生存競爭，因此衝突途徑關注的是環境問題所造成的人類個 (群) 體間的不安全，而此種人與人不安全的邏輯則與強調人性本惡的現實主義相當契合。

三、生態安全取向

生態安全取向則與前兩者的研究關懷相當不同，其重視生態本身的不安全狀態，因此就廣義層面而言，其可算是環境安全的一個面向，但就狹義層面觀之，其是強調生態主體的論述，故顯得似乎與人類事務無關。但生態安全的學者認為，強調生態中心的安全並非與人類安全無所連結，因為人類與其他物種相同，皆同屬於生態的一部分，同時生態作為一個自然界的整體，當然有其絕對的重要性，因此整個生態體系有其自己的重要價值，而非專屬於人類所使用 (Rogers,1997；Litfin,1999)。

因此，若與安全研究的角度觀之，生態安全取向的途徑與傳統安全的研究途徑相去甚遠，生態安全的研究主體乃是以環境生態的本身，並認為環境的本身受到威脅即是來自於人類的社會行為所致。

四、小結

本部分藉著回顧以上三個途徑的環境安全研究後，首先必須先釐清的即是關於廣義環境安全概念與環境安全研究途徑的差異，本文所稱的環境安全概念是在未清楚區隔之研究取向前一個既存現象，因此這樣環境安全的定義是相當模糊的概念，但透過區隔研究取向的差異後，將有助於釐清環境安全的研究層次。此外，為求在概念上的一致與明確，本文將固定使用「廣義環境安全取向」以表明是廣義環境安全研究之下的其中一個途徑，以避免讀者在閱讀上產生概念不清的情形。

而關於上述三個研究的區別，可以幾個面向有更清楚的理解，第一，關注的大層面；第二、具體關注的安全事務方面；第三、與傳統安全研究的關係 (Detraz, 2009a)。而筆者亦認為亦可再以理論趨近層面來做觀察 (可參閱表 3)。

表 1-3：環境安全的研究取向比較表

	環境衝突取向	廣義環境安全取向	生態安全取向
關注的大層面	人類中心	人類中心	生態中心
關注的安全面向	自然資源匱乏造成的潛在衝突可能	環境匱乏對人類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人類行為所造成的環境匱乏對環境的衝擊
與傳統安全的關係	仍為傳統安全的研究，並將環境的面向納入	修正的傳統安全 (新安全的研究面向)，以人類安全取代軍事安全	不同於傳統安全途徑，對傳統安全主體提出修正；傳統的安全途徑會破壞環境的安全
理論層面	貼近現實主義	貼近新自由制度主義	貼近生態主義

資料來源：Detraz (2009a：347)，作者整理與補充

從上表中可以清楚理解三個論述途徑的差異，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論趨近面而言，從上述簡要的討論中即可明顯發現三者的不同，而這樣理論邏輯的差異可作為論述區分上的主要依據。但區分環境安全的研究儘管有這三個途徑，但卻幾乎沒有以性別做為分析框架的著作（Detraz,2009a：3）。因此，透過性別視角切入環境安全的研究有其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

貳、性別觀點與環境安全

本部分的文獻分析將針對上述環境安全的三個研究途徑，以一個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觀察。而一般而言女性主義認為傳統的安全研究是狹隘的、國家中心（state-centrism）的，因此環境衝突的論述所專注的是資源缺稀所造成的暴力衝突，但卻忽略了不論在資源缺稀或暴力衝突中女性的角色與立場。由此，女性主義對於安全的研究提出相當迥異於傳統主流安全的見解，可大致分成兩個面向，第一，批判安全研究的陽性中心論；第二，追溯陽性中心論是透過何種政治實踐，使其產生集體性的概念並形塑了正當性（Tickner,1992）。下文將以此角度針對環境安全的各研究面相進行分析。

一、環境衝突取向與女性主義

就環境衝突取向而言，女性主義安全觀認為此種取向的安全研究是不正確的，主要是因為環境衝突取向的途徑僅關注資源匱乏所可能造成的暴力衝突，而沒有對於資源匱乏與全人類（people）與環境本身影響的關照。因此，環境衝突取向的途徑是個不關注多元主體的狹隘國家中心主義論述。故此種研究取向因此類近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而女性主義認為，安全研究的焦點應包括各種高低階層次的面向，也唯有如此才能了解女性在國際安全場域的參與、需求與實際所面臨的問題（Tickner,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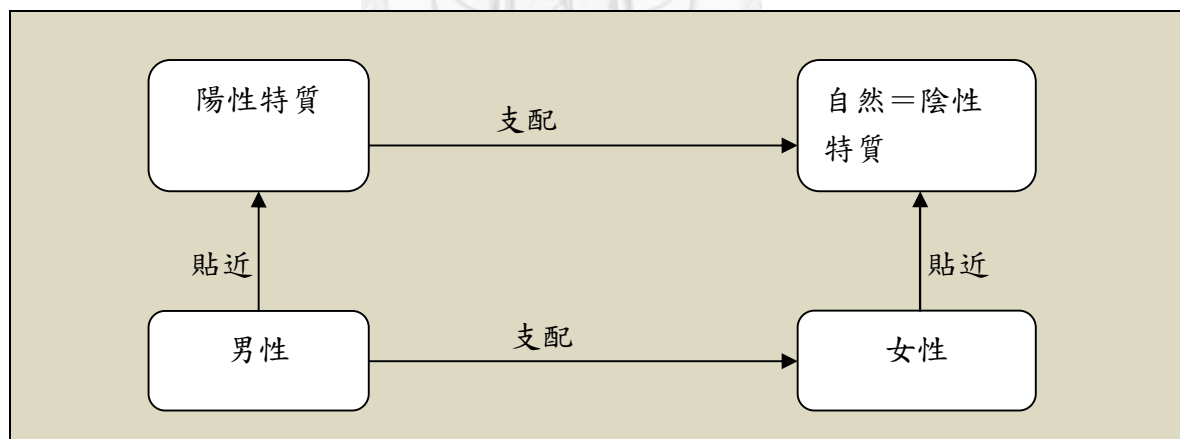
而除了女性主義安全論述的視角外，生態女性主義者從歷史角度出發探尋歐洲自中世紀以降，男性如何透過科學及機械論觀點將自然立於被宰制及低等的角色，並刻畫出二元對立的剝削邏輯。而這過程中包括對於女巫的迫害，將女性知

識視為妖魔化、非科學以及不理性的，並透過這些壓迫逐步地建構出二元的專屬與對立關係，諸如理性/情感、文化/自然、陽剛/陰柔等關係，而理性、有文化以及陽剛的特質都是互為相關的，且歸屬於男性，並被視為較為優越的特質

(Merchant, 2005)，這些皆是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二元剝削邏輯造成一個性別壓迫結構與生態危機的主要因素。故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環境匱乏所造成的衝擊是肇因於資本主義消費型態與父權式的二元對立論所致（李常井，2001；Merchant, 2005）。

故生態女性主義反對以男性為中心的人類中心論，認為這樣僅是反映男權文化的價值觀，從而造成了剝削、統治與攻擊性的價值觀。因此，其強調深層生態學的重要性，即是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是個相互聯繫的網絡，反對性別差異的結構與種族分隔的世界觀。故透過本文整理出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論述邏輯圖後，讀者將不難理解二元論對立關係的存在即是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見圖 1-1）：

圖 1-1：生態女性主義邏輯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因此，就環境衝突論述關注資源缺稀所可能帶來的暴力衝突研究以及人類中心論的思考（Homer-Dixon, 1999），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思考可發現，環境衝突取向認定資源匱乏狀態時除完全從人類中心出發外，更是以父權價值作為基礎，這點從衝突論述貼近現實主義的論述中即可理解，因此就生態女性主義的角度而言，這樣的研究仍是一種二元對立的研究傳統。

二、廣義環境安全取向與女性主義

而就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而言，儘管其以人類安全作為基礎，但就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觀點而言，這些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仍然缺乏一個性別敏感度的觀察（gender-sensitivity），¹⁶因此，就性別敏感度的角度而言，即便此取向大談人類安全、永續發展或環境調適（environmental adaptation）等安全議題，但女性主義擔心這些安全的提供似乎仍是狹義、國家中心或者由上而下的，而僅是以廣義安全作為包裝罷了（Detraz, 2009a）。

而就生態女性主義的立場而論，生態女性主義關注二元對立所造成人類剝削自然，男性剝削女性的；且男人接近人類，女性貼近自然的關係。而當前的環境安全研究儘管有很多關於廣義的人類安全議題，但卻沒有區隔或認知到其所指涉的仍是狹隘的人類中心邏輯。同時，此種取向的研究並未關注到自然的本身，而仍是立基在父權中心的人類價值，因此在人類與自然的連結上仍是二元的對立邏輯。而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就自然與人類的關係，應提倡一種「地球關懷倫理（earthcare ethic）」，此種關係是建構在人類與地球環境的動態互動基礎上，也即是人類雖能部分掌控自然環境，但無法抗衡環境本身對於人類行為的反撲，因此透過此種倫理學的角度，重視環境的本身的主體性並予以相當程度的尊重，以維持其人類生存與生態間的均衡（Merchant, 1995）。

三、生態安全取向與女性主義

生態安全取向與傳統安全途徑的本體論完全不同，其視生態有其自主性，而由於人類自是屬於生態的一部分，因此將安全主體放置在環境或生態的安全並非不實際（Pirages, 1997；Rogers, 1997；Pirages and DeGeest, 2004）。由此可以瞭解生態安全與女性主義安全研究或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近似之處。

因此，就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觀點而言，生態安全途徑與其近似之處在於兩

¹⁶ 就性別敏感度而言，這裡針對的是在談論有關於發展的議題或環境調適的議題時，儘管關照的面向雖然為全人類或全世界，但由於過去女性的需求長期被壓抑而無法彰顯，因此在相關的討論或對於未來的計畫安排時，必須特別將女性的需求勾勒出來，以避免隨時掉落至父權思維或陽性中心的框架之中。

者同樣拒絕傳統安全研究的本體論，而就歷史角度觀之傳統安全價值亦是造成環境破壞的主因，例如戰爭本身對於環境的破壞，並造成生態與女性的不安全。但女性主義安全論者亦認為，儘管生態安全途徑關注人類對環境的破壞與剝削的議題，特別如針對人類消費行為以及戰爭過程中所對環境本身的破壞（Myers,1993a）雖與女性主義安全研究者的關懷相符，但生態安全卻未區別性別在此議題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即是忽略了環境破壞與性別結構的因果關係。由此，女性主義的安全論認為，生態安全取向既然關注整體環境（也包含人類）的安全，故其對於人類的社會結構關係所造成的環境不安全也應有所關照，但生態安全卻沒有以性別分析架構去檢視相關的議題，例如戰爭對於性別差異所造成的不同衝擊。

而就生態女性主義而言，其重視生態的關懷與生態安全論述在本體論上較相符，因此，兩者皆認為有必要建構生態安全的概念。但仍可稍加區別出兩者的不同，首先，生態女性主義為試圖在人類與生態中心之間，取得動態的均衡，而生態安全強調的是自然亦包括人類，但仍可清楚了解兩者對自然與人類在主體位上的優先順序仍不同，就前者而言，其雖也重視自然的整體性但強調自然與人類應建構出一種夥伴倫理關係（Merchant, 2005），但後者卻認為自然生態才是大地之母，具有崇高的地位。

另外，就實際關注議題上，由於在本體論上仍略有差別，因此生態安全完全聚焦在人類所對自然的剝削與侵害。但生態女性主義則關切性別結構與環境匱乏以及發展的議題（人類中心優先的價值），例如生態女性主義反對有差別的發展、剝削及忽略，其認為當前所謂的發展乃是北方國家對南方持續不斷的剝削而得到的成果，因此，西方式的發展邏輯僅是圖利北方國家的手段，而這些方式最典型的工具即是強調陽性特質的工業與殖民主義，藉由商品與金錢貿易的發展摧毀了大自然。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以協助、非暴力、多樣性、提高參與、非競爭、非層級化、整體性思考以及自然資源的循環使用與永續保存等價值，並強烈反對基於男性中心的「陽性式發展」的概念（Shiva,1989）。

故簡言之，生態女性主義與生態安全論述最主要的不同在於，生態安全徹底的生態中心論述，而生態女性主義則是生態中心與人類中心的調和。

參、小結

在上述初步的文獻閱讀與分析下，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環境安全理論的不同研究面向。因此，就上述的討論看來，可以結論出環境衝突取向研究是國家中心且傾向現實主義理論的論述，其與女性主義的本體論完全不同；環境安全研究途徑雖與女性主義安全關懷所強調的多元安全主體類近，但其未區隔性別的差異結構所造成的環境不安全，因此其與女性主義的環境觀點有所差異；而以生態中心為主要關懷的生態安全論述，其雖在剝削論述是上與女性主義的論述相符，但性別議題確不是其關注的焦點。而也正因此，筆者發現當前主流環境安全研究存在著性別盲。故本文認為建構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除了可揭露在環境議程中被壓抑的性別結構外，亦更能豐富環境安全的理論內涵。

而一個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研究到底應該關注什麼的面向，本文認為，不論是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或生態女性主義的視角，皆可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的環境安全核心關懷。第一，就環境安全的主體方面，不應是環境衝突取向的國家中心，更不是廣義環境安全途徑取向的狹義人類論述，而是應區別性別結構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多元面向的探討，例如南北議題、貧富差距、菁英政治之中的性別結構皆是可探討的焦點；第二，須重新理解衝突的本質，環境衝突的研究雖有其重要性，但不應無所反省可能出現在性別結構差異所造成的不同結果，也即是不探討鑲嵌在性別結構中的衝突本質，而視當前的衝突邏輯為理所當然。第三、動態的權力關係須清楚地從性別結構之中被勾勒清楚，也即是透過的權力關係的描繪刻畫出性別結構在環境安全議題中的形貌；第四，不能僅重視人類對於資源的可及程度，而更因思考維持生態運作的基本需求，故在權衡人類與環境中心的價值時間，應思考要如何在彼此間求取平衡與尊重，而非立足在一個二元對立的剝削邏輯之中；第五，思索環境不安全的解決方案時，也應區別性別結構的差異，例如

針對全球化、人口增長以及經濟發展等結果造成的環境匱乏的問題解決，若沒有一個區別性別利益的視角，那麼這些解決方案仍是偏狹的。

由此，透過性別的環境安全視角，除了可進一步彌補環境安全論述的不足外，更可以透過此途徑來檢視各種不同的環境議題，例如近年來氣候變遷議題在國際關係領域中相當受到矚目，亦有許多以氣候變遷作為環境安全議題的論文與著作，但性別的相關論述仍在這火熱的議題中相當缺乏，而究其原因除女性主義排斥傳統國際關係領域而多採批判的途徑外，傳統學者亦誤解女性主義無法進入當前的國際關係作實際的探討或問題解決，甚至根本不是一個理論（Keohane, 1998b）。而女性主義者懼怕進入傳統的框架下將有失女性主義的色彩與價值，特別是對於以一個單一架構或觀點作為切入議題的邏輯，正是當前父權價值主導國際關係的現象。故女性主義者往往拒斥提出一致的觀點，而是堅持開放性、多元性及批判懷疑主義分析既存現象。而本文認為，正是此態度造成性別觀點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外在者及受到誤解，因此，欲改變一個領域或結構，較務實的作法應是由「實際性別利益」的態度出發（即是從自身生活經驗及所面臨的問題衍生出的各種利益與需求進行問題解決，此種實用性利益是短暫的、與現存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包容性，而非志在建構一個宏大的夢想）來切入當前的環境議程。

而藉著上述環境安全論述的梳理，本文認為，此論述框架可作為切入環境安全議程的重要工具，故在後續的章節中本文將詳細地將此架構做較完整且系統性地文獻分析。而如前文所述，筆者認為京都機制為當前最重要的環境建制，因此在理論應用於實務的面向上，將就京都時期的發展過程進行討論，並提出幾點觀察，期盼能為國際關係的性別觀點增添更實質的學術意義。

第三節、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

本論文透過女性主義的文本及詮釋方法，針對環境安全研究的理論面向提出新的分析視野與看法。而關於社會科學中的詮釋性（interpretation）研究，學者如 Marc Howard Ross 認為，以後現代的、相互主觀的（inter-subjective）角度對政治現象來進行理解，是與社會科學中強調比較的研究方法是相符合的；而同時其亦認為詮釋研究是指行動者彼此共享的相互性主觀價值，並是社會科學觀察者企圖理解這些意義並將其呈現在他人面前所做的努力。因此，詮釋是政治學與比較政治研究中的一項重要研究工具。

另外，本文除了採上述文獻分析詮釋分析途徑外，「歷史途徑」亦是本文主要研究方法，透過進出縱向時空，得以梳理歸納事件與理論的前因後果。

貳、研究架構

在本文的問題意識與所進行的文獻分析後，筆者決定先整理當前分歧的環境安全研究，將其多元面向的不同研究予以分類，再進一步就女性主義的安全與環境論述對此主流的環境安全論述進行批判與比較，並藉此提出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安全觀點。次則，在實務探討方面，本文將綜覽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發展與成效，並透過性別環境安全的理論關懷，勾勒出環境安全實際議題中亦缺乏性別關懷的現象，據此強調性別觀點在環境安全議程中的價值與重要性，故以下為本文研究的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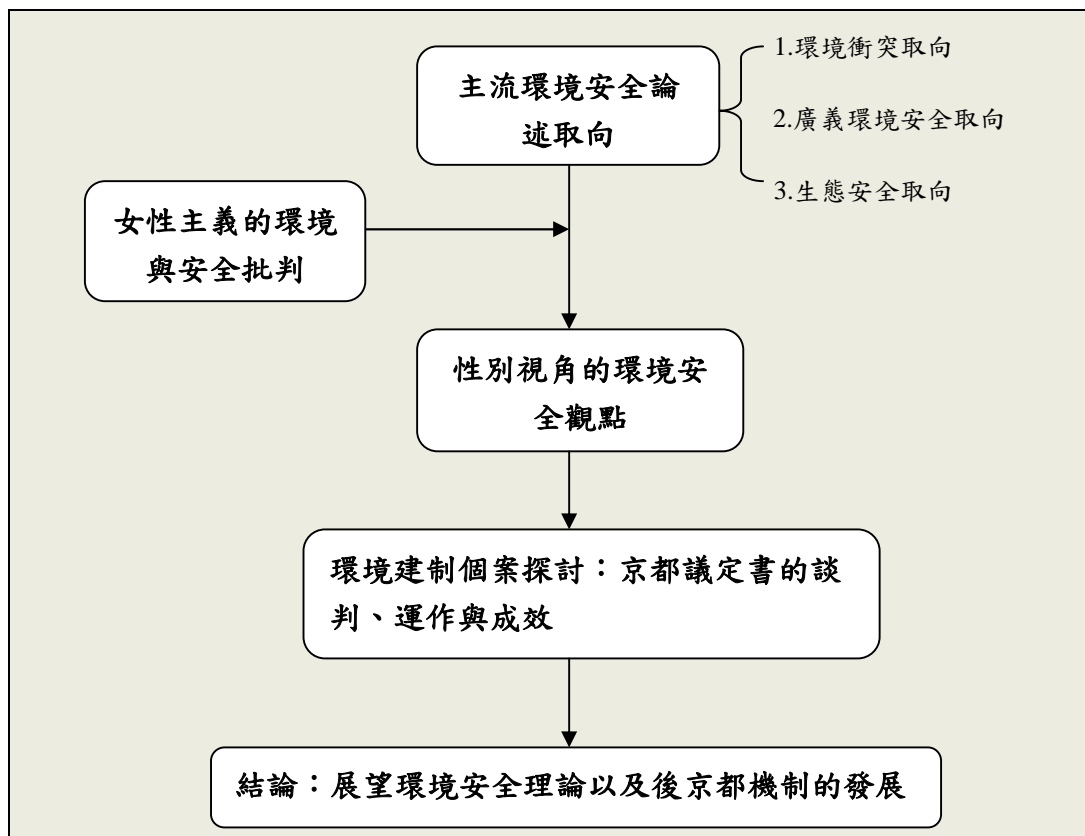


圖 1-2：論文研究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基於論文寫作的可行性考量，關於環境安全的概念，本文將聚焦在政治學為基礎的環境安全論述；在女性主義的知識脈絡方面，筆者則以國際關係的女性主義安全以及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為核心，因此其餘女性主義的流派與分類的探討並非本文的關注重點。

而在實務議題方面，對於京都議定書的發展本文將以一個宏觀（Macro）的視角進行檢視，而選擇該議題則如前言所述，是基於其為當前國際關係議題中最普遍性與最重要的環境政治議程，因此作為一國際關係的研究論文，選擇此建制亦有其必要性。因此具體而言，由於 UNFCCC 為第一份國際協議，並在

1997年透過京都議定書的簽訂完成而建構了一個較為完備的國際環境建制，¹⁷但隨著京都機制第一期承諾的2012年到期日之逼近、京都議定書從生效到談判的耗時且成效不彰以及如美國未批准京都議定書等因素，催生新的國際協定成為環境議程近年的重要議題，因此在2007年的氣候變遷框架公約第十三次締約國大會上，通過了峇里島路線圖(Bali Roadmap)，確立未來開啟後京都機制的協議基礎。¹⁸故從1997年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訂京都議定書到2007年峇里島路線圖的十年間，在實質上仍是屬於前京都機制時期的階段，故就京都議定書的分析本研究將以此時期的相關資料進行檢閱(如IPCC、UNDP以及其官方會議資料的報告)。

二、研究限制

本文礙於時程與資源，不進行學者訪談與一手資料的缺乏是主要缺憾，但這不阻礙筆者欲提供一個學術理論思辯的豐富性。此外，就經驗性資料的分析而言，本文關注的是一個大面向的京都機制發展，故較細節的技術性資料將不進行回顧，而大抵就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京都文本與三大機制以及運作結果進行討論。

肆、內容安排

依據上述的說明可知本論文的内容安排重點可大致分為五大部分：

一、緒論

本章透過說明筆者的研究思考與啟發以及文獻所分析出的初步研究框架，使讀者可清楚明瞭本文的研究動機、目的、架構以及本文的學術研究價值。

二、主流環境安全的論述

¹⁷這份協議於1992年在巴西裡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通過，目前有191個締約國，設定強制性減排目標。《京都議定書》在1997年《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它是設定強制性減排目標的第一份國際協議，2005年生效。根據這份協議，從2008年到2012年期間，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目前已有170多個國家批准了這份協議。

¹⁸京都議定書39條中規定在第一承諾期最後一年2012年結束前7年(也就是2005年)便應該討論已開發國家在第二承諾期2012年以後(即所謂後京都時期 post-Kyoto)之減量問題。

本章中筆者將就當前主流環境安全概念的發展以及其研究的發展進行詳盡地整理與歸納，將環境安全論述由原本複雜且多元的脈絡中分出理絡，並勾勒出其核心關懷。

三、性別觀點對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

本部分本文將透過女性主義的環境與安全論述，針對第二章不同的主流環境安全取向進行批判與比較。而採此兩論述是由於女性主義缺乏直接針對環境安全概念的觀點，故筆者將先就上述兩個途徑評析主流的環境安全論述，提點出當前主流環境安全論述上的性別盲現象，並進而建構出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安全論述。

四、京都議定書的性別環境安全觀點

在第四章中，筆者將透過主流國際安全建制以及環境安全的研究單位的環境安全論述探討，分析當前實務上的主流環境安全論述趨勢。次則將就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發展與結果，以一個性別環境安全論述為主軸進行分析與批判，並透過這樣的過程，勾勒出京都議定書的環境安全論述，並據此提點出其中的性別盲現象以及對來後京都時期的發展提出本文的期待與建議。

五、研究結論

在結論部分，本文將針對性別環境安全觀點在學術領域以及實務的應用上進行評估。就前者而即是，提出本文對未來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學術發展的展望；而後者所要闡述的則是筆者基於性別環境安全觀點所對未來後京都時期開展的期待。

第二章、主流環境安全的論述

本章將透過一個縱向的史觀視野，詳盡地說明與分析當前主流的環境安全的發展，並就當前的相關環境安全論述進行梳理。

第一節、環境安全的發展背景

冷戰結束後，國際關係進入了新的時代，而同樣地傳統安全議程如戰略研究、地緣政治及嚇阻理論的研究主導地位也相對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新安全議程受到重視。因此對於「安全」定義亦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如 Ullman (1983) 認為，安全是以下一系列事件或行為所造成的結果。首先，極度地或持續一段時間地出現可能會對於國家人民性命一定程度的侵害現象；次則，這種威脅將限縮了國家、政府、或非政府部門（個人、團體、公司）政策的選擇空間。

因此，自1980年代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三次大辯論後，高階政治不再是唯一的研究議題。而同樣地，安全研究的發展亦從傳統安全研究取向逐步朝向更廣義的安全主體，例如1997年聯合國人類發展計畫大會開議時，ul Haq (1997: 84) 博士在開會前的致詞時談到：「安全在當今的發展已經被解釋為一種屬於人的安全，而非領土；個人的安全，而非僅是國家；透過發展來達成安全，而非武裝力量。而安全亦屬於每個角落的所有人，包括了任何民宅、工作場域、街道、社區以及各種其可能所處的任何環境」。

而環境安全的概念雖也在1980年代後期後才興起，但第一個連結氣候變遷與安全的論述可追溯到更早期。例如《這個危險的星球 (This Endangered Planet)》一書可算是第一個談到環境安全概念的著作，該書提出了生態政治的理論法則，認為面對氣候變遷的調適 (adaptation) 應該注意「有效的間隔時間與調適」、「可能發生的衝突傷害評估」以及「調適過程中的操作方式」三個面向 (Falk, 1971)。

但真正開始使用「環境安全」此措辭，則由 Lester Brown (1977) 的《重構國家安全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一書中所提出。但最早的濫觴與萌芽時期亦可追溯至反思主義的 1960 年代。這個年代除了反戰、嘻皮文化以及民權

運動之外，也是一連串環境運動的開始。¹⁹此時期對於環境問題的重視，可從兩個面向觀之。在學術或一般性論述方面，有針對人口成長危機的探討（Ehrlich,1968）、DDT 農藥對人類社會及自然的傷害(Carson,1962)、非再生資源的濫用及破壞的研究（Meadows et al, 1972）以及對於政治及社會制度缺陷的反省（Hardin ,1968）等。

而另一部份則是國際實踐面上，例如羅馬俱樂部(The Club of Rome)在 1972 年的「成長的極限 (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以及聯合國 1972 年於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所召開的環境會議。²⁰就後者而言，此次會議代表國際間開始正視環境安全的問題，因此其成立了聯合國環境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UNEP）來管理相關的國際環境問題。

而自此以降的三十餘年來，這些國際環境倡議的建制工作快速進展，例如，管制跨國進行野生動植物交易的華盛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保護臭氧層的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col)、管理有害廢棄物越境處理的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的陸續簽訂完成。而 1992 年於巴西里約所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又稱地球高峰會議）中，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出的「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成為此次地球高峰會的藍圖。²¹此外，諸如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以及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等數十項公約及宣言，皆是在聯合國的主導下完成簽署。而統合聯合國相關工作的永續發展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在 1992 年底正式成立；另外，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並建構了重要的碳排放減量標準、碳排放交易方式以及清潔發展機制，以及訂定

¹⁹可參閱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6%9C%83%E9%81%8B%E5%8B%95>。

²⁰聯合國於 1972 年 6 月 5 日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廣稱為斯德哥爾摩會議，共有一百一十三個國家和一千四百多名國際組織的代表參加。

²¹該報告首次承認了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呼籲各國重新檢視其發展策略與方向，並通過 Agenda 21 作為各國擬定永續策略的綱領。

相關年限標準。因此就環境建制實踐而言，成果可謂空前。

然而儘管有上述的發展，全球暖化問題以及各地環境仍持續惡化，因而引起國際社會與學術社群對於環境治理的關切，而相關的論述與研究都發現，在國際體系中全球環境治理面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以及挑戰，例如存在著治理體制過於分散、治理資源缺乏、國際環境治理決策執行不力、貿易爭端與環境議題相互糾纏等，皆是造成環境合作成效不彰的因素（Ward,1996；Grundig et al, 2001）。因此相關研究亦出現如針對現行全球環境治理體制進行改革的討論，例如仿效聯合國創設世界環境組織（Worl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 WEO）等論點相繼出現（Biermann,2002：297-315）。而當前全球環境治理所受到的批評，本文整理有以下五點：

1.環境條約過多且零碎，難以達到整體安全功效

目前的環境條約過多且分散，每一種環境議題都有各自相關的條約。故此將近 500 個以上有關環境的國際公約和協議，其中一半來自在 1972 年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第一次聯合國環境會議後，當中更有 41 個被 UNDP 認為是核心環境公約。而這樣的結果所出現的是條約單邊化與合作成效不彰的問題。

2.處理機關過多，倒之會議過於瑣碎

各條約設立之小型秘書處、辦公室過多，各種會議散佈全世界各地、協商的回合次數直線上升，發展中國家外交人員疲於應付，甚至無力參與，此點在京都議定書的談判會議過程中即可得到例證（Villagrasa,2002）。

3.條約間內容重疊度高且未能相互結合

環境議題具有跨界性，因此往往個別環境問題會演變成區域或全球性的範圍，²²而現今許多條約在內容上皆有相互重疊的地方，但是所訂定的議程

²²例如中國的松花江河川污染事件，周邊國家如日本及俄羅斯都相當擔心污染對該國家區域的生態破壞，可參閱：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5-12/2005-12-03-voa25.cfm>。

又未能互相配合。²³

4. 個別條約缺乏強制性與執行力

許多條約定訂後得不到國家的支持，或是缺乏執行力與執行速度慢。最著名的就是京都議定書，雖然首次建立碳排放量的強制限值，但關於如何執行和是否執行有重大爭論，特別是美國不願意處理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到2001年小布希剛上任時宣佈拋棄京都議定書時達到頂峰（宋燕輝，2001）。

5. 多數環境條約缺乏監督和檢測準則

環境條約的執行需要監督與測量的準則，但是目前許多國際條約都十分缺乏，著名的條約如針對氣候變遷公約的「京都議定書」以及關於生物安全公約「卡塔那基議定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都缺乏監督和檢測標準。

隨著對於環境議題的重視與發展以及環境建制的成效不彰，傳統安全社群亦開始其重思冷戰時期的國家間軍事衝突所造成的潛在環境威脅（Falk, 1971；Brown, 1977；Ullman, 1983）。²⁴但在冷戰時期的兩極穩定條件下，環境安全的概念仍未受到重視，²⁵而直至冷戰結束後安全議程（agenda）的研究開始出現多元的發展，強調安全研究的視角元化發展及建構相關著作也才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Mathews, 1989；Prins 1990；Myers, 1993a；Renner, 1996；Buzan et al, 1998）。

而研究單位中重要影響人物如 Jessica Mathews 亦強調安全議程必須納入環境變數作為考量的重要項目之一，且必須積極發展此領域的研究；²⁶此外，政治人物如高爾（Al Gore）在擔任副總統時期即試圖將環境安全的概念納入美國的國

²³舉例而言，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是從臭氧保護協商而促成，但卻未考慮臭氧耗竭和氣候變遷之間的複雜相互關係，因此該議定書有個荒謬的結論，即以發展氫氟碳化物(HFCs)以取代造成臭氧破洞的氟氯碳化物(CFCs)，但卻完全不管前者是潛在溫室氣體的事實。另外，如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條文裡鼓勵造林以吸收二氧化碳，但卻未考慮單一林種對生物多樣性的傷害，也未顧及大多數京都議定書的成員國也都是生物多樣性公約會員國的事實。

²⁴特別是指軍事對立下的安全困境所造成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試爆對於環境的破壞。

²⁵可從冷戰後的相關論文著作及國際建制數目得出比較結果。

²⁶Jessica Tuchman Mathews (born 1946) 在1997年起任職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董事長，此單位為華盛頓的外交政策智庫。資料來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negie_Endowment_for_International_Peace。

防計畫及政策之中 (Butts,1999)。這些發展都在在呈現出近來國際上對於環境安全概念的重視。

而環境安全概念的發展，特別在其還尚未有一完整的理論作為基礎下，其所受到的批評亦不少，這些對於環境安全研究的批判大致可分為傳統研究派與批判派兩種不同聲音 (見表 2-1)。傳統安全研究者認為安全研究的重點應該要放置在基於強烈意圖所導致的社會衝突上。但批判派認為，將環境安全的議題放進安全研究的框架中固然新潮，但最終仍會發現此概念仍是與安全較不相關的面向。傳統派更甚至認為，此概念應用在國家安全議程將會面臨將環境議題軍事化的潛在危險，因此，環境問題應是屬於政治及經濟來解決的層次，而非是安全及制度的問題 (Deudney,1993；Levy,1995)。

批評派則認為環境安全的概念是北方國家為了干預南方國家事務的工具，同時也是北方國家試圖混淆其乃造成環境不安全之根源的手段 (Dalby,2000,2002；Peluso and Watts 2001)。

表 2-1：批判環境安全概念的學派

	傳統研究派	批判派
對安全研究的主張	刻意造成的社會衝突才是安全研究的重心。	安全研究應多元化。
對環境安全概念的認知	環境問題為政治與經濟層次，與軍事安全無關。	環境安全是北方國家的思維，用以剝削南方國家。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然而儘管雖有上述的批判，從至今的發展觀之，以 2007 年聯合國安理會在 4 月 17 日所召開的會議為例，該次會議上首次談到了全球氣候變遷對環境安全的衝擊。而英國倡議以此次會議的目的亦在於，其認為當前氣候變遷衝擊所導致的邊境環境污染、移民現象、資源短缺、社會結構壓力以及人道危機等現象，將

威脅國際的和平與安全。故在此次會議討論中，英國外長 Beckett 認為氣候變遷已影響當前逐漸高度互賴世界，而其帶來的諸多結果將成為威脅集體安全與和平的重要因素。

因此，儘管傳統派與批判派對於環境安全的研究本身有所批判，但環境安全研究的本身似乎已逐漸成為主流。以 2007 年安理會的討論，即可視為其作為國際安全研究議程的重要性依據。因此探討環境安全的理論及論述發展，有其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故在第二節當中，本文將就當前環境安全理論的建構進行梳理，並就各別途徑的差異進行比較。

第二節、當前主流環境安全的論述

安全意味著不會曝曬到危險，也即是不會受到偶發事件影響相關的安全主體 (Dower,1995)；亦或者，安全即是人們可永續地享受他們認為重要的生存與福祉之行為 (Soroos,1997)。而環境安全與只著重軍事議題的傳統安全不同，其研究的層面更加廣泛及複雜，學者 Wilde (1994:161) 提出了以下環境安全理論值得研究之範疇：

1. 「生態系統的破壞」，包括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的破壞、森林的濫伐、臭氧層破壞等整體環境系統性的傷害。
2. 「資源消耗」，對於自然資源的大量消耗及污染，如石油與核能廢料等，而資源分配不均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3. 「人口問題」，人口增長所帶來的糧食、能源及水等天然資源的需求分配不均等問題，以及移民問題等。
4. 「糧食問題」，如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與飢荒問題；對於糧食的過度消費等。
5. 「經濟問題」，包括經濟生產模式所可能帶來的環境結構性破壞、資源分配的不公義及剝削的問題。
6. 「暴力衝突對環境的破壞」，即是指環境損害所造成的衝突以及因為衝突

或內戰所造成的環境破壞。

此外，Myers 等人從區域與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做個案性的經驗探討，其認為這些區域地區的環境問題所反映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包括了人口、臭氧層破壞與全球暖化、物種滅絕及環境難民。他認為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後果足以與軍事安全同時進行權衡考量，例如，花費在戰爭以及軍事武裝的維持可能造成的環境資源成本，如石油與糧食的消耗等等。而這些環境與資源若匱乏將最終造成國家安全的威脅（Myers,1993b；Myers and Kent,2001）。

故從上述的研究面向看來，環境安全的基本問題即是，環境到底是否足以成為安全議題？而此議題最重要的重點即是，如何判別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及影響程度。而在當前科學主義當道的社會結構中，科學家勢必在這研究取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即便科學方法與邏輯是主流，科學家之間仍有極大的爭議，且科學社群對於知識及文化的主宰，使得其對於環境問題的界定已足以影響公共政策及政治領域（Biermann,2000：34-36）。

就其爭議部分，本文將其簡單區分為樂觀派與悲觀派。樂觀派者認為環境問題被誇大了，人類擁有創新與適應環境的能力足以面對環境的變遷人類會有其面對及解決的辦法（Calvert and Susan,1999：217）；而悲觀派則認為環境生態的壓力將會為全人類及國家帶來災難，而其也是當前較為主流的論述（Giddens,2009）。²⁷

故就人類是否已經處於環境危機的開端（threshold）這個問題所引發的爭議上，主流論述的悲觀派認為，人類行為本身即無可避免地會破壞環境並可能造成人類間之衝突（Homer Dixon,1991；Meadows and Randers,1992）；且基於環境負載力的角度而言，地球也已無法持續承擔人類目前所造成的環境破壞（Brown and Kane,1994；Rees and Wackernagel,1994；Sachs,2008）。

而上述這些看法大致被認為屬於新馬爾薩思主義（neo-Malthusism）的思考，

²⁷如 Jeffery D Sachs 於 2008 年之著作《66 億人共同繁榮》書中，認為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已超過以往，並認為世界上的各種經濟危機幾乎都源自於環境問題，書中同時提出了許多數據，認為人類已經來到存亡絕續的關頭。

其多元的思考有別於傳統馬爾薩思主義 (Malthusism)。²⁸故悲觀派的分析研究若就個別的議題探討面向上，可將其分為以下四部分：

1.人口面向

人口面向上的研究以古典馬爾薩思主義的人口成長論為最主要的論述，即是其認為人口的線性增長所造成的過度需求將導致環境的負載力過大，進而引發經濟危機。而關於現代人口成長所造成的問題以羅馬俱樂部所發表的「成長的極限 (The Limits to Growth)」報告可為代表 (Meadows et al, 1972)。²⁹

此外，對於人口成長的恐懼，Ehrlich 亦認為人口增長同如一顆未爆彈，為國家帶來潛在危機 (1968: 16)；而人口問題往往又與糧食是否供應充分劃上等號，在一些國家或區域中，高出生率與低糧食供給恐怕是人口成長最大的隱憂。因此 Brown (1965: 34) 談到：「在低度開發區域所發生的糧食問題恐怕是未來數十年最難以解決的問題」。Brown (1995) 後續並關注中國大陸的人口問題，認為像中國這類快速經濟發展的國家也恐怕會面臨難以自給自足的問題。由其自 1974 年所成立的看守世界研究中心 (Worldwatch Institute) 亦是持續不斷關注此問題的一個重要研究單位，例如 2005 年「世界現況報告：看守世界研究中心邁向永續社會進展報告」中即有關於檢視人口與安全的關聯性報告以及建立糧食安全問題的探討 (2005: 28-53; 81-105)。

2.非再生資源 (non-renewable resources) 面向

非再生資源面向上主要針對工業化、都市化以及去森林化的發展進行探討，除了傳統上被視為對於農地、土地及糧食生產等面向的侵害外，這些破壞亦會延伸到非再生資源上，例如 1970 年代出現了引起政治與經濟動

²⁸Malthus 關注的層面聚焦人口成長所造成的需求爆炸危機問題，認為人口將自然地以「幾何級數」增加。參閱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Malthus。

²⁹報告內容中除了人口面向外，亦探討了另外四個面向，分別為糧食生產、工業化、污染及非再生資源使用問題。參閱 <http://www.clubofrome.org/docs/limits.rtf>。

盪的第一波石油供給危機。而也自此，對於石油耗竭所可能造成的危機，已成為最廣泛害怕的恐懼（Gever,1986；Roberts, 2004）。

3.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

此面向為近年環境安全研究最熱門的領域，主要關注於全球整體的氣候變遷所可能對人類（國家）的安全威脅，例如 2007 年德國全球變遷諮詢委員會（German Advisory Council on Global Change），出版了有關於氣候變遷所可能導致安全風險的報告，其指出氣候變遷及全球暖化等現象會造成如水資源匱乏、糧食不安全、極端天氣以及環境大規模遷徙移民與難民潮的出現。

而這類研究又如 2007 年 3 月，美國民主黨伊利諾州參議員 Richard Durbin、共和黨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參議員 Chuck Hagel 以及七位共同資助人推動的「氣候變遷安全監督法案（Climate Change Security Oversight Act）」，要求國家情報局評估是否氣候變遷將會為國家安全帶來威脅。此外，根據 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小組（包括前美國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局長 James Woolsey 與擁有諾貝爾獎的 Thomas Schelling 等人）估計，溫度若上升攝氏 1.3 度，到 2040 年將會出現國家內部的大規模環境移民潮，並造成邊界的緊張；同時將會有大規模的疾病以及資源缺稀的現象出現；而攝氏溫度若上升更高至 2.6 度，到 2040 年將會出現難以預期的非線性社會事件，包括突然地大規模移民、農業形式以及水資源供應的瞬間改變、新型傳染疾病以及世界沿岸各地區的洪水氾濫，而國家間為了資源進行武裝衝突的機會將會增加，甚至有可能會爆發核戰（Campbell et al,2007）。

另外，就氣候變遷與國家安全的部分，其主要的核心關懷為「國家主權」是否被侵害（Fidler,2000）。故具體而言這類的研究除衝突侵害主權的議題外，亦有針對國家領土主權的探討。例如相關研究認為，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將侵害國家的領土，進而引發國家安全的問題，如孟

加拉海平面若上升 45 公分，則孟加拉將失去 10.9% 的領土，而以海平面上升為例子延伸，探討這種氣候變遷的結果對於海島國家的社會與經濟衝擊將更嚴重。國家安全與氣候變遷亦有國內政治面向上討論，其一般的論述大致為，通常國家的政治及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穩定下，可以合法化該政府存在的正當性，但氣候變遷可能造成國內經濟條件的衝擊，因此亦有可能影響政府政權的正當性。也因此，氣候變遷對於國家政府的國內政權安全層面亦有影響；而氣候變遷亦在某些層面上會間接地造成的國內政府正當性衝擊，例如其會影響個人與集體的經濟條件、水資源缺乏及天災對國民的健康帶來影響、國家福祉提供及軍事能力的下降等，而這些皆果都可能造國家政權正當性間接地受到質疑（Barnett,2003：8-10）。

此外就衝突面向而言，亦有相關實證研究提出氣候暖化與戰爭衝突爆發的因果關係（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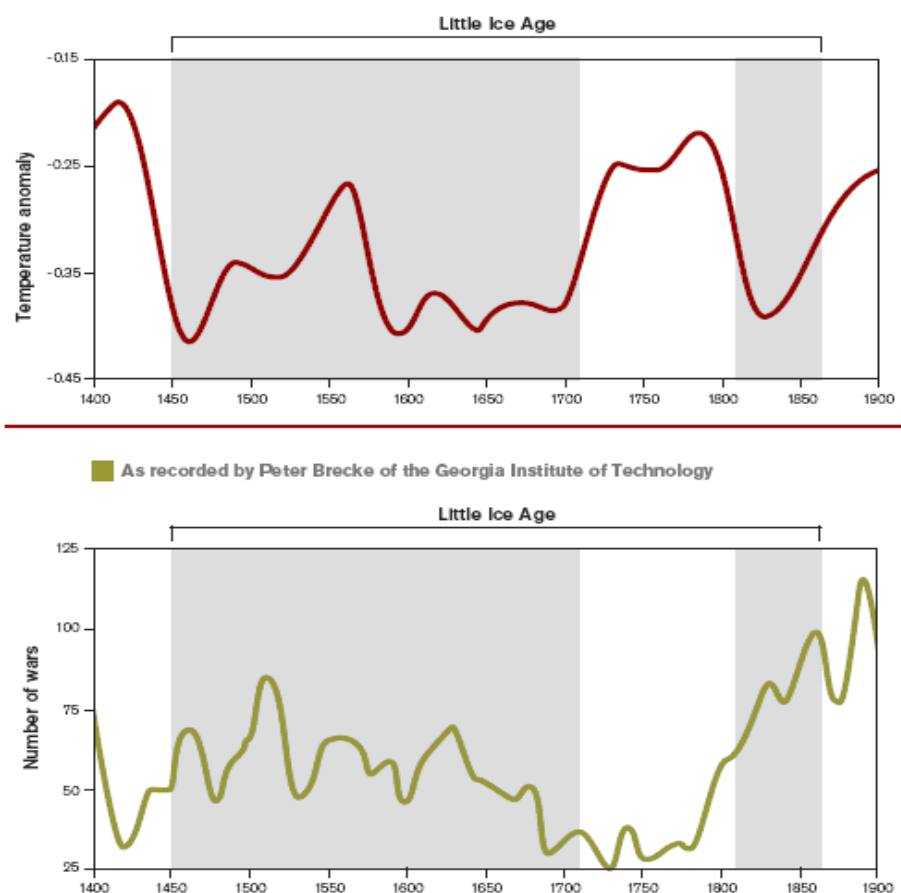


圖 2-1：溫度變化與戰爭圖

資料來源：Jürgen Scheffran (2008：20-21)

作者翻譯整理

就上圖而言，該研究認為，整體氣溫變化的趨勢若幅度愈大，戰爭的次數似乎有明顯地相對應關係。但因為決定或導致戰爭的因素仍相當複雜，例如決策者個人層次的考量以及意圖認知的錯誤以可能皆是造成衝突的原因，故這樣的因果關係，顯然仍較欠缺說服力。

4.發展面向

關於發展面向上，悲觀論者從結構因素來分析，認為不論是人口的發展與經濟成長都是在不平等的結構上進行，而這樣結構的存在從貧富差距逐漸拉大 (UNDP, 1999：38)，以及不均等地醫療衛生及生活品質即可看出端倪。³⁰故此種剝削式發展的結構，亦使得許多悲觀論者開始質疑自由市場經濟的正當性，而因此歸結此這種對於環境的剝削與破壞主因就是來自於當今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由其導致的人口過剩現象。而此種共有物的悲劇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只能藉著強大的國家力量干預來化解 (Hardin, 1968)。

因此，就上述四個的面向個別議題可以發現，環境安全研究相當多元，且當前主流的環境安全可算是一片以悲觀派為主流的思維當中。特別從 IPCC 這樣的研究組織在 2007 年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及聯合國安理會針對氣候變遷議題召開會議，這在在都顯示出當前悲觀派居於主流的地位 (Giddens, 2010)。

故本文即從悲觀派的相關研究中，歸納出當前環境安全研究的三個不同取向，分別為探討環境匱乏與暴力衝突關係的「環境衝突取向」；討論環境否嚴重影響人類生存安全的「廣義環境安全取向」；以生態為中心的，強調生態主體性的「生態安全取向」。

³⁰可參閱連結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1999_ch1.pdf。

壹、環境衝突取向

衝突取向的環境安全研究，是環境安全研究中最受到主流安全研究社群重視的研究途徑。而關於環境衝突論述的概念最早則由 Kaplan (1994) 所提出，其認為「環境安全」在 21 世紀的當代應等同於國家安全利益，而環境因素下所造成的人口問題、疾病擴散、去森林化 (deforestation) 及土壤的破壞，將會引發大規模的移民潮，進而造成群體間之衝突。而這些危機即便連發達國家也無法倖免。³¹而這樣的論述亦可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也即是探討為過去消逝的文明是否是環境衝突所導致 (Diamond,2006)。

Kaplan 所提出的論點，在學術設方面則有 Homer-Dixon 以實證資料探討 20 年來的相關環境衝突研究，其主要針對環境匱乏與暴力衝突變數因果關係的學術探討。而基本上他對 Kaplan 的論點抱持相同的看法，即是其也認為環境匱乏的確可能帶來包括如叛亂或族群衝突等內部衝突；且導致這些暴力衝突的匱乏的還境因素亦包括了土壤的逐漸貧瘠、乾淨水源的不足以及森林的逐漸被破壞，而其中又以發展中國家所受到的衝擊最深。

Dixon 發現暴力衝突的因素往往始於政治、經濟及其他顯性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故其結論認為環境匱乏並非是直接引起暴力衝突的唯一因素，而僅具有間接影響力。而以下為 Dixon 所提出的建構環境安全理論的方法 (1991; 1994; 1999)：

1. 探討環境變遷與迫切威脅的相互關係

Dixon 認為在國際關係中，北方富有國家所受到的環境衝擊及適應力較好，而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威脅較為迫切，主要原因有三。首先，由於開發中國家多半仍較仰賴傳統自然資源的利用，因此環境破壞直接造成了開發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力衰退、經濟蕭條、人口遷移以及社會網絡關係的破壞；次則，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結果亦會導致，族群衝突問題、國內動亂

³¹Kaplan 為美國籍記者，著有相當多之著作，其提出的許多論點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討論，可參閱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D._Kaplan。

甚至內戰等情況：第三，上述這些現象（或變量關係），不同於馬爾薩思主義那般，對於人口與糧食的持著決定論之關係；相反地，這些關係因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例如，探討國家對於環境變遷的適應性分析即是此種關懷。

2. 因果關係建構與假設驗證

在環境安全理論建構上，Dixon 認為環境匱乏與造成衝突的關係在環境安全這新興領域中，可透過下述的問題取向為初期的理論建構與經驗研究帶來較多的幫助。這兩個取分別為，第一，探究環境、衝突與社會變遷及調適（adaptation）之間的因果關係；第二則是對這些變項的因果關係進行假設檢驗。而從這兩個角度出發的主要原因在於，生態與政治關係的複雜性若有一強烈的因果關係，將會使得環境議程更能在政治（政策）場域中發揮作用，也有助於建構一套相關的研究架構。

而 Dixon 對於環境匱乏與衝突關係的具體研究方面，其將環境匱乏分為三個不同的面向（見圖 2-2），並認為這些即是導致環境匱乏的主要原因，三者分別為，「供給不足導致的匱乏」，主要是指非再生資源的破壞所導致的環境匱乏，例如對於土地及土壤的污染等；「需求過量的匱乏」，主要指人口的過度成長以及群眾對於資源需求（使用）量的大幅增加所導致；「結構因素導致的匱乏」，結構因素是指起因於環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以及資源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且大量耗費的情形。而環境匱乏亦會間接地造成一些社會後果，這些後果包括了族群衝突、國家衰微所造成的軍事政變以及經濟資源爭奪的衝突（Homer-Dixon, 1994：96-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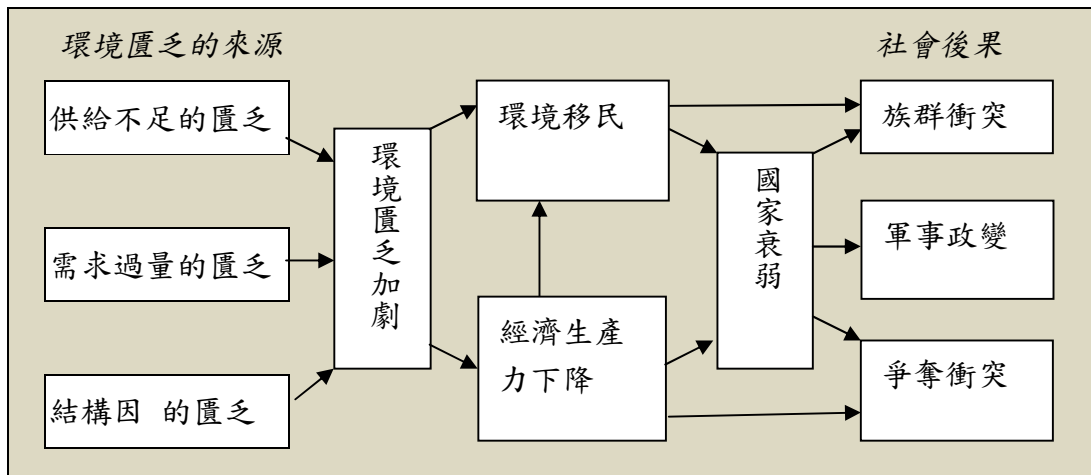


圖 2-2：環境匱乏的來源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後果圖

資料來源：Homer-Dixon (1994：31)，作者翻譯整理

Dixon 所提出的環境匱乏與暴力衝突的關係（圖 2-2）如同前述，其研究結論認為環境匱乏並非是單一且直接的因素，故單以環境匱乏並不足以來解釋衝突爆發的原因。而必須考量其他因素，如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因素與其交互作用下的結果，故環境匱乏只是其中的間接變數之一，且隨著環境破壞的加劇，暴力衝突中的環境因素的重要性則亦會逐漸顯著（Matthew, 2002：110-112）。

此外，Dixon 的環境衝突研究又與新馬爾薩斯學派保持距離，其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調適力不足，才是導致無止盡惡性循環的環境負載力（Environmental Capacity）不彰的主因，而這也正是環境匱乏足以成為引發暴力衝突的重要因素。故非如馬爾薩斯學派所強調的是由於市場經濟轉型與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爆炸性增長所造成。

故總的來看，Dixon 的環境安全理論理論主要有三大核心關懷，即是「環境匱乏」、「社會適應程度」以及「社會衝突」。而這些面向是個交互作用的過程。因此，這種交錯的動態關係並非僅是單純的線性邏輯，而是不論在政治或生態體系上皆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結果。故其認為環境匱乏所造成從地方（Local）到全球（Global）的衝突有以下五種（Homer-Dixon, 1999：5）：

1. 「地方性衝突」，例如工廠廢氣排放與建築水壩所造成的爭議與衝突；
2. 「族群衝突」，由環境破壞所到至的遷徙移民所加深的社會裂痕；

3. 「市民衝突」，由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經濟生產力下降，造成如政變、叛亂或盜匪橫生的問題；
4. 「國家間衝突」，由環境資源匱乏所造成，例如水資源所造成的衝突；
5. 「南北衝突」，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在許多環境問題上，如全球暖化、臭氧層破壞、生物多樣性危機以及初級產業生產力下滑等現象所導致如減輕、調適或補償原則上的衝突。

而針對上述相關面向的討論，其研究提出六個重要的環境衝突研究結論，分別為（Homer-Dixon,1999：133-177）：

- 1.環境匱乏導因於再生資源的破壞、人口激增及資源的分配不平等；
- 2.環境問題所帶來的直接社會後果為農業生產力下降、經濟衰退及人口遷移問題；
- 3.環境匱乏引發的團體、族群、社會及國家間衝突，是肇因於資源爭奪下的社會後果所導致；
- 4.環境問題所面臨的社會適應過程，國家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 5.社會適應過程的失敗將容易導致社會衝突的發生；
- 6.環境匱乏問題難以證實在經驗上成為國家間直接衝突的直接因素，但具間接的影響效果。

而除了 Dixon 之外，其它對環境匱乏與國家衰落有關的討論亦認為環境匱乏的因素並非是造成國家治理能力衰弱的全然原因。而是須從三個指標來衡量，第一，物質生活水準；第二，貿易的開放程度；最後則是民主化的程度。而環境變遷似乎只影響上述三個指標的前兩項，因此，可以看出環境變遷仍非完整的因素（Esty et al,1999）

至於其他的環境衝突研究取向亦有由瑞士的環境與衝突計畫（Environment and Conflicts Project, ENCOP）與瑞典奧斯陸（Oslo）的國際和平研究組織（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Oslo, PRIO）。就 ENCOP 而言，該計畫由 Baechler 所主持，其主要聚焦於環境衝突與社會轉型的關係，特別是針對由自

足社會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探討。該研究認為依賴自然資源的鄉村、山區以及草原等地區，若出現政治關係緊張與資源分配不平等的情況下，特別容易導致暴力衝突。而該研究在許多相關的個案檢視中發現，當這些社區（community）抗拒資源的被剝奪以及肇因於大規模發展計畫所造成的環境破壞時，衝突爆發的可能性較大（Brown,2005：3）。

PRIO 的研究關注面向則不同，PRIO 認為環境匱乏所導致的衝突最易出現在以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當這些國家內部出現群體間爭奪大量的資源控制時又特別容易發生，而這樣的觀點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Collier et al, 2003）

故總結上述的討論，大抵可以發現環境衝突的取向主要的核心論述即是人類將會因自然資源的因素而導致暴力衝突。而其相關的討論又可以分為兩大部分，首先為探討暴力衝突原因、起源與資源的關係，這類型的論述關注如資源獲取、人口增長、環境遷徙以及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如 Kaplan（1994）、Dixon（1999）、Brown（2005）等人之研究；次則即是針對環境資源衝突所對國家帶來的影響，如 Myers（1993a）、Scheffran（2008）與 Dyer（2008）的討論皆是相關的例子。

貳、廣義環境安全取向

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環境安全研究是研究環境議題常見的一種論述取向，其主要特徵在於並非針對國家安全或以衝突作為核心關懷，而是較以一個人類安全取向的思維出發，而這類型環境問題的研究，其實遠比環境衝突的論述還早，例如 Carson（1962）以及 Falk（1971）等人的研究都可算是此種研究取向的論述；但這些論述在人類安全的概念尚未受到重視之前的冷戰時代，根本不被認為是一種安全研究。

不過，隨著冷戰後的安全研究多元化，相關的論述本文認為都可以將其歸納為此分類下。故本文的分類標準其實很簡單，即是將非以國家及軍事衝突作為研

究核心關懷的環境安全研究論述，皆歸類在此框架下。

而就此取向的研究而言，科學社群相當早即開始探索與評估一些重要環境問題的現況、成因及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其主要針對的重要環境問題如，氣候變遷與暖化、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臭氧層破洞、淡水枯竭、沙漠化及土壤貧瘠化、去森林化與森林資源枯竭、海洋生態污染與相關資源耗竭以及持久性的化學污染物等（李河清，2007：520-536；郭秀清，2007），而這些討論都可算是具有廣義安全的途徑的關懷。

但除一般性的科學研究外，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亦關注當前環境發展與知識社群的議題，這些相關研究認為長期以來北方國家主宰的全球科學研究社群現象亦反映在環境安全議題上（Biermann,2002）。例如 Agrwal 與 Narain（1991：24）曾談到：「氣候變遷議題的議程（agenda），例如沙漠化，土地與水資源的問題，的確應放在全球議程當中探討，但這種西方所建構的一套議程及研究架構，使得這個議程備受質疑，也同時使其更偏向政治」。以實例而言，如 IPCC 對於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的議題非常重視，且儘管 IPCC 亦認為這項議題不僅僅只影響北方國家，亦包括了發展中國家。但在關於雨季變遷與農業問題的影響上面，其著墨的就不如氣候變遷議題，而這些雨季的問題，在亞洲如中國、印度與東協國家中皆有重要的影響（Biermann,2002）。而又如 IPCC 在 1995 年所採取的減緩而非調適的策略，一些南方學者分析了關於南北國家間的成本分配後，他們發現北方國家在短期雖承擔了較大的成本，但南方國家則必須面對長期傷害以及較大的調適成本，但以北方國家研究者為多數的 IPCC 卻視而不見（Sharma and Kumar,1998）。因此，這類論述認為造成上述這些情況的重要原因即是北方國家所主導的 IPCC 與狹隘北方視野（忽視發展中國家的異質性）的科學社群所致（Biermann,2000：18-20）。³²

此外，亦有相關研究認為當前的環境安全研究將環境潛在問題放大的是為了

³²除了 IPCC 本身外，其依賴的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 (IGBP) 中，北方科學家的比例高達百分之 86。

北方的利益。因為北方國家數個世紀以來的工業化污染，才是最先造成全球環境破壞的主因，而北方得到的美好經濟果實後卻要才起步發展的南方國家即承擔環境破壞的責任。故其認為，此種過度誇大環境問題而要求南方國家盡環境責任的說法根本是干預南方國家的一種手段。由此亦可推論出為什麼環境學術社群的最主要工作即是關注於維繫北方國家的安全，而並非真正關心那些世界上的窮且低度發展的南方國家（Dalby, 1999；Barnett, 2001）。

而 Barnett（2001；2002）認為上述這種現象亦可從環境安全論述被轉化為軍事化的環境衝突論述開始談起。其認為這種軍事化過程將環境議程拉高至政治議程，但政治議程往往亦是偏狹的霸權模式。而此種基於傳統安全的論述必須面臨的問題即是，其必須在後冷戰時期二極對立結構解體下，建構基於環境匱乏所出現的敵人（威脅），故環境安全的概念因此被建構了出來。而 Barnett 認為，廣義環境安全途徑的研究與衝突途徑相反，因為環境問題亦可以是促成合作與對話的催化劑。其提出兩個路徑使環境安全的研究可以藉著其缺乏結構性與激烈暴力的特質，³³將其重新導向至「正向和平」的研究。

第一，其認為，在詞彙的定義上要必須區別生態安全與環境安全的差異。Barnett 認為生態安全的用法是對那些濫用環境安全概念的讓步，因為生態其實是廣義的生態自然範圍，未必與人類發生直接的關聯。而在區別上述概念後，在環境安全框架下，亦仍須小心界定詞彙與定義，例如使用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容易讓焦點模糊至發展而非永續，故用「永續力」（Sustainability）來取代較為妥適（Barnett, 2001）。

次則，其認為環境安全是人類藉著解決自身所造成的環境匱乏，並降低其所面對之傷害的一種和平過程。因此，得到環境安全與人類（特別如窮人與普羅大眾）是否能透過強力的社會與生態彈性能力來降低傷害的程度有關。而個人又是最基本的構成單位（有別於國家），再加上環境議題需要多層次與多中心的治理的特性，故透過這樣的過程來建構新的市民、社會與全球制度反而指日可待

³³可見 Dixon 的研究結論。

(Barnett, 2001)。

除 Barnett 以外，Conca 等人亦認為環境安全的概念亦對於建構國際和平有重要的意義，其以 1957 年的歐洲煤鋼組織經驗為例，發現藉由共享自然資源可以得到建構和平的效果 (Conca,1994 ; Conca and Dabelko,2002 ; Manwaring,2002)。故其提出幾個建構環境和平的策略。首先，必須在當前以國家安全取向而採取零和策略的政府間，建構出最小程度的信任、透明與合作機制；第二，必須在上述的基礎上改變此種國家安全的策略取向，因為此種衝突取向的安全政策往往使環境建制保護行動的功效喪失，更成為和平共存與環境合作的絆腳石(Conca and Dabelko,2002：10-11)。

因此，建構環境和平的構想並不簡單，同時也不會自動發生，且一些實質的利益（如糧食與資源的短缺）衝突的確造成合作的困難。但這並非代表合作並無可能性，因為當前環境問題正是基於長時期的國際互賴發展、科技進步與不確定性所帶來。而也正因此，為了永續發展與解決不確定性，合作形式的和平將有機會被建構。故當前增長的國際環境建制與合作、國家環境官僚、政府間組織的環境改革以及在環境組之間的跨連結網路，都可以算是此種環境合作的和平正在進行中的例子 (Conca,2001)。

由以上的討論可大抵知道，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所關注的面向是環境匱乏的負面結果所對人類造成的安全威脅。其與環境衝突研究的相同處在於其皆是人類中心取向的論述；但不同的是，廣義環境安全並非只將焦點放置在衝突的部份，而更多是與人類生存與福祉有關的人類安全關懷上。而文初步總結其相關的討論可分為兩大部分，其一是討論環境不安全的原因，包括如全球化、發展議題、疾病衛生傳染問題等，如 Biermann (2000)、Barnett (2001) 與 Sachs (2008) 等著作皆有談到相關的議題；而另一部分則是以解決環境的不安全為基礎的討論，例永續發展與環境和平建構的論述，Barnett (2001) 與 Conca (2001) 的討論即是其例。

參、生態安全取向

相對於環境衝突與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人類中心核心關懷，生態安全取向論述關注的是生態本身的安全。因此生態安全取向探討的是由人類所造成的環境主體不安全，其理論則來自於生態主義（Ecologism）的核心論述。³⁴而也正因生態安全的核心關懷與上述的兩者截然不同，故在環境安全論述的梳裡上，本文認為將其從廣義環境安全的途徑拉獨立出來探討亦有其必要性（Barnett, 2001）。

生態安全的環境安全研究論述主要探討人類為了在環境中尋求安全與健康的需求下，所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生態安全的關懷亦可被理解為，自然生態滿足周遭環境需求，但此需求不能影響自然生態的負載力，也即是自然與周遭的物種需求間，必須取得一種供需平衡的狀態（Rogers, 1997）。而 Swatuk (2006) 則認為生態安全的論述亦是指，安全是確保整體生態體系的健康狀態（包含任何地球上的各物種），而人類的生存安全亦屬於此體系的一部分，故不應特別區分出人與自然的不同，因為確保整體生態的安全亦等於保障了人類安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生態安全的研究亦易與人類中心的研究有所混淆，例如針對土壤與化石燃料等物質的資源安全研究，並不能算是生態安全的討論，因為其仍是以人類需求為基礎來定義什麼才是資源的研究關懷（Litfin, 1999）。

而生態安全的研究除了直接關注自然生態本身的安全外，另一個面向即是針對傳統安全取向進行批判。特別如對於軍事活動與戰爭所對自然本身的危害。這類型的研究關懷認為，環境本身所受到的不安全是來自於植根於歷史脈絡中的傳統安全思維，這些傳統安全的主體不論是國家或次國家行為者，其彼此之間基於爭奪自然資源的戰爭與衝突，正是造成環境匱乏與不安全的主因（Westing, 1990）。

生態安全論者認為，戰爭對環境的破壞是來自於戰爭的本質，戰爭是以自然

³⁴生態主義強調對於自然的尊重，不應將自然視為人類宰制及控制的對象，生態主義的思想架構以「生命中心論」（Biocentrism）與「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所構成，分別代表生態哲學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陳劍瀾，2004）。「生態主義」的基本特徵即是強烈質疑「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主流價值（鐘丁茂 徐雪麗，2007），網路可參閱 http://blog.yam.com/eco_tech/article/11839301。

資源為標的進行破壞，並透過掠奪與濫用自然資源使得那些戰略家足以得到軍事優勢的一種活動，且隨著幾個世紀以來的軍事發展，戰爭對於整體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愈劇，特別如核子武器的出現，即是一個相當顯著的例子（Käkönen,1994；Stone,2000；Paterson,2001）

故態安全論者透過實際的戰爭中找到例證，其發現不論是 60 年代的越南戰爭，還是 90 年代的波斯灣戰爭，皆是以破壞環境來取得軍事優勢。以前者為例，美軍為了取得在森林戰的優勢，當其發現胡志明部隊仍透過「特殊通道」源源不斷地向南方輸送兵力和作戰物資後，其極為恐慌，故時任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明確表示要設法阻止胡志明部隊向南方滲透。因此，為了阻止「特殊通道」的運輸，其不惜以戰鬥機向沿途的森林噴灑落葉劑來破壞生態環境。而考量則是，美國軍機可以透過光禿禿的樹林，清楚地看見地面目標以便實施攻擊。³⁵

就後者而言，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軍隊燃燒了 700 個科威特的油田以防止美軍的佔領。但這樣的大規模燃油行為，除造成鄰近國家，如伊朗與土耳其甚至到印度地區的黑雨現象外，其傾倒原油至波斯灣的行為亦造成鄰近海域與湖畔的大規模污染，使得遷徙鳥類與海洋哺乳類動物的生存安全受到嚴重威脅（Austin, 2000）。

但當然並非每個衝突或戰爭皆會導致如上所述的大規模環境威脅與破壞，但一般而言，戰爭所造成環境破壞即較一般社會行為來得劇烈，且其規模將取決於戰爭或衝突的型態、³⁶持久性、規模、領土的爭奪與否以及戰爭期間的戰略或戰術取向等。而這些不同型態的戰爭即不同程度地可能造成島、水域、空氣品質、噪音污染以及資源的破壞，進而造成環境的不安全狀態。而這樣的問題更隨著核子武器、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使用而加劇（Biswas,2000）。

而除了批判軍事戰爭外，生態安全亦批判國防部以及政府對於環境保護的決

³⁵可參閱網址：http://big5.china.com.cn/military/txt/2007-05/28/content_8309327.htm。

³⁶一般而言有四大型態，分別為傳統武器戰爭、生物武器戰爭、化學武器戰爭與核子武器戰爭，後三者即是廣稱的大規模毀滅武器（陳世民，2006：74），也因此其對環境破壞的程度遠較傳統武器戰爭來得嚴重。

心相當不足。以美國為例，其在海外的軍隊從事相關軍事活動時，根本絲毫不須受到美國環保署的壓力，而國防部也亦無相關的環境保護的觀念（Siegel,1996）。

故總結生態安全的論述，其研究大致關注兩個部分，第一即是討論人類行為所對環境造成的危害；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包括重新定義資源的概念，以及批判人類作為主體的謬論；次則即是，批判傳統安全的觀念，這類型研究往往從批判傳統軍事安全的作為出發，批判其對環境的破壞、忽視環境的主體性與重要性以及造成環境不安全，並進而延伸至人類的不安全狀態。

但儘管生態安全關注的面向各有不同，但生態安全研究其的基本的共通性即是其強調生態為中心的核心關懷，認為只要生態安全得到了保障，人類作為生態的一份子，自當也得到安全。

第三節、小結

從環境安全的整體研究框架而論，研究的層次與焦點基本上相當分散。而本文認為這與環境研究的本身跨足之領域極大有關。因此，就人類中心的關懷而言，舉凡人類所生活的空間，都可算是環境安全研究的範圍；但若以政治學研究者的角度出發，則南北與發展、環境合作與談判等議題才是其關注焦點；而建構環境評估測量的方法及證據，則是屬於科學社群的研究範圍。但不可否認地，這些看似在學科上風馬牛不相及的研究領域，卻因為皆涉及了安全層次上的問題，而產生了密切的關連性。

從前述的討論中可知，隨著環境安全概念發展及受到重視，逐漸地有許多著作及報告開始將環境問題與政治上的安全議題連結討論。而在先後次序上，勢必是科學社群較早開始注意到環境問題，並證實了環境所對人類可能帶來的衝擊。這點可從環境問題的原因及影響幅度被科學社群肯定及證實後，其引起政府在公共政策及外交政策上的重視，且轉化成為政治層面所近來所關注的焦點與議題趨勢得到證明（Giddens,2009）。

而人類自然科學的發展雖使得科學社群有能力預測及評估全球或區域的環境狀態，並瞭解自然生態資源與人類的密切不可分關係。但由於環境問題的非立即性以及科學預測的不確定關係，導致了所謂「科學不確定性與政策角力」的問題，例如氣候變遷議題出現在政治議程是因為科學社群（悲觀派）對於未來環境問題的警告，而科學知識社群的環境預警會受重視的因素在於其提供了強而有力的客觀證據。但因為科學社群所提出的評估，常會受到時間、機率以及主觀性等因素而備受質疑（Biermann,2000；Giddens,2009），故在環境安全政策的落實上往往爭議也較大，例如美國國內的科學社群雖然無爭議於研究結果，但在政策產出的場域中卻難以對於環境威脅會導致重大災難的結果有一致的共識。

然而，科學界的不確定與爭論並非是轉化環境政策的失敗的全然因素，而往往是因為在政治與經濟之考量下所致。以美國共和黨為例，其藉由強調京都議定書及其機制所帶來的高社會成本以及科學證據與預測的不確定性，使得其可以強而有力的主攻社會成本的問題，並將保守經濟發展邏輯、民族性、仇外主義與國內反稅制、反對工作外移及少干預的政府呼聲相呼應（Skolnikoff,2000：13-14）。

37

因此，儘管在科學社群的證實下，環境問題已受到全球關注，且安全的問題已與環境結合在一起。但主流的環境安全論述，不論是人類或生態中心的關懷，環境安全問題受到重視之主因仍是由於其被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者—國家所接受，才「有幸」成為當前的主流議題。

而國家中心的觀點所出現的性別盲，亦與當前主流環境安全的論述缺乏性別觀點如出一轍（Detraz,2009a）。但就環境與性別的論述上，其實我們隨手就可得到許多女性主義關於對生態與自然的主張，這樣的主張即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例如其反對有差別的發展、剝削及忽略，並認為所謂環境問題即是男權制的經濟發展邏輯加上北方國家對南方的剝削而得到的結果。生態女性主義亦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具有一種的殖民特質，並藉由商品與金錢貿易的發展邏輯摧毀了

³⁷出處請參閱(http://w3.mit.edu/globalchange/www/MITJPSPGC_Rpt46.pdf)。

大自然。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以協助、非暴力、多樣性、提高參與、非競爭、非層級化組織、整體性思考以及自然資源的循環使用與永續保存。反對基於男性中心的「陽性式發展」的概念（Shiva,1989）。

故由生態女性主義的論點來看，陽性發展的基礎即是借用現代科學觀以及資本主義手段來達成，而研究發現女性的科學家，即便是以父權式的科學實驗控制程序及技術作為知識基礎下，其仍比男性的科學家來得不願接受核能風險及資源的浪費。故基於此些經驗論的性質，似乎顯示出若女性能夠在許多政治的決策過程中獲得參與機會以及得到較高的權力地位，會將這些理念貫徹實行，這對於環境的保護有著更正面的意義（Barke et al,1997：167）。

故從上述的女性主義觀點可知，環境安全的研究若增加性別的觀點絕對有助於環境安全論述的豐富性。但國際關係領域以性別作為途徑的環境安全論述卻屈指可數。而這與當前女性主義在各個議題中已有一定程度探討與切入的趨勢實在不符。故在下章當中，筆者將分別就女性主義的環境與安全關懷，對上述三個環境安全的研究取向，以一個「實際性別利益」的關懷進行批判與分析，進而提出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安全論述。

第三章、性別觀點對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

本章在將以性別的視角就當前的主流環境安全論述進行批判與解構，而由於目前相關的研究中尚缺乏一個完整的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故本文將分別藉助性別的環境與安全兩個論述作為批判與分析的主軸。

而採此分析架構之因在於，當前豐富的文獻僅存在於前兩者，因此性別環境安全的觀點建構必須透過這兩個途徑來達成。故就前者而言，本文將以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論述做為批判的核心邏輯；而後者則是以國際關係領域中的女性主義安全論述為主。而在進行對於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前，本文將在第一節先回顧主流環境安全論述間彼此的批判，並點出其依然性別盲的現象。

第一節、主流環境安全論述間的批判

當前對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的批判主要皆是針對環境衝突取向的研究，而相關批判主要接針對目前最系統化建構環境衝突理論的 Dixon 研究為主，這些批判觀點認為環境變遷與暴力衝突雖有部分正相關性，並認為如政權型態、貧窮、族群與宗教衝突等傳統因素才應是主要的變數，而環境匱乏僅是衝突的低度正相關的變數之一（Hauge and Ellingsen,2001）。故這些針對 Dixon 環境衝突理論本身的批判可歸納以下四個部分：

- (1) 太武斷地將環境因素抽離出來視為單一變數，而忽略了衝突背後下的交錯關係；
- (2) 把結構因素放進環境匱乏的來源變數之中，但卻沒有嚴密區別或評估，供給、需求及結構因素之間所造成環境匱乏的程度有何差異；
- (3) 在所選定的個案上，忽略了兩個變數去探討。第一，衝突爆發之時，卻沒有任何環境匱乏因素的變數；次則為，處於衝突環境中，亦無環境匱乏現象的變數；
- (4) Dixon 認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環境匱乏與衝突的風險性較大，但卻沒有

去比較或區分是否是導因於個別政治因素（如政權不穩固）還是貧窮的本身所導致（McNeill, 2000；Hauge and Ellingsen, 2001）。

而除了對 Dixon 的研究提出批判外，McNeill（2000）則另外強調政治（菁英）的因素必須要納入環境安全的研究之中。其認為人類為了生存發展而造成的自然環境破壞是一種自然循環結果，但基於政治因素或菁英對於環境破壞，其造成的環境破壞往往甚於一般為生存目的自然消費行為。而這樣的觀點本文認為與 2003 年非洲西蘇丹（Sudan）達佛（Dafur）區域的衝突一致，³⁸即是政治菁英長期壓迫黑人族群的生存利益，並再因環境匱乏而導致的結果。³⁹

而證實這個觀點的亦如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在 2007 年 6 月 16 日的美國華盛頓郵報刊中，認為蘇丹問題可歸結為氣候變遷下該地食物與水資源的缺乏所導致的生態危機。而該篇文章引用科學研究發現繼續指出，全球氣候暖化亦造成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區以南的持續旱災，蘇丹南部平均降雨量甚至少了將近 40%。⁴⁰而這樣的結果將蘇丹地區長久以來的政治剝削問題加以點燃，進而正式爆發衝突。⁴¹因此，就蘇丹問題而言，發展中國家的調適能力不足顯然是無法解決環境危機的重要原因。而環境匱乏似乎正如 Dixon 的研究所述，間接地扮演了衝突引爆點的角色；但若以 McNeill 的觀點而言，似乎直接且顯著的因素是來自於政治菁英的考量。

此外，Soysa 則提出另一個思考面向，其認為自然資源是在主觀價值下才彰顯其重要性，因此客觀自然資源的匱乏程度與暴力衝突沒有直接的關係。例如，

³⁸蘇丹是非洲最大的國家，北部是阿拉伯人（長期執政），信奉回教，游牧；而南部則是非洲黑人部落，信奉人基督教，靠農耕及採集為生。自然資源的剝削、人口結構與經濟生活方式的不同是造成種族問題的重要因素，黑人長期遭到政府當局所歧視，故當 1999 年石油取代棉花等農作物，成為主要出口以後使蘇丹賺進大把外匯後，黑人更對石油利益的分配不公更感不滿（Salopek, 2003）。

³⁹目前於 2009 年 2 月雙方再度達成和平協議，而根據聯合國的報告從 2003 爆發衝突以來，至少有 300,000 人死於衝突之中，有超過 220 萬人無家可歸。可參閱：
<http://news.bbc.co.uk/2/hi/africa/7893861.stm>。

⁴⁰李慎明、王逸舟（編），2008，《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網路可參閱，
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zhuanti/zzyaq/2008-02/13/content_9675442_3.htm。

⁴¹進一步新聞可參見，聯合國新聞網
<http://www.un.org/apps/news/story.asp?NewsID=28835&Cr=Environment&Cr1=Exploration&Kw1=sudan&Kw2=&Kw3=>。

當某一自然資源可鞏固政治上的權力時，其造成菁英的競相追逐及競租的程度就高。由此，政治菁英對於追求某些特定資源以鞏固政治權力的慾望，似乎更可以解釋衝突爆發的原因（2000：125-127）。

故綜觀上述的討論可以得知，這些論述僅批判或關注環境衝突理論的建構，而這亦反映出安全研究社群仍相當程度立基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之上。因此廣義安全取向與生態取向的途徑則較少受到國際安全研究社群的內化與重視。而儘管後兩者取向與探討的面相皆有別於主流現實主義傳統的安全研究，但其皆未有以性別視角出發的探討。因此在下節當中，本文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對三個研究取向進行批判與解構。

第二節、女性主義的環境與安全論述

壹、女性主義的環境論述

關於女性與環境的連結，在實踐上其實相當的早，最著名與女性權益及環境生存有關的國際建制則以 1975 年在墨西哥（Mexico）的第一次的世界婦女大會（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1980 的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1985 年在奈羅比（Nairobi）的第三次婦女大會以及 1995 年在北京的第四次大會、2000 年聯合過大會的第 23 次特別會議（General Assembly 23rd special session）以及 2005 年的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召開第 49 屆大會為較重要的幾次會議。而這類型的大會主要是討論關於女性在環境資源使用（例如水、土壤等）取得上的公平與正義權利。⁴²

⁴²1975 年的第一次世界婦女大會主要的成就即是，其提倡徹底全面性地消除性別歧視、將女性參與整合至發展的脈絡中，以及認可女性過去的貢獻對於世界和平的重要性；1980 年的第二次世界婦女大會的成就主要為強調女性應有公平接近使用教育、就業機會以及合宜地醫療照護等權利；1985 的第三次婦女大會的結論則強調，建構合法的規範標準、平等的社會參、政治參與與政策決策參與；1995 北京第四次大會則達成了 12 個關於女性與貧窮、女性的教育與訓練、女性與健康、女性受暴、女性與武裝衝突、女性與經濟、女性權力與決策制定、女性在制度中的發展、女性的人權、女性與媒體、女性與環境以及女性孩童的行動綱領；在 2000 年的大會上，主要是針對北京大會的行動綱領五年來的實行經驗、遇到的困難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進行討論；2005 年的大會則主要關注兩大主題，其一為針對北京大會上的行動綱領與實踐進行全面性的討論，其二為針對當前女性與女童平等權力所受到挑戰以及未來的期許策略做進一步討論。

從這些國際建制中亦可以發現女性在當前永續環境發展上已被認知確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而這樣的結果通常與女性生活的經驗上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此外，就女性與環境的關係，儘管在跨文化層次上不可能所有女性皆面臨相同的環境變遷衝擊。但其共通處即是，雖然女性從事的家務工作雖因文化差異而相當多樣且不同，但如孩童與年長者的照育以及維持家庭的基本運作（例如食物準備與清潔）卻通常皆是落在女性的身上。而也因這些經驗，使得女性大部分對於環境變遷的經驗相當有別於男性。

故從女性有別於男性的環境經驗出發，有三種不同的主張與理論。第一是效率的觀點，即是女性與環境的特殊與緊密的連結，使得女性有著處理環境議題的優勢，因此其對於環境問題的處理將較有效率；第二為平等的論述，平等論述強調女性有權力參與那些原本被排斥在外的任何領域，而非僅只能被限縮在特定的領域之中；第三則為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的觀點（或解放（emancipation）的觀點），其主要是挑戰既存的陽性中心價值，以及當前對於環境保育與治理的不當。然三者雖關注的重點有所差異，但其皆視女性經驗是在考量環境治理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Bretherton,2003）。

但這些女性與環境觀點的探討，最重要且受到廣泛討論的論述仍屬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生態女性主義的概念於1970年代發跡，並在1990年代開始有重大的發展，而美國第一位開始開教授生態女性主義課程的學者—Ynestra King則將此革命性的發展定義為第三波的女性主義浪潮（Merchant,2005：194）。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的被壓迫有著直接的連結關係。故生態女性主義追求的是一種與自然生態緊密連結的價值文化，反對男權文化下的人類中心論以及由其所建構的知識體系。因此簡言之，生態女性主義試圖尋找一個遵循生態法則並性別平等的烏托邦。

而生態女性主義的理論可追溯以下三個基礎。第一即是受Karl Marx結構主義思想的影響，這點可從生態女性主義強調階級對於性別的壓迫與剝削問題而找到該理論脈絡，但其同時也批判馬克斯主義（Marxism）同樣忽略女性的角色；次

則為女神的宗教研究，這些研究發現，女神的教義並非二元地看待世界，而是一種整體觀。因此，女神信仰的凋零與壓迫，則直接反映在女性的知識與地位直接受到壓迫。故生態女性主義認為透過重拾女神的信仰，亦有機會帶來性別與生態的解放（Orenstein,1990；紀駿傑，2003：298-299）。

而最後一個途徑則來自於生態主義。生態主義在1960年代，也即是當全球工業化的發展已進入成熟階段，環境污染的問題也逐漸嚴重，此時期如Carson（1962）指出了DDT等殺蟲劑對大眾及土地的危害，警告寂靜的春天將要來臨；White（1967）所著之「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一文亦談到，西方基督教是人類中心主義根深蒂固的重要思想推手，其所緊握的自然對立二元論以及上帝為其背書的自然宰制觀，都直接或間接地造成了當前的生態危機。

但儘管有這些驚世警語，但到了1980年代環境問題仍然持續嚴重。因此，1980年代生態女性主義者結合了後現代主義解構文本及解中心的特質，對質根於人類中心且更是男性中心的生態主義理論提出批判。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環境的保護並非僅出於自利，而更應有整體性（entity）的關懷。因此1980年代以來的後現代生態女性主義認為，環境的問題不應單只思考工業污染，更應對立基於理性與科學邏輯下的主流家父長制進行解構，而這樣的關懷並無其道理，例如，女性所重視的環境議題似乎真的較難受到決策者（決策者多半為男性）所關心（Gottlieb,1993；Hayes,1994）。

因此，當前的生態女性主義結合了後現代思潮，認為西方文化中貶低自然與女性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一種具歷史性、象徵性及政治意義的關係。而這種關係即是在一個家父長制的架構下所型塑（Spretnak,1990）。故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與自然被男性宰制的關係之中，邏輯二元論的對立關係的被建構（可參考圖1-1）是主要原因。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從歷史角度探討歐洲自中世紀以降，男性如何透過科學及機械論觀點將自然立於一被宰制及低等的角色。這過程包括對於女巫（過去知識的代表）的迫害，將女性知識視為妖魔化的、非科學的以及不

理性的，並藉由這樣的方式將二元論關係逐步建構為主流的論述，這些關係諸如，理性/情感、文化/自然、男人/女人等關係 (Merchant, 2005)。而本文亦認為，這種父權價值觀的宰制邏輯是讓女性主義容易陷入一種客觀困境的主因。⁴³故重視生態主體的生態女性主義，在此二元論的宰制下，所要面對的是當前結構所給予的抵抗。

但生態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之不同在於，其既是一種女性主義理論亦是一種生態理論，同時更是一種多元化的文化視角。作為女性主義的理論而言，其繼承了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承認男性的宰制與偏見；另一方面，作為生態理論，其理解生態的價值並致力維護這個體系，並將人類看做一種生態而存在，因此生態女性主義的基本倫理觀可總歸為以下幾點：

1. 女性的自然倫理，有別於男性對自然的貶視

生態女性主義者，特別是基進女性主義者，其主張女性的特質（特別是生物功能）與自然有特別緊密的關係。而在女性文化上，包括過往的女神崇拜時代所對自然（包括動物）的尊敬，都顯示了女性與自然的關係有別於男性。例如著名的印度地區的抱樹運動（chipko），即是表達了一種女性對於自然的重要關懷。但關於本質論的論述，在女性主義的內部亦是相當有爭論的 (Fraser and Nicholson, 1989)。

2. 平等價值

生命是個相互連結的網絡關係，不應有高低之分（類同於生態主義觀點）以及被壓迫的狀態。而自然被壓迫的結構即是透過「價值層級化」，將生物做高下的區分，例如人比自然高等以及男人比女人理性的價值二元論觀點。故生態女性主義認為這些概念應是互補且連續的，而非二元對立。因此，生態女性主義認為二元對立這套邏輯根本是只是用來維繫當前的資本主義與國家體系的工具。因此，在男性貼近所謂的「人」、女性貼近「自然」，而人比自然高等的壓迫邏輯下，女性理所當然地成為被支配的角色，這也即是

⁴³ 即是主流價值所形塑的客觀價值與不可被推翻性。

生態女性主義所欲解放及抵抗父權結構的重要原因之一（Warren,2000）。

3. 整體主義（Wholism）

良好的生態狀態是一種多樣化的模式，此觀念是生態主義的重要關懷，即是以生態中心取代人類中心所認知的自然之觀點。此種觀念尊敬自然的價值，因為大自然的給與不分彼此，故將生態系統的整体利益作為最高價值而非人類的利益，將有利於維持與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和諧、穩定與平衡。但生態整體主義並非否定人類的生存權和逾越生態之能力，甚至不完全否定人類對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但生態整體主義強調的是將人類的欲望以及對自然的破壞限制在為生態系統所承受、吸收、調解和恢復的範圍內。

因此，基於父權壓迫邏輯對於自然的過度傷害與破壞，使得環境的負載能力無法回到原始的狀態，必須藉由此種整體觀的生態主義價值以及重視女性的自然倫理觀，才能使自然環境真正受到重視。但此種看法亦受到質疑，例如對於面對自然的多樣性與人類承諾的多樣性，整體主義的概念亦須允諾各種個別化或區域化的歧見的存在，故以單一的概念作為涵蓋多樣性的理據，顯然是有其難度的（Plumwood,1993）。

4. 伙伴倫理（Partnership）：

即是重新理解人與自然的關係，人類不應設法駕馭或控制自然中之非人類的部分，反而應當與之互惠。而二分法斷然區分差異，亦只會更加造成對立、排斥而非包容的效果。故基於整體性價值與自然共同互賴的「伙伴關係」，才是確保人與自然得以整體持續發展的重要概念（Merchant,2005：197-197）。

5. 對於「發展」概念的質疑

生態女性主義反對有差別的發展、剝削及忽略，其認為所謂的發展其實是北方國家對南方的剝削而得到的結果。因此，西方式的發展觀僅是圖利北方國家的手段。而這樣的途徑亦伴隨著父權特質的殖民主義來運作，並藉由商品與金錢貿易的發展邏輯而摧毀了大自然。因此，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以協助、非暴力、多樣性、提高參與、非競爭、非層級化組織、整體性思考以及

自然資源的循環使用與永續保存，並反對基於男性中心的「陽性式發展」的概念（Shiva,1989）。

貳、女性主義的安全論述

論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就必須從女性主義進入國際關係談起。國際關係這個學科傳統上致力於研究戰爭與和平的相關議題，故這個以國家與無政府狀態為核心所構成的學門，對於安全研究的關注亦是在衝突、軍事與戰爭的研究（Waltz, 1959；1979）。而以科學價值為依歸的實證及化約主義論述，在 1950 年代開始亦主導了國際關係領域的相關重要假設與爭辯。這些面向包括了戰爭與和平、國際因素與國內因素、無政府狀態與秩序、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政治與經濟等關係的討論。而光從這些變數就可可知國際關係領域多麼的複雜，因此，即便是責難實證主義的女性主義也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Kehone,1998）。

但 1980 年代的女性主義亦隨著國際關係研究多元與複雜化，也對國關領域的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滲透、擴張與轉化。例如，1988 年倫敦政經學院舉辦了一場「性別與國際關係」的研討會，並在 1988 年這個黃金時期出版了相關的許多著作與文章；1990 年女性主義理論與性別研究在國際關係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中已經被制度化的肯定；1993 年 Spike Peterson 出版了「性別與國際關係」的叢書。而國際關係確實因為女性主義及其他的批判聲浪而有所改寫（Elshtain,1987；Enloe,1990；Tickner,1992；Sylvester,1994；Spike Peterson and Anne Sisson Runyan,1999）。

故女性主義安全研究者在起初進入國際關係的領域時，一開始乃透過質疑「女性在哪裡？」這個問題進行切入，並據此揭露現存國際政治體系保有權力的手段。並逐步強調權力關係的本質以及其難以被抹煞的事實，並透過質疑誰造成這些現象以及如何可能地重塑它。故女性主義認為揭露國際關係現象必須從女性特質或陽性特質的結構出發來探討女性主義安全議題（Enloe,1990；羅嘉薇，1996）。

故這類型的研究大都從非傳統的國際關係主題來檢視女性在國際關係中的

權力關係。例如，探索休閒的慾望是如何被建構的（為了休閒、逃離工作、冒險）、勞動者的階層分層關係是如何建構的（透過女性應負責供給食物、安慰以及性的服務）以及菁英權力是如何地被強化（藉著經濟利潤、政治影響力以及成功地國際觀光視野）。其從這些現象以及生理差異的區別，發現人類的服務業與經濟成本，都是為了成就這些擁有大企業及權力的男性，而這些男性亦藉著異化女性來支持他們的觀光事業（Enloe,1990）。

但如同大多數的研究途徑一般，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亦相當多元。且儘管雖有各種不同的女性主義研究途徑，但其共同的目標皆是為女性提供一個更完善的圈地。⁴⁴故女性主義研究雖然在關於為女性貼上標籤、解構當前的階級關係以及減少性別不平等議題的切確方法上有所歧見，但其對於性別的原始關懷皆從性別被壓迫在世界結構中的關係開始。因此其皆藉著探索既存的性別關係來分析國際政治。而此也意味著，儘管女性主義個別的觀點在環境與安全的論述上雖分歧，但仍有諸多連結足以發現其理論的共通處。

而女性主義研究的基本共同處如，雖然有許多對於性別與戰爭、衝突與安全等不同議題的研究（Elshtain,1987；Enloe,2000；Tickner,2001）。，但這些研究大

⁴⁴一般而言，女性主義的研究途徑有以下三種，「女性主義的後現代論（feminist postmodernism）」；「女性主義的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與「女性主義經驗論（feminist empiricism）」（Harding, 1986）。

「女性主義的立場論」則為女性主義知識論中最具影響力的一種理論架構或詮釋觀點。所謂立場論，易言之，即是主張從恰當的「立足點」、「觀點」或「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這種立場論源自馬克思主義，主要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都認為知識是座落於特定社會脈絡中，並且反映了該社會中的價值及權力關係。因此，如果一個社會及其知識的生產是被（馬克思主義強調）的優勢階級或（女性主義強調）的優勢性別所主導，那麼該社會的知識與權力關係會反映出特定的社會價值（甯應斌，1998）。

而「女性主義經驗論」則嚴守傳統的科學規範，主張女性須納入研究中。但女性的經驗若無法藉由既有的研究方法從科學知識中反映出來，即代表女性的研究方法不夠嚴謹，故只要更嚴格地遵守既有的方法論規範，則可以有效地消除研究過程中的男性中心偏見（王孝勇，2007）。而立場論則質疑「女性主義經驗論」的科學哲學只是在批判沒有謹慎遵循主流研究方法或操作步驟下的壞科學（bad science），反而未對科學知識的本身反省。

就「女性主義的後現代論」而言，其主要針對啟蒙時代的知識觀，並藉由結合後現代「反本質」、「解構」及「文本分析」論述對啟蒙理性進行現代性批判（王孝勇，2007）。後現代女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亦被視為女性主義發展的第三波浪潮，而這波的發展也同樣地延燒至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三次大辯論階段中，在這階段中後實證主義的研究途徑使得許多非傳統的研究途徑被引入國際關係的領域，而女性主義亦是於此顯著地走入國際關係（莫大華，2000；黃競涓，2007）。

多有一個共同的核心關懷，即是這個世界的不安全乃是建構在一個暴力與壓迫的結構關係下，因此對於當前安全的對象、議題與定義都必須重新地理解（羅嘉薇，1996；Tickner,2001）。

此外，女性主義安全研究的另一個共同特徵即是，其多半尋求瞭解或建構一個屬於女性而非男性的安全條件。這些研究特別檢視了不同戰爭或衝突所對女性帶來的各種衝擊，並認為所有的衝突形式皆是性別差異的。而也正因此，使女性所面對的安全威脅遠大於男性（Hansen,2006；Detraz,2009a）。故除了對於女性安全的特別關注之外，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亦專注於世界政治與國際關係所對「個人」帶來的不安全現象，而這樣的不安全往往具體反映在女性、孩童、年長者與弱勢的個體（Tickner,2001）。

因此，女性主義這樣的研究途徑有別於強調固定結構變數（國家與決策者）的傳統安全研究。特別是女性主義認為理解戰爭的發生、過程與結束的真實內涵遠比視軍事力量的強化作為安全感的取得來得重要。因為軍事力量的強大看似帶來了國家安全，但透過這些力量的使用卻可能帶來對個人，特別是女性以及弱勢團體的不安全。是故，女性主義的個人層次安全關懷，使其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與傳統安全研究有著顯著的差別，並認為透過這樣的理解可以知道個人或群體是如何地透過結構或物質的暴力壓迫下，只得到所謂的相對安全（Tickner,2001）。

而除了研究對象的多元化之外，許多研究者從女性成為戰爭或衝突中的受害者角度出發，認為女性在戰時或社會衝突下所受到的衝擊遠比男性大的多，因此應該多關注此層面的議題。而如此從「實際性別利益」出發的觀點亦受到反本質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認同，其認為將男性與女性以決定論的方式歸納為好戰或愛和平是有失公允的，這樣的二分法反而會與建構性別平等與世界和平的理想背道而馳，議會使得一個性別的觀點要進入真實世界或國際關係更加困難，因此此種務實地經驗性研究相當必須且重要（Tickner,1999,2004；Sjoberg and Gentry,2007）。此外，女性在關於戰爭或衝突的議題亦有其他的諸多面向的到探討，例如強暴的議題、慰安婦議題、難民議題（因為統計上女性與兒童是難民營的主要構成份子）

以及其他相關的民生與社會問題等 (Enloe,2000 ; Indra,1999 ; Hansen,2001 ; 2006)。

故由上述的討論我們大抵可以知道，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的安全研究)，有幾個相當重要且共同的核心關懷或特點，本文歸納為以下三點：

1.重視安全對象的多元化

女性主義認為在安全研究的主體方面，不應只關注國家或政治決策者，而應該將主體擴大至非國家行為者與人類安全的範疇 (Tickner,1999)。

2.強調不安全狀態的建構與父權價值的相關性

女性主義認為當前不安全的狀態是主流父權安全結構 (現實主義為主流) 下所導致的結果。因此若要破除女性的不安全狀態，則必須先理解與認知到當前是處在父權制下的安全結構 (Enloe,1990)。

3.揭發當前女性不安全狀態下經驗

透過揭發父權制下的女性不安全經驗，可以作為理解父權價值的基礎，並透過分析這樣不安全的狀態，以瞭解關於女性的「實際性別利益」，並為女性及女權發聲，同時也能彰顯出女性在國際關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非置外於國際關係的領域 (Tickner,1999 ; Peterson and Runyan,1999)。

參、小結

在上述的討論中可以大抵知道，當前對於環境與國際安全的討論，女性主義皆有相關的論述。但若就結合環境與安全概念的探討方面，女性主義的安全觀雖在冷戰結束後開始受到重視，但卻沒有直接進入 (fit into) 環境安全的相關探討。本文認為主因應在於環境安全概念本身的新穎、模糊與複雜性所致；而置外於國際關係研究社群的女性主義，在從事相關研究與主流對話較少且轉趨於教學取向的態勢下 (Tickner,2001 ; 黃競涓, 2010)，研究的量與速度自然不如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論述來得快速。因此，一個全面性的分類並明確梳理出論述的研究，也

僅是這幾年才有之事。⁴⁵

故就一個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論述而言，雖然過去的女性主義看似分開探討環境與安全，但兩者其實在概念層次上卻有些許的連結。故上述的討論可以總結出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大抵可建構在以下三個層面。第一，對於個人層次的關懷，即是不應該將關注焦點只放置在國家，而是應將性別、不同個體與族群及環境的議題納入安全的研究主體，此點即是女性主義的安全觀；第二，從歷史途徑、後現代或者批判的角度，探索環境不安全的本質，此點以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貢獻較大；第三，探討在環境不安全的本質下（父權價值），處於性別差異的調適與衝擊狀態，此可為未來性別環境安全論述的核心關懷。

故本文認為，透過上述的三個分析層次來批判與分析當前主流的環境安全論述，除可進而得到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論述外，其不但可以勾勒出性別觀點的實存性，並可以藉這樣的過程理解當前基於性別差異的環境政治。且透過性別的分析觀點亦可檢視當前論述中的性別盲現象。

因此在下節，本文將透過這些分析途徑來針對當前主流環境論述中有哪些是符合性別論述或者忽略（或排拒）性別的論述進行分析與討論。最後將藉著前面所述的三個性別環境安全觀點面向，提出一個初步性別環境觀點與論述。

第三節、女性主義對主流環境安全理論的批判

壹、對環境衝突取向的批判

在第二章中所分類的三個研究取向上，環境衝突的取向最符合傳統安全研究的論述，而傳統安全的研究論述則在Waltz（1959）的結構現實主義理論當中被建構出來。其認為安全的指涉對象是以國家為中心，而國家為自主行為者，也是國際場域中最主要的安全主體；而對於安全的意義，其認為為求體系穩定，追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即是追求安全的手段之一。故其有別於古典現實

⁴⁵Brown（2005）有極為初步的分類，但仍是以前現實主義為基礎（僅針對了環境衝突的部分），而Detraz（2007；2009ab）是當前唯一系統性歸納環境安全論述，並以性別觀點探討之學者。

主義的只重視追求權力平衡。而Waltz (1959) 並認為，由於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 (anarchy)，因此在人性 (本惡) 現實主義的前提下，主權國家出於自利動機將只能自助 (self-help)，而最終將導致無法避免的衝突。

而女性主義者則針對此傳統安全取向提出不同的見解，其從三個分析層次 (個體、國家及體系) 架構進行解構與批判。就個體層次上，女性主義認為人性國際關係理論是男性中心的人性觀點，這些特質包括如個人是原子論的、好競爭的、具侵略性的以及理性自利動機的；在國家層次上，其認為此種陽性特徵的個人特質也投射在國家行為的定義上，並藉此認為這些特質是統一且普遍的，也即是國際關係中的國家行為者會反映出這樣的人性價值，而個人與國家的連結亦是透過僅由陽性特質建立的軍事以及財產權為基礎；在體系層次方面，女性主義者認為，霍布斯式由男性為主體的競爭國際體系下，也反映出這樣人性觀點並非僅是悲觀論，更是男性優越論。而這樣的邏輯製造的無止盡的安全困境，即是為了自身安全而威脅他者的安全變成一種必然結果，更是導致所有個體不安全的主因 (Tickner,1992)。

因此，女性主義認為此種無止盡的惡性循環就是立基於以男性經驗及陽性模式的國際關係本質。而現實主義透過與理想主義的對立，強調其本體論、規範面以及優越性下，其它的任何可能選項都被視為是不實際與危險的，故此角度而言，國際關係領域似乎是一種壁壘分明以及極具攻擊性的領域。

而上述此種對於本質的檢視與批判即是女性主義的「性別敏感視角」，透過此種視角可以理解當前被社會所建構出的陽性 (masculinity) 與陰性 (femininity) 性別結構層級化的特質 (hierarchy)，並可知道這樣的特質所伴隨的剝削與宰制的關係，即是一套由陽性價值為主流的性別實踐 (Peterson and Runyan,1999；黃競涓，2005)。

故若以性別敏感的視角觀之，當戰爭屬於攸關為男性的議題時，女性的角色或因素就會被直接或間接地忽略或被遺忘。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主流現實主義的安全理論不包括女性或其他非國家 (軍事) 的行為者，是相當顯而易見的現象。

因此，就此角度來論環境衝突的論述，可知其雖關注潛在的環境匱乏與缺稀與暴力衝突的因果關係（Kaplan,1994；Homer-Dixon,1999；Busby,2007；Scheffran,2008；Dyer,2008），但從相關討論中不難發現，衝突論述專注的是暴力衝突的因果驗證，但未思考基於性別差異結構的暴力衝突本質及後果。

因此，這樣的結果若推論是現實主義的邏輯所導致，那麼則可以解釋為什麼主流安全研究者已根深蒂固地認為，衝突研究探討衝突原因與結果才是最重要的安全研究取向。故其所謂的衝突原因探討是從一個人性植根於競爭而非合作、理性估算而非道德關懷以及性別差異的架構下出發，進而認定自然資源為人類服務；而其重視的衝突結果亦是國家的興亡，而非人類幸福。此外，即便衝突論述認為國家安全得到確保，國內安全亦得到保障，但其忽略安全價值並非來自國家安全的建構，而是一套平等與非競爭的價值觀。是故，由父權體制所延伸出的國家與制度即便得到安全，但國家內部的安全卻仍然是有差別的。

故性別觀點的安全論述認為，在層級化的性別結構下所潛在或實存的不安全狀態將因社會結構不同而有差異。因此例如女性、孩童、年長者與傷殘者在衝突過程中的脆弱性應該受到正視，而非僅是在國家層次上做因果探討。

而此外，環境衝突的研究儘管亦有多層次的分析，如研究國家、市民社會、族群、地方以及南北衝突（Homer-Dixon,1999：5）。但其最終的結論仍是認為國家扮演著最重要解決衝突的角色，故這樣的結論亦代表著其整個研究的核心仍是關注國家的角色。此與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多層次主體安全的研究亦有所差異，也使得那樣的研究仍脫不出是傳統安全的研究脈絡。而女性主義亦認為，即便國家行為的確有能力解決不安全的現象，但參與國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女性或有關於性別觀點的安全政策，是少之又少。

而若以女性主義的環境論述而來分析環境衝突論述（也即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論述），可發現其主要批判環境衝突取向對於資源缺稀將帶來資源衝突的認知。其認為環境衝突的觀點是建構在強烈的人類中心基礎，並認為自然資源理所當然供人類所消費與剝削，而非重視自然與人類的共生性（Peluso and Watts, 2001）。

其並認為，這樣的邏輯即是建構出人類與非人類的權力結構的主因，故使用資源（resources）一詞所指涉的是在人類中心基礎下，對於人類生活有所助益的事務。而這樣輕蔑自然的論述，正是經由人類與非人類權力的結構關係所造成，且這樣的權力結構所反映的亦是人類優於自然的觀點（Merchant,1995）。

除此之外，環境衝突的途徑儘管亦有非國家層次的衝突討論，例如從人口成長問題、環境遷徙以及南北問題等角度出發的研究（Homer-Dixon,1999；Brown,2005）。但這些研究皆仍是性別盲的，皆未談及性別結構的問題。

就人口增長的討論為例，環境衝突途徑認為人口過度增長將直接導致供給引發（supply-induced）與需求引發（demand-induced）的環境匱乏，而這樣的匱乏若搭配其他不穩定的因素（例如內亂或族群對立等），將導致暴力衝突（Homer-Dixon,1999）。⁴⁶但生態女性主義認為這樣的論述卻間接地將女性做為安全政策的解決對象，也同時仍是在傳統安全的邏輯下，例如，透過限制人口增長，使得資源競爭的情況降低。因此，其核心論述仍是在一個以競爭並剝削自然資源的基礎上，而非改變物質生活型態。故就此觀點而言，女性主義認為，人口成長的限制或許看似解決了資源分配問題，但在性別層級的架構下（女性獲取不到平等的資源分配），故這樣的分配仍然有利於父權制，故不具備符合父權價值的任何個體都將不會從中受益。因此，此種限制人口成長的論述，若不就性別結構觀點進行討論，仍是以國家安全為實質，而非真正受益於所有的個體。

而就環境遷徙與南北問題（不平等的資源分配）方面，同樣也因性別結構而有所差異，但環境衝突途徑在這方面的論述上卻依然是性別盲的，例如其認為這些因素會潛在地導致由資源分配問題所造成的環境匱乏、資源缺稀以及暴力衝突（Homer-Dixon,1994）。

就環境遷徙方面，該假設認為當資源的取得受到阻礙時，人類就會被迫遷徙至環境資源條件較好的地方（Homer-Dixon,1994）。但這樣的論述顯然地太過於浮面，忽略環境遷徙的難民會基於性別差異而面臨的不同挑戰（Enloe,1990；

⁴⁶ 可參見圖 2-2。

Indra,1999)。且這樣的差異主要仍是建構在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結構，因此女性移民或難民往往常處於依賴者的角色，必須依附家父長才能得到基本的生存安全。

而上述的例子，就第一節所談到的蘇丹達佛地區的議題而言，若就環境衝突的安全研究來看，其將只會認為衝突爆發是肇因於資源的分配與匱乏。但這樣的充滿的性別盲現象的研究，將忽略了女性不論是在資源匱乏或由其所導致的衝突中所面臨的不安全結果。例如在資源匱乏的過程中，女性因父權價值之因素，必須扮演依賴者亦或者家務清理者，更甚者其可能必須同時肩負起家計；而在衝突的過程中，婦女被系統性強暴（systematic rape）的現象亦充耳可聞（Mohammed,2003；Salopek,2003）。⁴⁷

就南北問題方面，環境衝突的環境安全相關討論亦談到，全球不公平的資源分配將導致嚴重的南北衝突（Dalby,1999；Barnett,2001）。但關於分配的問題，除了南北的國際政治外，其亦可以是都市與城鄉的、菁英與大眾的以及性別的不平等。但關於後者的這些議題，皆未出現在有關分配的環境衝突研究當中，因此，即便南北的衝突因為公平的資源分配而得到安全了，但不論在南方還是北方國家的內部，若上述的各種不平等資源分配關係仍存在，那麼基於環境的安全其實並未達成（Beneria,2003；Detraz,2009a；2009b）。

故從以上性別敏感度視角為基礎所對環境衝突取向的批判可知，環境衝突的論述若納入性別觀點時，必須對其安全主體的界定以及議題關懷重新反省。因此，若欲將女性主義觀點納入環境衝突取向的研究，從第二節末所歸納的三個性別環境安全論述基礎為標準看來，境衝突取向應有以下調整：第一，在安全主體層次關懷上，環境衝突取向應將關注焦點放置在當前性別結構、不同個體與族群的探討，而非僅是國家；第二，環境衝突取向必須透過重視歷史、後現代或者批

⁴⁷所謂系統性的強暴是指，在戰爭或衝突時透過性侵犯或虐待作為手段，目的是在對其他族群進行去倫理化的行為，以展現種族清洗的意志。而根據國際法，系統性的強暴行為已構成違反人道以及戰爭罪的刑責。其亦被認為是一種屠殺行為。詳細可參閱網址：<http://www.helium.com/items/327015-what-is-systematic-rape>。

判的研究途徑，探索環境不安全的本質，並重新理解當前環境衝突的主因；第三，環境衝突取向研究必須在認知環境衝突的本質後，解決處於父權結構下環境衝突狀態。

貳、對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批判

至於廣義環境安全的研究途徑在第二章中的討論可知，其與女性主義安全論者所強調的安全主體多元化觀點相當契合。也即是兩者皆認為安全研究的主體與對象須重新定義，而非僅是把環境的議題納入傳統安全的研究途徑之中。也因此，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有別於衝突論述，其較重視多元個體或群體的不安全情況。

但其與女性主義者所認知的多元安全觀點又有所差異，就女性主義者的角度而言，其認為欲達成真正的環境安全理想，除了必須對於生態體系與環境的維繫外，更應該突破關於性別盲與族群盲（ethnic blind）並建構一個自國家到地方層次完善的民主與法律體系（Westing,1999）。故這也代表著，若就女性主義的環境安全視角而言，建構一個無差別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顯然是達到整體環境安全目標的基礎。因此，我們若從這個角度來檢視廣義環境安全途徑對於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在全球化與人口增長相關議題以及永續發展概念的探討，則可以發現廣義環境安全仍有許多不足之處（Lonergan,2000）。

首先，就人類與環境關係的倫理學部分，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關注的是負面環境衝突所對人類帶來的各種安全危害（如健康、生存與發展），但若就女性主義對環境的理解而言（主要以生態女性主義者的角度），這樣的論述等於潛在地將人類從自然環境中劃分出來，也即是一種二元對立的人類與非人類邏輯。故此種論述不恰當之因在於，儘管人類確實有能力控制部分的自然生態與資源，但自然環境至今亦同樣地擁有最終反撲的能力，也因此，女性主義的環境觀認為人類與環境的關係必須建構在如「地球倫理關懷」的角度上，此角度立基在一種動態相互尊重的倫理，而非是權力的剝削關係（Merchant,1995）

第二、關於各項議題的部分，廣義環境安全亦與環境衝突研究一般，雖同樣

也關注如全球化、人口增長以及衛生問題。但簡單的差別在於，廣義環境安全的研究途徑在這些議題中或多或少皆有觸碰到性別衝擊的議題或認為傳統衝突途徑的檢證是有問題的，而非忽略這些變數。這在本文第一節中幾個對於環境衝突研究的基本批判即可略知一二。

因此，若就人口增長與環境安全的探討上，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研究亦有對環境衝突相關的批判，例如，Dalby (2002) 即認為環境安全的研究不該僅簡單分析環境增長壓力與環境破壞的因果關係，而應將更多心力放在如都市化或城鄉差距與人口增長的探討等；其他的廣義環境安全觀點亦認為，若僅關注人口增長與環境破壞的因果驗證，則會忽略了一些實際的環境安全問題，例如貧窮與脆弱性的本質以及在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被排拒者的生存安全問題 (Barnett,2001) 。但從這些廣義環境安全對於人口增長議題的探討，若站在性別觀點的角度則很容易可以發現其仍然是性別盲的，也因此就這議題而言，此種廣義環境安全途徑並非真的廣義。

再就廣義環境安全途徑對全球化與環境安全的探討而言，其認為當前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平衡結果，造成了許多個體或群體在自然資源的取得上受到剝削，也因此其生存或發展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因而造成了環境不安全的結果 (Barnett,2001) 。但這樣的論述也同樣地忽略了性別結構在全球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也即是基於性別差異下或父權邏輯下，非具有父權特質的個體或群體，亦或者女性本身，將直接面臨資源分配不平等與調適的衝擊。

因此，就女性主義的認知而言，全球化與環境安全的問題，即是當前社會性別結構所衍生而來，故若全球化的經濟生產模式帶來了環境問題或者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那麼這樣的本質則是來自於透過社會性別建構以及二元對立剝削邏輯的權力結構關係，其正當化了男性宰制自然與女性的地位，並進而強化剝削自然與分配不正義的行為，最終造成了環境不安全。故如果我們假設當前的全球化過程是過去歷史的延續 (Held,2000) ，那麼過去的全球化的過程所出現的「殖民主義 (colonialism) 」則可以印證全球化歷史也即是全球的剝削關係史

(Enloe,2000)。

所以，若就女性主義的觀點而言，研究全球化與環境安全的議題必須要注意在全球化的變遷下，這樣的過程是如何擴大？到底是誰的全球化？以及是誰受益？而相關的一些性別與全球化的研究亦發現，女性在轉變中的全球經濟結構下，其受到的衝擊遠較男性大得多 (George,2002)。

而除了全球化與環境資源分配的議題之外，由全球、區域或國家所帶來的環境衛生安全問題，亦是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面向。這類型的研究相當廣泛，但就廣義環境安全途徑的相關論述而言，其多關注全球化與衛生疾病傳染的問題，並認為全球變遷將帶來快速的人口增長與都市化，但同時也是疾病的快速傳染。而其認為這樣的結果將帶來人類行為的改變，例如性行為型態改變、藥物使用方式改變以及生活條件的下降；此外，其亦會帶來區域環境的變遷，進而造成疾病的形態改變；或者就正向而言將刺激科技的研發，例如更多的抗生素、疫苗與新藥物的出現。但這樣的改變亦將充滿不確定性地影響著所有人類 (Pirages,1996)。

但這樣的研究在相當多層面上仍是充滿著性別盲，例如這樣的研究沒有注意即便是衛生科技的進步，但女性因普遍上仍處於不對等的權力結構下。例如女性受教育的水準普遍較低，也進而使其無法平等地享受這些成果。此外，就藥物的研發而言，醫學科學社群長期以來對許多藥物的實驗與設計亦是相當性別盲的，例如關於降低膽固醇的藥物「Statin」常被用來防止心臟病的發生。而近年來許多研究皆發現其副作用相當大，例如易出現肝功能異常、急性腎衰竭、白內障、肌肉病變等，但近來又有研究證實該藥物竟然在對於膽固醇較高的女性而言，其達到避免心臟病的比例遠比男性低得多，故女性男性所面對的是一樣副作用的藥，但卻沒有公平的正面藥效。而這樣的結果不經讓人反思，當藥物在科學實驗與設計的過程中，這套科學基礎，到底是有利於誰的理論 (Elton,2010)。

除上述議題之外，另一個廣義環境安全重視的議題即是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而其相關的論述大抵皆視永續發展的概念是達成環境與

人類安全最重要的途徑 (Barnett,2001; Pirages and DeGeest,2004)。但其仍以主流人類中心論述視角的永續論述，仍將自然視為附屬，並忽略性別結構的發展差異。而究其之因為，傳統的永續發展所強調的是狹義人類中心的發展觀，且就性別敏感度的視角而言，女性或者其他非父權價值的群體或個體，在發展過程中的需求一直受到忽略。因此女性主義強調；永續的概念不能輕易的以過去的發展邏輯做基礎，而更應重視女性、生態本身以及未來世代的的安全需求。因此，若永續發展的概念若真能帶來安全，那麼女性主義認為，強調與提倡永續發展的概念前，必須先處理關於女性需求以及性別差異結構的問題。而除對於其性別盲的批判外，女性主義亦認為永續發展的概念是一種父權價值維繫的工具，因為透過永續發展的概念所建構出的遠大安全理想，使得當前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受到正當化，進而使得父權價值的結構得以維繫 (Detraz,2009a)。

除上述的三個主要議題討論外，廣義環境安全還有其他面向的論述，例如在第二章中所談到的關於環境和平建構的探討，其認為環境問題往往是由於長時間的互賴發展、科技進步與不確定性所帶來。而也正因此，為了發展與解決不確定性，合作形式的和平將有機會被建構。此點從當前增長的國際環境建制與合作、國家環境官僚、政府間組織的環境改革以及在環境組織之間的跨連結網路，都是代表著為解決環境不安全所出現的合作過程 (Conca and Dabelko,2002: 10-11)。

而關於這樣的論述，本文認為其仍然充滿著性別盲之處在於其論述的假設基礎皆是在當前的政治與經濟結構邏輯層次上，同時也暗示強調國家角色的重要。因此這樣的研究其實比上述的議題還更偏向傳統安全研究的途徑，其差別僅在於並非探討衝突，而是建構和平。故若就女性主義的環境和平觀點而言，這樣的論述應仍先從多元的安全主體出發，但由於國家層次的分析仍有其重要性，因此就一個「實際性別利益」的角度而言，採取一個多元跨層次的關注相對較為務實。

48

⁴⁸而關於多元層次，特別是針對性別結構關注的建制，如 M.S. Swaminathan Research Foundation 的相關研究即是一例。其關注如人類健康、糧食安全以及性別結構等問題。而該組織曾提出一個

故總的來說，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雖與女性主義的環境與安全觀相近，但仍可總結其對廣義環境安全途徑的批判如下，第一、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雖重視安全主體的多元性，但仍存在二元論的性別層級化關係；第二，廣義環境安全途徑雖關注許多低階議題，但所論述的基礎仍是傳統的政治與經濟結構；最後，廣義環境安全所重視的永續發展概念，相當大程度仍是狹義人類中心的思維，而透過這過程看似可以達到環境安全的目標，但其實卻間接承認了當前父權結構持續的正當性，也使得性別盲的現象被忽略。

參、對生態安全取向的批判

生態安全途徑則是完全與傳統安全不同的研究取向，從前述的討論中可知，生態安全途徑的核心關懷是以環境為主體，強調環境本身的安全亦會帶來所有生態的安全，而人類屬於生態的一部分，故人類的環境安全也因生態安全轉而亦得到保障。而生態安全論者並認為，環境不安全主因即是來自於人類的生活型態所致。故這套論述的邏輯實與強調人類必須承認自己與自然環境的緊密連結，並應該駁斥或反對人類宰制自然的邏輯與論述的女性主義環境觀點相當契合。

而生態安全的另一個主要論述與女性主義相近之處即是關於「資源」的定義上。⁴⁹生態安全拒絕人類中心的資源觀，因為此種觀點等於是對自然的隨意宰制，而這樣的觀點正與生態女性主義否定由一套父權價值的結構來剝削自然與人類的認知相符（Warren,2000）。因此，在此點論述上，兩者皆反對任何一切形式的壓迫與自然資源濫用的形式，並希冀更好的環境生存條件有機會被建構。

但就兩者的差異而言，生態安全對環境的評估往往是透過環境科學的實證資料來證實環境自然的重要性與脆弱性，並據此主張將其從被剝削與破壞的態勢中得到解放的目標；但生態女性主義的關懷與其不同，其重視的各種形式壓迫結構

重要的觀點，即是，其認為糧食安全可以透過女性知識來達成，這點在印度即得到映證。而這樣的觀點主要是認為糧食時的安全與環境品質的維護有關，因此不斷地改變環境的本身必然會破壞糧食的安全取得，但其發現女性在生產過程的特殊與自然環境的倫理關係，使得其基礎的生產知識與環境取得一個協調的狀態。

⁴⁹符合人類生活需求的物質才算是資源，這意味著其餘的生態物質並不受到重視，這也反映在人類當前的環境保育是有條件的，自私的人類中心思想，但這樣的結果難保不會自食惡果。

的解放，故其目標在於使所有個體或群體得以從不平等與壓迫的結構中得到正義與價值，因此不論是生態的本身、女性或被壓迫者都是其研究的關懷。

此外，若就性別盲的現象來考察，女性主義會認為生態安全途徑過於生態中心的取向，反而忽略了男性與女性所對環境帶來衝擊或破壞的差異，亦即是生態安全只證實了人類對於環境所帶來的不安全，但並未思考性別的視角若納進該論述時所帶來的不同意涵。而這樣的意涵的重要性在於，生態安全目標在於欲抵除那些剝削自然的邏輯或結構，其透過論證說明了人類對自然生態的危害，但卻忽視了人類社會結構中所存在的性別層級關係以及其對環境資源破壞的差別；此外，若僅從自然生態的主體性出發，強調生態高於人類的位階並否定人類的需求來要求人類自行約束本身對於環境的破壞與剝削，顯然也較不實際。因此，從此兩個論點而言，先剝除當前的父權政治與經濟結構顯然較為實際且較公允。

而關於戰爭與軍事的議題方面，生態安全與女性主義亦是在論述上有部分的差異。例如，兩者雖皆認為環境的破壞皆來自於過去戰爭、衝突或者直接以破壞環境為目標的戰略。但綜觀女性主義的觀點可知，除了在戰爭對於環境的破壞之外，在戰爭過程或結果中的受害客體，包括女性、兒童與其他弱勢個群體皆應受到重視（Enloe,2000）。然而，生態安全雖強調人類屬於生態整體安全一部分，但卻未清楚去了解即便人類剝削自然的邏輯不再了，但若性別宰制結構仍存在，那麼這樣的結果還是可能造成基於性別差異環境不安全狀態，而這與生態安全所假設的生態得安全，所有人類亦得到環境安全的論述亦不符。

而女性主義認為在軍事議題上的性別差異可從「保護迷思(protection myth)」的邏輯更進一步來探討性別層級化的問題。其認為這樣的論述是建構在透過強調軍事保護國家的功能，進而聲稱其保護了安全而使得軍事部門得到正當性的工具。但這樣的論述卻忽略軍事動員的過程中所對女性、弱勢或非具有父權特質男性所造成的不安全與歧視（Enloe,2000）。例如，我國 2010 年的中正預校招生文宣中即可發現此種父權結構的深刻展現。在該廣告中其藉由強化陽性特質，並以二元對立論的思考邏輯，將陽性特質歸類屬於男性，並強調擁抱或擁有此種特質

才屬於「真男人」。⁵⁰故這個議題的中我們可以發現，僅談論軍事活動而忽視性別差異所對環境帶來破壞的論述是不充分的，因為基於性別結構的脈絡下，軍事活動對於環境破壞的責任不應也由非認同父權論述的男性以及女性來承擔。

除上述兩點差異外，對於科學與生態分析的認知差異亦是兩者不同之處。其主要區別在於與生態安全論述的建構相當程度仰賴科學社群的證據。但女性主義認為，科學具有西方色彩、布爾喬亞階級以及陽性特質等特質，亦是由特定人類種族中心思維所建構的知識。即是而這套偏見的知識幾乎即是代表著白人與中產階級男性，故現代化約主義的科學觀，可能僅是父權中心的計畫，而女性則是被排拒於專家之外（Keller,1985：7；Harding,1986；1991；吳秀瑾，2000；王秀雲，2004）。因此對於科學社群的環境研究仍要小心嚴謹地採用，從而避免整體主義的環境安全被排除，然而，生態安全途徑卻沒有就科學的本身的知識論與本體論提出批判與探討。

此外，女性主義在關於科學邏輯論述的謬誤上，其談到關於客觀性（objectivity）建構的問題。談論此問題的主因在於科學方法自認其方法論是沒有任何價值判斷的，是絕對超然中立的客觀，但女性主義認為這僅是展示強客觀（strong objectivity）的行為罷了，亦即是眾人皆如此深信，且即便我們共同認為事物是如此，但事物也未必真是如此，因為科學方法從來也沒有認識到事物的全貌過，故其充其量僅是錯誤較少的研究方法罷了。（Harding,1998；Sylvester,2002）。

因此，若我們將環境問題的關懷與科學而非人類安全畫上強烈的相關時，要達到真正的永續發展是相當困難的。故思考環境安全的建構時，必須質問或探討關於平等、正義、脆弱性、權力結構以及是誰到底受到環境不安全的威脅等議題，如此才能建構一個全面性的環境安全（O'Brien,2006）。

⁵⁰該校在招生廣告題目上寫著「你是不是男人？」幾個大字，並在內容部分提到，「還在跟父母要錢是不是男人、玩CS沒拿過槍是不是男人、投籃球機沒投過手榴彈是不是男人」，最下方還不忘加強提醒加入中正預校、讓你成為男子漢。可參閱網路新聞：<http://news.cts.com.tw/cts/general/201004/201004080445852.html>。

故本文總結上述的討論可知，生態安全途徑是與傳統安全途徑相去最甚遠的研究論述，而這也使得其與女性主義的某些觀點上有其共通處。但其過於關注生態而忽略人類仍是作為世界主體的強客觀特質，以及其中的性別盲現象也相當明顯。故其沒有針對有父權結構的討論，亦沒有對於環境變遷與安全的性別分析觀點。

第四節、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初步建構

在上述討論中可以清楚地瞭解女性主義對於不同環境安全論述取向的批判以及其與三者論述的異同處。而就當前整體的環境安全論述而言，本文認為其仍是在一個進行（ongoing）的階段，因此關於這樣的分類或許仍有可再修正的空間。但筆者認為，透過這樣的討論有利於讀者或研究者對於環境安全論述的理解，並藉著本文所以擲騰出的論述區隔與分類，可以清楚地知道區別其差異，進而有利於以一個性別的視角作為切入的依據。

而就性別環境安全的觀點與當前的國際關係領域現況而言，本文亦發現國際關係領域過去雖亦有女性主義可作為切入國際關係實際議程的看法，但過去的性別觀點往往常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論述，⁵¹而也正因此，其受到主流國際關係猛烈的批判，並認為其根本並非是個理論，因而提出了相當多的反證

（Tickner,1997；Peterson,2004；黃競涓，2010：7-8）。⁵²而也正因此，女性主義在國際關係中的貧民窟化現象（黃競涓，2010：8），使得一個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建構的想像，在主流的國際關係途徑幾乎不可能存在。但女性主義論者卻認為建構這樣的觀點是相當別具意義的，因為性別觀點的建構並非是彰顯女性價值，而是透過這樣安全觀可以彰顯出環境問題的衝擊非統一性，並可豐富當前國際關係以及安全研究領域的多樣性（Detraz,2009a）。

故藉由前文的討論，本文將就目前所探討的三個環境安全論述以及初步的性

⁵¹例如強調女性較愛好和平的特質，有利於國際關係領域中建構和平的理想。

⁵²例如英國首相 Thatcher 比一般男性首相來得更強勢（黃競涓，2010：1）。

別環境安全觀點，以一個光譜的形式來初步區分其概念的空間位置，以有助於讀者瞭解其基本的差異（圖4-1）。而本圖的區分依據主要分為兩點，首先為對於環境主體的認知程度，也即是區別不同論述是趨近人類中心還是生態中心的關懷；次則則是就其與主流傳統安全（國關）取向的趨近程度進行檢視，亦即分析該環境安全的論述取向在安全主體的認知、議題以及方法論上的差異。故以此角度而言，極右派即是主流傳統現實主義的，其討論的安全主軸以國家安全為主，將新安全面向僅是納入傳統本體與知識論的脈絡下；而極左的非主流安全則與傳統安全途徑完全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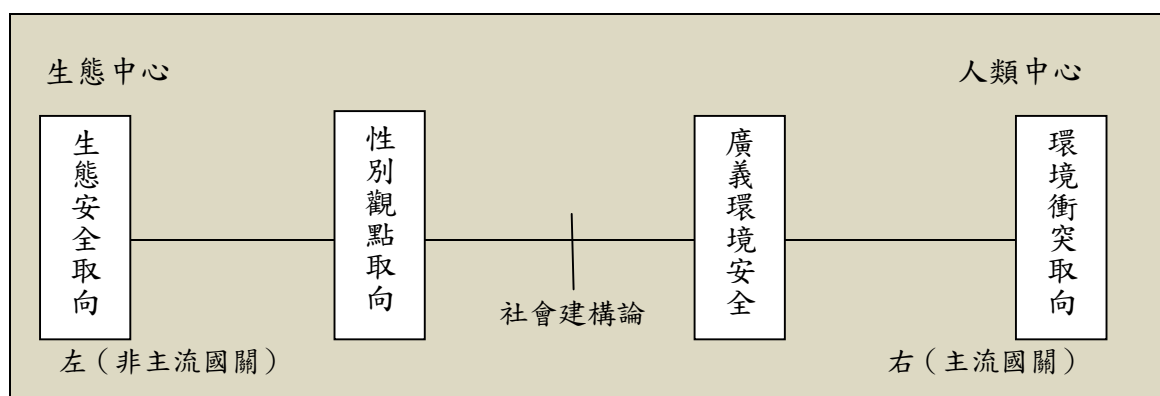


圖 4-1：環境安全論述光譜初步分類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由上圖看來，就國關理論的左右光譜分類而言，環境衝突取向因其徹底忽略非傳統安全主體以及其仍以現實主義為主要脈絡的特質，故本文將其歸納在極右的光譜；而廣義環境安全的途徑則較偏向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關係途徑，故其較為左傾（主要原因在於其亦重視安全主體的多元性），但由於在本質上其仍部分立基在現實主義的結構基礎上（政治與經濟發展脈絡），故仍是處於光譜的右側；而本文欲建構的性別觀點取向的環境安全論述（亦包括Detraz等人的相關論述），由於其是駁斥當前主流結構的傾向，故本文將其放置在當前國關安全領域的中間偏左側；而生態安全取向則完全與傳統安全取向徹底不同，其根本不探究一般國關領域所指涉的安全價值，故為完全非主流的極左光譜。

就環境關懷的取向光譜而言，從上圖可發現，環境衝突取向由於隱含者狹義

的（父權特質）人類主導性地位，故是極端的人類中心論，其論述看不見對環境倫理的關懷，而是隱含著對自然與環境的宰制關係；而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由於對於資源概念的內涵，仍是相當人類中心論的，也即是仍有隱含著人類優於自然的邏輯，但由於其會凸顯出環境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以及關懷，故本文將其置放在光譜的中間偏右側；至於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取向，其對於既存人類中心結構的反思（例如性別與自然二元對立論的探討），以及環境關懷倫理的建構，因此雖然其同樣也某個程度屬於人類中心的立場，但其與前兩者不同之處在於，其是站在一個解構當前人類中心的立論基礎上（解放派），故本文將分類在中間偏左的光譜位置；而生態安全的途徑則是相當明瞭，其根本不討論人類中心的關懷，而是透過自然科學研究與環境倫理來彰顯生態的主體性，故其完全非主流人類中心的環境主體思考被歸類在極左的光譜。

因此，藉由本圖的分類可很清楚地發現，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論述與生態安全及廣義環境安全的取向較可能有對話的空間。從第二節的討論即可知，在許多非傳統安全的議題上，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安全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使女性主義有較多直接切入該議程的空間，例如就貧窮、全球化與發展以及衛生等議題，女性的直接經驗都可以馬上得到檢驗。而若從廣義環境安全所談論的永續發展與環境和平建構等議題來看，其的確提供了一個對於安全主體與議題更多面向的思考，但可惜的是其皆未去批判與挑戰既存的父權結構，因此其僅是處理了陽性價值的環境不安全邏輯，而非以一個性別觀點的建構來改善這樣的情況。

而就生態安全的途徑而言，其與女性主義在理論關懷上亦有許多重疊之處（例如在論及父權價值的剝削自然與女性時，在邏輯的論述上是相同的），因此兩者早已在環境觀點上許多論述的結合（特別是生態女性主義）。但由於女性主義乃是對於當前人類中心論述的解構，故本質上仍是以建構的是一個無性別差異或宰制的人類結構關懷。因此，對於安全主體認知上的差異，是性別環境安全觀點與其有所差別之處。

而若就環境衝突而言，目前看來性別環境安全論述要與之對話的可能性相對

相當低。這些原因大致為，環境衝突取向承襲了傳統國際關係的脈絡，因此其所強調的客觀性、公/私領域二分（認為女性經驗為私領域，不是國關應探討的議題）以及強調大理論（Grand Theory）的論述與女性主義的關懷完全不同，且由於其處於極右的立場捍衛這樣的本體與認識論，故在兩者之間幾乎無法對話（Tickner,1997；Peterson,2004；黃競涓，2010）。

但儘管如此，性別環境安全的論述還是有必要去檢視關於環境衝突所關注的資源衝突等議題，特別是針對所謂資源匱乏觀點，探討到底是誰受到衝擊以及誰是得利者的檢視（Detraz,2009a）。因此，對於匱乏（或缺稀）的探討，不應僅從對人有所影響的資源取得困難著手，更不應該由人類的消費邏輯來決定，而是應考慮環境本身的生產力問題，並透過更細部的檢視發現在其中所原本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許多不平等與剝削的關係。同時，在環境不安全的界定方面，女性主義認為必須承認若僅簡化單一因素（例如人類）即是造成環境不安全的原因，那麼這樣的認知亦是相當性別盲的，因為這樣的認知並無探討性別差異結構所對環境帶來的不同影響。而在消費主義方面的議題，一般學者皆認為其亦是推進全球化、人口增長與遷徙並進而帶來環境的破壞的重要因素，但女性主義認為儘管這些因素在實證上確實帶來了環境的不安全，但我們不能就因此直接了當地

（straightforward）認為只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可以帶來環境安全，特別是在這些解決方案中未真實納入關於性別的思考下，這樣邏輯的環境安全價值也僅是狹隘陽性的環境安全觀。而也的確，在當前主流的環境安全論述中，沒有任何以性別視角出發針對性別差異與環境衝突關係的研究。因此，上述的這些分析與批判，顯然是相當有意義且重要的工作。

故若單僅一個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出發，Detraz（2009：355-356）認為以下九個研究觀點必須受到重視：首先，環境安全的研究主體與面向必須是一個多元層次的途徑；次則，對於安全、環境與缺稀的定義必須更為廣義，同時亦須反思主流的觀點；第三、應有特別關注於女性的安全解決方案；第四，須承認人類與自然的緊密連結性，而非二元對立的權力結構關係；第五，環境衝突發生的過程

以及本質都必須徹底的重新檢視；第六、須檢視軍事活動所對人類與環境的衝擊；第七，關於環境不安全的因素探討必須有一個批判的視角，來勾勒出其對於不同群體的差異衝擊；第八、環境安全的關注亦必須立基在知識的多元基礎上；最後，應該要拒斥那些主流機構或社會結構所建構的狹隘解決方案。而本文亦認為，除了上述九點研究關懷之外，直接重新檢視主流環境建制與基於性別差異結構的調適與衝擊狀態亦有其必要，且亦是與主流國關議程或理論對話的重要契機。

此外，性別環境安全觀點對於研究者在分析環境安全的概念時，亦可作為連結人類與環境中心的安全主體論述，並藉由性別環境安全的思考，也才能看到更多需要關注面向。

第五節、小結

當前主流環境安全論述中的性別盲現象，使得不論是在研究領域以及政策領域上皆受到忽略。就研究領域上而言，例如2009年的美國國際關係學會年會上（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雖有一個名為「環境與安全：批判的研究途徑（Environment and Security：Critical Approaches）」的議程安排；2010年的ISA亦有一個關於「環境安全與典則（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Regimes）」的議程。但關於性別與環境安全議題的探討，仍被歸類在性別安全與理論的脈絡，而沒有任何一個相關文章被直接歸納在環境安全為標題的議程裡。因此從此分類可以發現，儘管性別視角的研究已有一塊天地，但始終被視為是一種特立獨行，無法直接與其他議程（儘管女性主義者已直接進入了環境安全的議程）對話的途徑，但這並非是女性主義的期待。⁵³

⁵³例如 Detraz 在 2007 年會中所發表的“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ruitful Intersection or Rocky Road of Incorporation”文章，被歸類到 Gendering Secur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I 的議程中；而其在 2010 所發表的“Gender,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Examining Agriculture in South Asia”，但卻被歸類到 Gender and Securi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的議程，而並非在環境安全的議程中；又如 Ursula Spring 在 2009 年會中所發表 “The Gender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Security”亦與環境安全研究有關，但卻被放在 New Security Concepts

在政策領域上，國際關係的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的霸權特質亦反映在國內政策的制定上，例如美國2010由參議院所提出的能源法案中，亦並無納入任何有關性別觀點的思考；⁵⁴而我國不論是再生能源法案還是永續發展的相關政策，不論是過去還是未來對於能源政策的建議方面，亦同樣少有與性別環境觀點有關的政策論述。⁵⁵

因此，本文認為將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建構切入至一個實質的環境議程探討有其相當重要的意義。一來透過性別觀點可對於當前環境建制（典則）進行重新的解讀；二來藉由這些批判並點出性別盲的論述，可以使未來的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有新的思考途徑；最後，藉由進入實質議題的探討亦可能對於當前環境不安全的現象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進而拓展性別觀點可與主流論述對話的空間。

故在下一章中，本文將就京都議定書時期的發展進行相關論述的回顧，探究從京都議定書的源起到展望後京都的時代來臨前，其核心的論述的依據，並藉由性別環境安全的觀點提出相關批判，同時對於後京都時期的來臨，提出一個性別環境安全觀點以及政策建議。

and Peacebuilding 的議程中。相關資訊可至 ISA 網站資料庫中查詢，網址：
<http://convention3.allacademic.com/one/isa/isa10/index.php?cmd=isa10>。

⁵⁴可參閱網址 <http://news.msn.com.tw/news1702965.aspx>；

⁵⁵從當前的能源政策白皮書以及例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與策略綱領等政策白皮書中可發現，性別與環境的相關論述仍相當缺乏（梁啟源，2009；參照網址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0605>）。

第四章、京都議定書的性別環境安全觀點與批判

在 1972 年斯德哥爾摩會議召開時，全球暖化還尚未是國際關係的主流議程，但科學社群研究單位早已開始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環境衝擊進行評估。因而在 1990 年 IPCC 提出了明確的科學證據證環境安全衝擊的嚴重性，也因此促成了催生全球環境建制的聲浪（Germond-Duret and Howe,2010）。

而在當前的國際環境建制中，最重要的機制即是 1997 年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簽訂後所出現的京都架構。但這樣的架構（機制）從其談判的過程、運作及結果都難脫是在一個以現實主義為核心價值的論述。故也正因此，其運作的註定失敗亦是因為，儘管環境建制是以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論述為主流，但當牽涉到現實政治時，亦即是當環境成為國家安全問題時，環境問題所具有的整體安全特質則與狹隘父權價值的現實主義國際安全傳統出現衝突。從當前的環境建制核心論述始終脫離不出資源競爭（經濟發展）與廣義環境安全的調和問題就可看出端倪。而這樣的結果亦代表著，當前環境建制是處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論述的對立狀態。而兩者雖有重視人類中心的價值、經濟發展的共通性，但基於其現實主義重視國家安全、環境衝突，而新自由主義則以廣義環境安全的取向為主，故其難以在概念上的衝突不難理解。

而就環境建制的本身來看，資本主義的論述總被認為是最主要刺激環保誘因的工具。因此京都機制的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的工具皆以商品的形式作為主要手段，故整體環境安全的價值往往只是口號，而也因此，在機制協商或談判時，國家利益似乎才是至高無上的。⁵⁶而從當前的現況與發展來看，即便國際間對於透過經濟工具建構環境安全的價值有極大的共識，但卻始終無法有良好的成效這點而言，其可從當前國際安全建構往往失敗的結果看出原因。例如，國家間皆秉持

⁵⁶從京都議定書的大國不加入以及哥本哈根會議中大國密室協商（林子倫，2010a）的過程即可發現。

現實主義的人性本惡邏輯，並認為權力才能帶來安全，故在彼此的惡意意圖下，最終卻落入了安全困境而無法避免一戰；而環境安全的建構現在也彷彿陷入一種「環境安全的困境」，且這樣的困境基礎亦來自於一個同樣是基於父權價值為基礎的消費主義與性別結構。

就安全困境方面，其總是國際安全建制中難以處理的重大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則如上所述（Keohane,1989a），是肇因於現實主義安全論述中的人性競爭意圖論述成為主流價值所致。⁵⁷而安理會作為當前國際安全建制中最重要的組織，其宗旨依據聯合國憲章第一條可知，其除了維持國際和平、打擊和平威脅外，更負有不分宗教、種族以及性別地增進人類福祉、增強「普遍」和平的責任。⁵⁸從這樣的宗旨目的可解讀為，聯合國除了維持國際和平外（符合環境衝突的論述），更應無區隔地促進普遍性的安全。故從此可以推論出，廣義環境安全以及性別環境安全觀點取向的環境安全應該受到安理會的重視。而同時，安理會依據憲章第二十四條扮演最重要負起和平責任的機構，⁵⁹故其當然應遵守上述的宗旨與職責，就有關國際安全的問題負起職責。然而，顯然在實際的運作上並非如此，而這樣的結果也代表著未來的國際環境安全政策的選項以及對於整體主義的環境安全目標而言，是相對受到限制的；且這樣的現象也同樣地反映在當前的環境建制。

基於上述的討論，筆者將在第一節就當前國際建制的環境安全論述趨勢做一整體性的探討。本文特別針對 2007 年安理會對於環境安全概念的討論，並對照其他環境建制部門對於環境安全的評估，推論出當前國際建制的環境安全論述取向。並據此在第二節中透過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視角批判與評估京都機制的談判過程、運作與結果檢，最後則提出初步的建議以及對後京都機制的發展的期待。

⁵⁷由此亦可知，當前非以環境衝突的取向的環境安全論述不被主流安全研究重視的結果是必然的。

⁵⁸可參閱聯合國憲章網址：<http://www.un.org/zh/documents/charter/>。

⁵⁹同註 2

第一節、當前主流建制的環境安全論述趨勢探討

過去的環境建制有關於氣候變遷與潛在暴力衝突的討論並不多，少數的例子如 1997 年的 IPCC 特別報告 (Special Report)，其認為如拉丁美洲的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水資源衝擊足以造成個人、區域甚至是國家間嚴重的暴力衝突；而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環境匱乏亦會加深在鄰近區域內的國家或國際衝突(IPCC, 1997:11-12)。而關於此類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突對於過去已早有資源衝突的西非尼羅河地區以及中亞地區尤為嚴重 (Stern, 2006 : vii)。

然而，相對於上述的衝突論述，大部分的看法並未將氣候變遷的衝擊直接與衝突畫上高度連結，而僅認為衝突是人類所面臨的其中一項氣候變遷衝擊。例如 IPCC 第二工作小組的第四次的評估報告 (Working Group II) 中即提到：「對於較脆弱區域 (vulnerable regions) 地區，衝突是肇因於其對於環境衝突的低調適能力 (IPCC 2007:19)」。

故從上述的討論可發在實際的建制論述過程中，大抵認為環境衝突並非直接與氣候變遷衝擊相連，而是與貧窮、不平等資源分配、全球化與疾病等其他衝擊因素交相結合所造成。例如 COP12 會議上時任聯合國秘書長 Kofi Annan 曾言：「氣候變遷也同樣會威脅和平與安全。以降雨型態改變的現象而言，其會加劇資源競爭的態勢，造成特別是脆弱國家或區域地區的潛在不穩定與大規模的難民遷徙。而已經有相當的證據顯示此種情況已經或即將發生 (UNFCCC 2006 : 23)」。

故這些有關資源匱乏與整體環境安全的問題，相關建置並非只關注衝突變數而已。

由此，儘管氣候變遷衝擊會導致衝突的論述在過去許多學術著作中，早已廣泛討論 (Myers,1989 ; Homer-Dixon,1991 ; Kaplan,1994 ; Homer-Dixon,1999 ; Brown,2005)，但實踐的評估報告或者安全建制中，涉及以「環境安全」的內容討論的往往皆是針對糧食、水資源以及其他環境資源取等等對全人類福祉或所可能造成的負面衝擊的考量，而其雖有衝突的關懷，但僅是一部分。例如，雖常

有關於潛在暴力衝突可能來自於水資源與水文（Hydrology）系統管理不善的論述，但這些研究同時也提出由氣候變遷所導致的全球水文系統破壞的其他威脅，而非僅關注衝突的結果（IPCC,1995）。因此，從這些資料中所可證實的是，儘管環境衝突的論述雖在出現在這些建制中，但其主要仍是在一個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架構下，亦即是不僅關注國家安全與衝突，而是以全人類以及社會發展安全為基礎。

這點我們亦可以從與傳統安全途徑貼近的聯合國安理會來發現這樣的結果。例如在 2007 年 4 月的安理會文件中首度出現了環境安全的詞彙。這似乎代表當前最重要的國際安全建制對於當前安全的定義亦出現了安全觀念上的轉變，認為氣候變遷將是未來國際或全球的重要威脅和平與安全的因素之一（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2007a）。⁶⁰

因此仔細檢視看似最符合環境衝突論述的 2007 年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可發現，儘管在會議過程中超過半數的代表都認為暴力衝突是氣候變遷衝擊（包括難民遷徙、資源爭奪等）下所可能造成的潛在問題。且更甚者，如納米比亞（Namibia）、太平洋島國聯盟代表巴布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以及吐瓦魯（Tuvalu）皆認為氣候變遷所對其帶來的衝擊就幾乎等於戰爭，只是造成即國家危難的工具不是發展中國家的槍砲，而是氣候變遷；而吐哇瓦魯等國也強調聯合國應將環境安全的概念納入其安全的核心思考（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2007b）。但這些論述並非代表該次討論完全是環境衝突取向的論述。首先，有將近百分之八十的發言談到氣候變遷的衝擊時，都與廣義的環境安全論述有所契合，例如，有許多討論聚焦在貧窮與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衝擊議題，而非僅討論國家或國際軍事安全；此外，許多代表亦認為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包括了人類與經濟生存發展、糧食與水資源、基礎設施、疾病以及難民等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推論與會的代表雖認為氣候變遷與暴力衝突有所連結，但其將更多焦點

⁶⁰該次會議由英國為安理會主席，其收到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在會前的來信，聲明要求召開討論氣候變遷與國際安全的問題。官方文件參考網址：
<http://www.un.int/wcm/webdav/site/tuvalu/shared/documents/SC/N0730973.pdf>。

是放置在更廣義的安全關懷上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2007b)。

故由上述的討論可以瞭解到，首先，安理會對於環境安全的討論是以廣義人類福祉的個人安全關懷，而非國家安全環境衝突的論述。因此，衝突論述僅被視為環境變遷所導致的廣泛結果之一，而並非是主流的觀點；次則，從安理會該次會議中亦可發現其似乎並非將環境安全的概念附加在傳統安全的基礎上(即是把環境變數納入到傳統軍事或國家安全的研究)，而是以一個新安全途徑(多元的安全主體)的環境安全論述為主軸。故2007年安理會所強調的必須將國家或國際安全的考量納入環境觀點，並非是將環境安全論述直接歸屬於衝突的取向，而在更多層面上納入了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

但這樣的發現仍不能因此而樂觀地認為，聯合國的國際安全建制的環境安全論述主流已並非是傳統論述的環境衝突途徑，亦或者更甚認為性別的關懷亦受到重視。故本文認為上述的發現，可解釋為就環境安全的面向而言，其牽涉的安全主體的確比起傳統軍事議題而言，更貼近一般個體與群體，故在討論環境安全的概念時，以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為基礎地卻較為貼切。

但回過頭再看安理會的討論過程，亦可發現環境安全議題在轉化為集體安全政策方面，仍是南北歧見的。筆者認為這與安理會本身即是現實主義的框架有關。⁶¹例如在討論未來安理會是否要扮演維持環境安全的角色時，與會的55位代表中，24位代表認為安理會應扮演主導角色，13位代表反對，18位代表無意見。而若從南北結構的角度觀察，則將近百分之七十的北方代表皆贊成應由安理會主導這議程；但南方國家贊成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而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南方代表亦認為安理會的組成結構中亦應有更多的發展中與小島國家(尤其是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甚鉅)的成員 (Detraz and Bestill,2009:312)。

因此，即便與環境衝突論述最相近的安理會，就環境安全議題的討論時，其仍是以廣義環境安全為主要取向，而非強調環境問題所可能帶來的各種暴力衝突這樣的結果。而這樣的發現若對照當前環境建置的談判過程亦相當吻合，因為不

⁶¹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機制即是重要證據。

論是京都機制還是代表開啟後京都機制的談判，其關於衝突的環境安全論述皆相當少，而少數出現環境衝突的論述如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第十三次締約國大會報告中曾談到：「若持續地不採取任何行動，氣候變遷將可使整個世界陷入衝突。而這樣的結果到了2010年，將會因氣候變遷、沙漠化和森林破壞等因素，造成多達5,000萬人因環境衝擊所造成的流離失所以及其對水、能源和食品的競爭所導致民族對抗和區域衝突(UNFCCC 2008:22)」⁶²。因此，從這樣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儘管該文件有提到衝突因素，但其並非全然地將環境安全的概念僅放置在可能造成衝突的結果，而是關注更廣義的環境安全議題。

不過，這樣的趨勢並非意味著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論述已成為國際安全社群（特別是安理會）的環境安全論述。從安理會的討論中，本文發現倡議環境安全必須關注人類福祉、生存等考量的倡議皆是由發展中國家所大力倡議，而召開會議的英國，卻是以環境衝突論述（以環境問題足以影響國際安全與和平為由）為號召（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2007b）。故不難預料這樣的討論在安理會的議程中，若無法有一個權威的環境衝突理論實證結果，那麼在一個仍較屬於傳統安全取向的安理會建制，此種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仍然難以排入後續的議程。這點從安理會自該次會議召開後至今皆沒有相關的會議即可證實本文的看法。故安理會（特別是大國）對於環境安全的概念顯然是秉持著衝突途徑取向的關懷，但由於不管在學術研究以及實證上皆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建構出環境與衝突的直接因果關係（Homer-Dixon, 1999），而也因此，安理會並未持續重視環境安全的概念。⁶²

而上述這樣的結果主因即是安理會仍是以傳統安全論述為主流的建制。故除非安理會的安全價值與本體論能有所改變，否則儘管在環境建制中已居於主流的廣義環境安全取向論述仍難以成為安全建制的主要觀點。因此，就安理會安全建制的角度而言，似乎環境衝突的論述才有可能受到重視。但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

⁶²這樣的結果代表著國家的安全並沒有徹底的受到環境衝擊的影響，因此在安理會中，環境安全的概念無法得到重視。

衝突論述取向將易導致狹隘的調適政策出現（以避免衝突為取向），使得廣義人類的調適及減量策略，甚而生態本身的安全皆被忽略或不重視。

而環境衝突論述成為安全政策核心價值的另一個問題為，其可能導致不同社會結構的成員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安全威脅時，那些仰賴自然資源以及生態系統作為維持生存運作的族群，特別以農業作為主要經濟型態的社群，將難以抵抗氣候變遷的衝擊。因此，如果國家僅重視以傳統安全為基礎的環境衝突論述，那麼就衝突論述的觀點來看，上述經濟型態的農業窮國將可能成為威脅和平的主要衝突威脅（因為其受到衝擊較大，將會向受衝擊較小的國家爭奪資源），而這樣的結果只會導致更多的生態破壞，而無法將調適策略引導至幫助這些環境不安全的國家或群體（Barnett and Adger,2007）。

此外，就環境治理面而言，環境衝突取向過分強調國家能力，亦會使得政府的調適政策容易偏向主流（或多數）群體，而非主流（或少數）群體則會受到漠視，而就衝突論述的觀點而言，後者將更容易演變所謂的資源爭取者，進而引發環境衝突（Paterson,1996）。因此，這樣過分重視國家安全價值的論述與政策，反而使得整體式的環境安目標無法達成（Nordas and Gleditsch,2007：635）。

但對於環境衝突論述的批判亦並不代表本文否認氣候變遷與暴力衝突相關的重要性。因為若氣候變遷所引發的衝突發生時，其亦將對於個人國家以及環境的本身再度造成傷害（Homer-Dixon,1999；Busby,2007）。不過我們必須理解到，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暴力與衝突並非是環境安全最重要的危機，因為真正的環境安全問題是來自於氣候變遷所可能造成的人類生存災難，故環境問題所造成的生存衝擊才是最優先的挑戰（Barnett and Adger,2007），而衝突結果僅是在這些治理與調適失靈時才有可能出現（Homer-Dixon,1999）。

故本文認為，環境衝突論述最主要的缺點即是，其忽略了廣義環境安全面向的重要性，因此即便氣候變遷導致衝突的調適與預防對於維持環境安全有幫助，但過於關注國家安全的取向，將使得主流群體而非嚴重受到環境衝擊的弱勢群體得到面對衝擊的調適能力。故其狹隘的研究關懷並無法與環境安全議程中相當重

要的環境平等與正義概念有所契合，更無法關照到弱勢個體或群體的環境脆弱性與不安全。

由此，衝突威脅的論述固然有其重要性，但環境安全是個相當複雜且多元的議題，其所考慮的面向不僅只於衝突威脅，而更多是關於環境威脅所造成的多元不安全現象。而就當前國際建制的環境安全論述而言，雖然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是主流，但從安理會 2007 年那一次的討論到至今為止，再也沒有召開相關的議程，足此可推論廣義環境安全的取向並未成為安全建制的主流。因此，環境衝突的主流性在當前的國際安全建制中不言而喻。而這樣的結果可能帶來的是環境安全政策選項的相對限縮，並可能僅對於主流安全社群有利，使得環境正義的價值被抹煞 (Parks and Roberts, 2006)，更造成鑲嵌在性別差異的不平等安全結構無法得到解放。故本文認為，環境衝突取向的關注雖有其必要性，但與廣義環境安全論述途徑比較起來，後者似乎才是較為適切的取向。但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在性別視角的議程方面仍較欠缺，故倡議性別環境安全的論述本文認為有其必要性。因此，在下節本文將就此關懷來檢視當前環境建制的發展、運作與結果進行討論，並勾勒出當前國際環境建制的性別盲。

第二節、京都議定書的批判與展望：一個性別視角的批判

京都議定書於 1997 年簽署，其是以 1992 年所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為基礎。而 UNFCCC 最重要的專門機構包括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世界氣象組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以及 1988 成立的 IPCC。這幾個重要的機構負責評估環境的風險性。特別是在 1990 年 IPCC 提出的第一次評估報告中提到表明氣候變遷儼然已是人類的最大威脅，並呼籲全球共同締結一個全球性的公約以凝聚環境保

護的共識，故聯合國在當年即成立了「政府間談判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nference, INC）」，正式敲啟了 UNFCCC 的制定過程（Haimson, 2001；李河清，2001）。⁶³

而 UNFCCC 於 1994 年生效，共 189 個締約國，並規定每年舉行一次締約國大會（Conference of Parties, COP）討論當前公約的實踐狀況。但因為 UNFCCC 對於減排的標準並無明確的規範，以及 IPCC 在 1996 年的第二次評估報告中談到，當前工業化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是導致全球暖化與海平面上升等環境變遷的重要因素，而若想要在 21 世紀前達成全球二氧化碳能夠低於工業革命前的兩倍，則當前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削減一半以上。故催生京都議定書之聲浪開始萌芽。而京都議定書也順利在 1997 簽署完成且在 2005 年生效，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環境安全機制。因此，以性別環境安全的視角而言，本文認為京都機制的運作是探討性別觀點時相當重要的經驗性資料。故在下部分中，本文將就京都機制的談判過程、內容以及後京都機制的開展，以一個性別的視角進入觀察，並展望未來後京都機制的發展。

壹、京都議定書與性別視角的环境安全

一、京都議定書談判的性別觀點

就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而言，相關的討論甚少關注到其中的性別意涵，因此關於京都議定書與談判的文獻中甚少有性別敏感度的視角。⁶⁴但事實上若以京都機制談判中的三個主要群體（community）來觀察，⁶⁵可以發現女性在談判的過程亦扮演著重要角色（Villagrasa,2002）。

而女性在氣候變遷談判過程中，其角色與參與之重要性因素在於，女性因結構性等因素，使其所面臨氣候變遷的衝擊遠比男性沈重了許多。故糧食、營養與

⁶³其下設立三個工作小組（Work Group, WG）：WG I 評估氣候變遷之科學證據，WG II 研究氣候變遷的衝擊影響，WG III 研擬因應策略，另設一特別小組，以提倡開發中國家的參與。145 它的秘書處設置於瑞士的日內瓦，工作成員多來自 WMO 和 UNEP。

⁶⁴不論是國內外的文獻，都較少有此討論，可參閱李河清（2001）以及 CICERO（1998）之報告：<http://www.cicero.uio.no/media/51.pdf>。

⁶⁵即是，政府代表；企業的商業代表等以及環境非政府組織（NGO）三大社群（Villagrasa,2002）。

衛生等由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往往對於女性的生存與環境安全帶來較大的影響（Flynn and Mertz,1994；Davidson,1996）。⁶⁶而女性所受到的衝擊又因南北國家的社會結構差異而有所不同（南方國家的女性所面臨的環境調適過程又普遍上比北方國家來得困難），主要因素即是在於南方國家的女性往往大多處在社經地位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階層（Vital Climate Graphics, 2000）。因此，從此角度出發（例如，孩子生存環境的擔憂使她們對環境保護更多了一份關注，婦女幾乎具有了一種天然的先鋒性，而成為環境保護的重要生力軍），就不難理解為何參與環境 NGO 的女性普遍多於男性了（Villagrasa,2002：42）。⁶⁷

而在 1997 年在日本持續兩個月的官方談判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參與者皆彼此相當熟識，故個人層次的決策模式是當時談判的主要型態，因此決策的制定與達成往往是在個人的影響力、互信與尊重的情況下達成，而不是全然地國家經濟與政治立場的角力（當然這仍是談判代表的立論基礎）。故此因素也提供了女性談判代表有其發揮影響力的空間（Villagrasa, 2002）。以下將就談判過程中以及女性在這些談判社群中的立場與角色做概要性的說明：

（一）官方部門：政府間談判

在政府間的談判上，有相當多各種不同領域的談判者，其依照國家立場可普遍區分為，歐盟(European Union)、77 國集團(Group 77)以及 JUSSCANNZ（即是日本、美國、瑞士、加拿大、挪威與紐西蘭，又稱傘型集團）三大重要的談判主體(Newell,2000；李河清，2001）。⁶⁸

而雖然女性的談判代表是少之又少，但從德國與瑞士的女性代表對於氣候

⁶⁶女性除了要對氣候變遷所可能帶來的衛生疾病問題外，普遍上亦還要擔起家務及直接撫育孩子的責任。

⁶⁷以台灣為例，女性的環境參與亦高於男性，可參閱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之婦女與環境報告，文件參考網址：

<http://www.wrp.org.tw/word/%E5%A9%A6%E5%A5%B3%E6%AC%8A%E7%9B%8A%E5%A0%B1%E5%91%8A%E6%9B%B8/%E5%A9%A6%E5%A5%B3%E8%88%87%E7%92%B0%E5%A2%83.doc>；以及當代思潮與台灣發展資料庫之環保運動與生態主義，文件參考網址：http://www.mcu.edu.tw/department/genedu/2echelon/92report/a03/0807_09.htm。

⁶⁸歐盟國家代表對環保議題較為關切，政府也採取較積極的態度；77 國集團則意見較為分歧；JUSSCANN 則贊成透過彈性機制及交易行為來達成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

變遷的相關發言與談話，就足以發現女性對於環境問題的切身性有更緊密且深刻的關懷。而這樣的過程對於建構京都機制亦有相當正面的影響。例如，這些來自北方國家的女性代表往往與其男性同僚不同，其往往較為積極，且在任何會議中都相當強力地推動京都機制的建立。特別是這些代表往往會將發展中國家的意見帶進決策過程之中，例如當時的荷蘭環保署署長（女性），即會代表南方國家幫忙發言（Villagrasa,2002）。⁶⁹

再者，由於 77 國集團因為內部又分裂為島國聯盟（The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與石油輸出國（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兩大不同意見的集團。⁷⁰但德國與瑞士的女性代表皆能在一個彼此互信的基礎上，以共同為環境保護為使命的前提下與兩方溝通協商。而除北方的女性代表之外，南方國家中如辛巴威與祕魯的女性代表亦也相當積極地倡議京都議定書的實踐。而從這些女性代表者的發言中都可發現其基於自身環境的經驗所倡議環境安全的建制的態度與行為上，是在某種程度迥然於一般男性對於環境的理解與看法（Villagrasa,2002）。⁷¹

最後，歐盟與 77 國集團能大致結合起來，力抗美國與日本之傘型集團的反對，使京都議定書能簽訂完成的結果。本文雖不認為女性官方代表者扮演了主要的關鍵的力量，但透過上述的討論，可發現女性在性別框架下，其與自然環境的共生關係的連結是較為親近的，因此若愈少的性別盲出現在決策者與談判代表上，⁷²對於環境安全的建構應有較高的正向關係。

（二）非官方部門

1. 企業部門

⁶⁹南方國家代表往往較少，在平行舉行的議程中無法每場參與。

⁷⁰AOSIS 由一些低窪與島嶼國家成立的聯盟，如馬爾地夫、關島以及牙買加等國，其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響程度較大，故希望京都議定書能快速生效，並嚴格限制工業化的溫室氣體排放；OPEC 集團則以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與伊拉克等國，因為石油輸出為其主要 GDP 來源，而二氧化碳排放相當程度來自於石化燃料的使用，故其較反對嚴格的排放標準（李河清，2001）。

⁷¹男性大部分對資源的定義都建築在資源的可用性的基礎上，而非共生的倫理觀。

⁷²本文並非要強調女性代表愈多愈好，而是認為不論是男性或女性的代表，若其愈能具備性別敏感度的思考，那麼愈有利於建構環境安全的目標。

企業團體是最欠缺女性參與的部門，其幾乎可以算是男性的俱樂部，若從企業與官方部門的談判或遊說過程，似乎更印證了這樣的結果。而京都議定書的談判中，美國的企業代表是最多的，扣除 e5（即 The European Business Council for a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組織的相關企業部門支持京都議定書外，其餘（包括美國）的企業部門，皆極力遊說官方代表反對簽署京都議定書。而其雖然失敗，但從下部分本文對京都議定書的實質內容探討時，即可發現企業部門仍透過其力量，弱化了京都議定書的規範力（從商品形式的減讓工具與機制則不難理解）。而究其企業部門在大目標（反對京都議定書的簽訂）失敗之因在於其過於商業本位主義的思考，因此除了 OPEC 的相關國家代表支持這些企業組織外，其無法拉攏其他的 77 國集團成員。而 e5 的企業部門代表則與之不同，其雖然強調以京都議定書的規範須較為彈性，但其亦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必須受到重視（Villagrasa,2002）。⁷³

故就上述的討論可知，以美國企業組織為首的企業代表幾乎是完全性別盲的，其立論的基礎無外乎即是父權結構下的思維，無止盡的經濟成長與競爭的關係。其是一種強調國家利益（GDP 無止盡增長論）、自然環境是為人類所用以及可無止盡剝削自然的壓迫論述。故這類型的企業組織頂多僅理會環境衝突的安全論述，即是當所謂人類可茲剝削的資源出現危及時，才願有所因應；而 e5 等企業組織則與廣義環境安全的途徑較為類近，特別是其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視，但如第三章談到的，這樣的論述仍然是性別盲的，因為其所定義的永續發展仍是傳統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邏輯。故這樣的永續發展僅對於擁抱父權特質的個體或群體有利，因此企業部門的主張與欲建構整體的環境安全的目標是有段距離的。

2.NGO 部門

環境 NGO 是最強烈倡議京都議定書生成的一個重要群體（Adger et al,2001）。這些環境 NGO 捍衛如 AOSIS 的權益並認為在 2005 年之前應該要

⁷³可參閱 e5 官方網站：<http://www.e5.org/index.php>。

達到比 1990 為標準還要低百分之二十的二氧化碳減量 (Victor,2001:90)。而在這些 NGO 組織中，雖男性主導了一些重要的大型組織，但多數的參與者皆來自女性。且值得注意的是由這些環境 NGO 所組成的聯合陣線—氣候行動網 (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其領導者大都皆是女性。⁷⁴因此，儘管環境 NGO 的力量與遊說力 (沒有強力的經濟資源) 有限，但其透過有效與積極地參與、撼動人心的演說以及其與媒體的連結，將其看法表達至外界，進而迫使決策參與者必須重視其意見。

而 NGO 在京都議定書談判期間彼此間能夠整合發生，似乎又與廣泛的女性參與有關。因為儘管在 NGO 間對於議題關注上雖有差異，但其皆能夠在一個以環境安全為主軸的大框架下凝聚共識，使其能夠在京都談判議程上受到重視。例如美國氣候行動網就曾在一個高規格的談判協商過程中透過極具感性與說服力的演說，吸引了大眾媒體的目光並搏得重要的新聞版面，而這些過程都是著京都議定書能夠被簽訂的原因之一 (Villagrasa,2002)。

因此，就環境 NGO 的力量而言，若其打單幫而非共同合作凝聚力量，恐怕難以在當時的談判議程有被凸顯的機會。而我們雖不能本質論地認為女性必然愛好和平與環境，但可確定的是這些組織大部分的參與者與領導者皆是女性，且其確實暫時撇開個別組織的私利，而在一個大架構的環境安全目標進行努力，故其確實與父權結構所強調競爭與勝利者的論述者有所差異。

從此點來看，環境 NGO 的社群似乎性別盲的現象是較小的。但僅透過女性的參與來達到環境安全是不夠的，因為對於父權價值的解構，應是不分社會性別的普世價值。但顯然地，以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而言，這樣性別結構的關係仍存在，故更多對於父權價值體系有所體認的男性更應該加入，以環境 NGO 作為草根的力量，逐步地對父權結構進行解放。

(三) 小結

⁷⁴CAN 為各國皆有相關分會，比較大型且積極運作的如美國氣候行動網 (USCAN)、歐盟氣候網 (Climate Network Europe)、加拿大氣候行動網 (CAN Canada) 以及英國氣候行動網 (d CAN UK) 等。可參閱網站：<http://www.climatenetwork.org/about-can>。

在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大抵可發現女性在官方協商的過程以及環境 NGO 的整合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從京都議定書的談判到簽署的過程中可知，主流國家所強調資本主義邏輯一直扮演著阻礙有效環境安全建制的形成。因此京都機制雖形成了，但可確定的是其並非是在一個已經破除父權價值的邏輯上，而是仍充滿著資本主義為中心的妥協的環境安全建制。雖然，相對於其他政治與經濟建制安全的框架而言，其攸關的確實是較為多元的安全面向，但顯然在官方的協商過程中，是以國家安全為主；在一般企業群體而言，其關心的是企業若參與減排有沒有經濟誘因，對於生產與成本有沒有影響，而不是考量企業與環境永續的共生倫理；對環境 NGO 而言，其關注的才是非國家的環境安全，例如對於女性、兒童以及各種弱勢團體，以及其對於生態的關懷（生態安全）。

故就京都議定書而言，其而缺乏性別敏感度的思維應不難發現，⁷⁵這些在下部分中有相關實質內容的討論。但無論如何，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完成都不可抹煞其作為人類建構環境安全建制的初步重大成就。

二、京都議定書機制的性別觀點批判

京都議定書的實質重要成就可分為三點，第一、關於減量時程與目標，主要是指在 1992 的 UNFCCC 附件一的國家，⁷⁶及摩洛哥與列支敦斯登共 39 個國家，將排放之六種溫室氣體換算為二氧化碳等量，並與 1990 年相較平均削減值須為 5.2%，同時採差別減量的標準；⁷⁷次則為，在六種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甲烷（CH₄）以及一氧化二氮（N₂O）管制基準年為 1990 年，⁷⁸而氫氟烴（HFCs）、全氟碳化物（PFCs）與六氟化硫（SF₆）為 1995 年；⁷⁹第三，京都議定書所達成

⁷⁵官方談判過程中不難理解仍是國家安全中心、國家經濟競爭的思維，但卻未思考試誰的安全誰的經濟競爭，亦或者是誰的永續發展。

⁷⁶即是 OECD 集團中扣除墨西哥外的所有 24 個成員、歐盟、前蘇聯各共和國以及前東歐共產國家，共 37 個成員。

⁷⁷歐盟及東歐各國 8%、美國 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蘭 6%，另冰島、澳洲、挪威則各增加 10%、8%、1%。減量時程為 2008 至 2012 年，並以此 5 年的平均值為準。

⁷⁸CH₄ 即是一般的天然氣主要成分的碳氫化合物；。

⁷⁹含氟溫室氣體(F-gases) 是人工合成的強力溫室氣體總稱，京都議定書列舉上述的溫室氣體是

的三大機制為未來排減溫室氣體的主要模式，分別為「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⁸⁰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及共同執行（Joint implementation, JI）（外交部專題報告，2008）。⁸¹

但若就文本來檢閱，可以發現其在各個環境安全的概念中都未有直接針對女性在氣候變遷衝擊下的關照。筆者認為在該議定書中若有納入性別觀點或認知到父權結構的思考，那麼以其效力之高度，在各項的細節工作上將會更有法源的依據，性別差異的結構現實才有機會被徹底的重視。⁸²故下文將以一個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解構或批判京都議定書的內容。⁸³

就文本部分的批判而言，京都議定書第二條第一款的 a 項部分談到：「關於在考慮到氣候變化的情況下促進可持續農業方式」以及「研究、促進、開發和增加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固碳技術和有益於環境的創新技術」，以此條文內容為例，這樣的論述不難理解是廣義環境安全研究途徑的邏輯論述，但所謂可持續（或稱永續）的方式，並未區別出女性在農業過程中的角色；而對於能源的概念，在當前仍是資本主義的父權結構下，關於這點的目標想必仍必須透過市場機制才能達成（因為對於能源開發而言，父權價值強調的是資源競爭與利潤）。所以不難發現在下面的相關條文中出現了，「逐漸減少或逐步消除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部門違背公約目標的市場缺陷、財政激勵、稅收和關稅免除及補貼，並採用市場手段」的論述。故就第二條而言，本文並非認為其無意義與價值，但就性別敏感度的觀點而言，這樣的手段皆是消極且落入無止境的以父權價值（資本

最主要的化合物，其中 HFCs 排放是在進行設備維修、或棄置空調、冰箱時，洩露出來而產生溫室氣體，且使用最為普遍，佔了 F-gases 排放總量的九成多。可參閱：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campaigns/stop-climate-change/science/hfcs>。

⁸⁰CDM 大抵指，不分附件一國家與非附件一國家，工業國對開發中國家進行技術及財務協助其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之機制。

⁸¹ET 的構想來自 1992 年的地球高峰會，主要是指透過國際排放交易制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項建議得到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UNCTAD）的支持，故廣為南方國家接受；JI 是指附件一國家以資金或技術提供另一個附件一國家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同時可以取得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故其僅限於在附件一國家間進行。

⁸²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會議上，女性的相關參與組織與會議相當可觀，這可見京都機制再過去的性別盲是相當嚴重。可參閱：<http://blog.yam.com/tiseop15/article/25913163>。

⁸³本文以中文文本直接檢視，可直接參考網址下載：

http://www.tri.org.tw/unfccc/download/kp_c.pdf。

主義)為思考的環境保護矛盾邏輯，並用父權手段(市場手段)來確保環境安全的目標，顯然不難遇見其未來執行效率不彰的情況。

又例如第三條論及關於溫室氣體的排減部分，其中第三款相當值得玩味：「...由人引起的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活動...。與這些活動相關的溫室氣體源的排放和匯的清除應以透明且可核査的方式作出報告，並依第七條和第八條予以審評。」，這裡的論述出現的性別盲即是對於「人」的概念的定義並不清楚，從條文可發現其認為環境不安全的是來自整體性的「人」所造成，但其實實踐上卻是性別與南北差異的，可是京都議定書只有立基在南北差異，但卻沒有性別差異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

而就三大機制的性別敏感度觀察。就清潔發展機制而言，在議定書第十二條第九款有談到：「對於清潔發展機制的參與，包括上述第3款(a)項所指的活動及獲得經證明的減少排放的參與，可包括私有和/或公有實體，並須遵照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可能提出的任何指導。」，條文看似有助於總量排放上的減少，但本質上，清潔發展機制是一種經濟工具，工業國家出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計畫，並由該機制將部份減量成果分配給出資國作為本國減量成果。

故CDM的邏輯即是前文所談及的父權價值惡性的環境安全機制，因為在觀念本質上，其並沒有環境共生的倫理，而仍視自然為被剝削的客體。故當溫室氣體落入資本主義成為商品時，溫室氣體變成競爭的資源，故為了獲利反而更容易製造溫室氣體。而雖然CDM明文規定，減碳額度不能是刻意生產出的，但在條文中鑽漏洞亦並非不可能。這在實際個案上亦曾出現，例如非洲許多鑽油井的露天油氣燃燒槽的持續開放，但卻會持續造成有毒汙染，但發展中國家此舉不但可一方面接受CDM的援助獲利，而另一方面卻也藉著排放溫室氣體來家援助的資金(王茹涵，2008)。

此外，CDM亦具有社會層面的問題，但往往因為計畫執行者不夠重視而被忽略，例如以瓜地馬拉(República de Guatemala)是全球第一個以植樹進行碳補償的計畫，但因為未考量在地社會脈絡而失敗(王茹涵，2008)。故從上述的討

論中即可發現，若是有個性別環境安全觀的倫理能體現在該公約或相關機制時，或許能改變這樣的結果。

而就碳排放交易而言，其受到的關注與期待與比CDM高得多（王茹涵，2008；Giddens,2009）。在議定書第十七條中亦談到：「締約國大會應就排放交易相關的原則、方式、規則和指南，特別是其核查、報告和責任確定。為履行公約第三條規定的承諾的目的，附件B所列締約國家可以參與排放交易。任何此種交易應是對為實現該條規定的量化的限制和減少排放的承諾之目的而採取的本國行動補充。」。故就ET而言，商品的範圍的界定當然包括所有議定書附件A中提到的六種溫室氣體。故當某國溫室氣體排放只要低於分配的額度，就可以用多出的額度與需要的國家進行交易（談珮華，1999）。

而對於這樣商品交易形式，著名的Stern Report亦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碳排放市場的形成，可刺激減排所需要的技術創新（Stern,2008）。而Giddens（2009：201）則認為這樣的思考完全忽略了政治與權力結構的因素。是故就政治與權力結構的因素來思考，Giddens認為大國政治與地緣政治必須受到重視，但若就性別環境安全的觀點而言，反思這些父權結構的運作才是真正追求整體環境安全的重點。因此，若從此角度觀之，在主流父權體制下的全球結構下（Enloe, 1990），這套徹底的父權資本主義思想當然受到普遍的支持。

最後，就共同執行機制而言，JI主要是由附件一國家以資金或技術提供其他附件一國家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同時可以取得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故其是只限於附件一國家間進行的減量活動。但共同減量措施基本上是一種零合的概念，是附件一國家間總減量成果維持不變的機制。換句話說，有些國家國內溫室氣體減量成本過高可透過此機制的運作，以較具優勢的方法或較低的成本，在其他國家內進行減量的計畫與措施，不但本國可以得到部分的減量額度而達成其所承諾的削減量，也可以使附件一中國家的總減量成果不會減少（石信智，1999）。⁸⁴故這樣的結果很清楚地可以發現，關於JI的機制是相當消極的，且植基在北方國

⁸⁴可參閱京都議定書第六條文本。

家的利益妥協。而主因仍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擁護與維繫，故在這套機制下的溫室氣體工業活動，既存的性別盲仍可能無法受到關照。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清楚發現京都機制所存在的性別盲現象。但這也並非全然否定京都議定書作為全球環境安全建制的重要性。特別是其關於「共同但區別責任」的原則，⁸⁵是較為體現差異結構的邏輯。但其對於發展的論述，不容質疑地仍是在一個以競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框架，不過至少透過這個原則，弱勢群體的至少得到部分的關注。

三、京都議定書運作的性別觀點

1997 的京都議定書僅是原則性的宣言，其之所以簽署完成主要來自於其引入了的市場機制，並滿足了南方國家的期待。故透過這些機制使得締約方可以透過在其他國家進行有利於氣候的投資和排放貿易以達到遵守規定的目的。因此京都議定書一旦生效其所產生的利害關係不容小覷，故在細節協商過程常遇到重大阻礙，甚至在 2000 年月底幾乎停頓。然而，當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美國宣佈退出談判後，反而激起了其他支持者的決心，最後在 2001 年 1 月締約國第七次大會上通過了《馬拉喀什協定 (Marrakesh Accord)》。其包含了 39 項締約方會議的決定，並為最終批准京都議定書提供了模式框架和實施規則。

而京都議定書雖最終於 2005 年生效，但其實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京都議定書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其對全球氣候暖化的影響的作用是有限的，這不僅因為其減少排放承諾的法律範圍期限僅到 2012 年，更因為其同意不對未列入公約附件一的締約方，在執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時訂定任何承諾。⁸⁶而未列入附件一的一些締約國（如金磚四國）亦正在高速工業化，其排放量很可能在當前的承諾期中趕上發達國家。而當然，並非所有被認為對歷史及當前排放須負主

⁸⁵已開發國家應承擔歷史和現實責任，應率先承擔減排義務和提供額外的資金和技術，幫助開發中國家提高減緩和適應氣候變遷的能力。而開發中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社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消除貧困，現階段不能承擔減排義務，並允許溫室氣體減排應隨著經濟發展有所增加。

⁸⁶參見京都議定書第十條

要責任的國家都願意加入京都議定書（特別如美國與澳洲等國）。⁸⁷

此外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即是 2008-2012 年，但顯然目前各國並未達到原先的承諾標準，反而排放量有更增加的趨勢。⁸⁸因此在京都議定書生效的兩年後，也即是 2007 年在印尼峇里島（Bail）為第二期承諾鋪路的會議，也即是峇里島路線圖（Bail Road Map）反而成為了眾所期待的後京都機制開啟宣言。

故從上述簡要的京都議定書從簽訂到生效的過程以及短暫的實踐結果，其結果似乎是讓人失望的。從簽署到徹底生效的期間就高達八年（在這八年間願意自行服膺京都機制排減的國家並不多），故從生效開始到第一期承諾的期限也僅只剩七年，再加上美澳等重要大國不加入，這使得要達到當初所預期的目標似乎幾乎不可能。

故從京都議定書當前的運作似乎一般人會有此心得，即是就環境問題而言，其攸關的確實是整體性的安全與利益，但除非有個權威科學機構能夠證實電影「明天過後」的情節確實會在工業持續污染的環境下來臨時，或許國家間才真正願意合作，而不會皆當想當「搭便車者（Free Rider）」。然而這樣的論述，若以一個性別敏感度的角度思考，則可以理解這未必是真理，因為人類的價值形塑來自於道德教育，人性並非全然是利己（資本主義）的思考，故透過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價值形塑，將有助於排除上述那樣的思考，並建構一個多元整體的環境安全建制。⁸⁹

貳、後京都時期的環境安全談判

京都議定書雖代表國際間有以合作因應由於人類文明對地球生態構成破壞性衝擊的全球氣候變遷共識，但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的排放減量標準各國卻仍

⁸⁷例如美國的全球總溫室氣體排放即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崔愷欣，2006），可參閱網址：<http://blog.roodo.com/gcaa/archives/1120130.html>。

⁸⁸鳳凰網電子新聞，網址參閱：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mainland/201004/0413_17_1602379.shtml。

⁸⁹這並非意味者要跳脫人類中心的思考，因為身為人類，以人類中心是難以避免的現象，但重要的是人類具有許多對於社會與自然關懷，這點從生態女性主義以及各種捨己為我的論述中都可以發現。

有所爭執而未有一致的共識。例如，京都議定書從簽訂到生效的過程中，美國、澳洲與加拿大雖然對於溫室氣體減讓與其他的京都議定書簽署國有所共識，但美國認為中國雖非附件一國家但其卻是排放大國，故要求這類所有國家均必須負擔減量義務，不應有所區別；加拿大與澳洲政府則也與美國同聲一氣，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高排放量國家都不能適用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框架（外交部專題報告，2008）。

然而京都議定書執行成效的第一承諾期間將於 2008 年開始並至 2012 年到期。且於此時科學社群亦指出，全球溫室氣體必須在 2015 年開始逆轉，並將全球溫度控制在不超過上升攝氏兩度，否則氣候變遷將對地球帶來不可逆的劫難。故 UNFCCC 締約國於 2007 年 12 月於印尼峇里島召開第 13 次締約國會議

（COP13），針對各國如何達成京都議定書減量標準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其主要之目的即是為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間的後續—即是所謂的後京都時期，進行規劃。

因此各國在 COP13 會前各種場合紛紛表示對於各國如何具體落實減量以落實 UNFCCC 之義務立場，例如，美國仍一貫地重申像中國等開發中國家卻亦是排放大國者，應同樣有減量的義務；日本則希望能儘快制定出一個可被所有國家都接受的減量規範架構；以英國為首的大英國協成員則不希望於此次會議中做出具體之承諾；澳洲則因為政權輪替後，新政府改變過去立場簽署京都議定書，而不再與美國同聲一氣；而已有相當減量成果的歐盟，則積極的鼓吹制定更具體的訂出後京都議定書時期的減量標準；溫室氣體排放已成為世界第一的中國，則透過官方媒體釋放出不願意承諾具體減量義務的聲明。

而 2007 年在印尼峇里島共有來自全球 189 個國家約 11,000 人的產官學代表參與此次的會議，並針對後京都時期減量承諾與規範的討論與協商。故在會中提出了「峇里路徑圖」(Bali Roadmap)，並據此制定「峇里行動計畫」(Bali Action Plan)，以做為後續協商與執行的依據。其主要包括調適政策(adaptation)、毀林(deforestation)、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 與技術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

等議題。而依照峇里路徑圖，在應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37 個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全部參加為前提條件下，其聲明將在 2009 年前——也即是 COP15 召開時，完成在 2013 年接續京都議定書的新協議。至於新的議定書主要內容，根據峇里行動計畫，將在 UNFCCC 架構下成立一個由全體締約國共同參加的工作小組，來啟動後京都規範的國際協議談判籌備工作。而各國除同意採取進一步行動，減少開發中國家因森林砍伐而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外，更決定在 2008 年，也即是 COP14 上由已開發國家針對開發中國家為因應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排減之目的，設立「京都議定書調適基金」（外交部專題報告，2008；林子倫，2009）。

但該次會議對於溫室氣體的排減部分仍沒有共識，歐盟及開發中國家希望能夠明定已開發國家以 1990 年排放量為減量標準，並考慮至 2020 年減少 25%~40% 的溫室氣體。但美國、日本、加拿大與澳洲皆反對，其認為開發中國家，特別如中國等因經濟發展而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國家應納入規範義務範圍。而這樣的意見分歧，使得為期二天的會議與協商屢經波折，而美國不願意領頭卻又不願意放手的態度，更飽受其他開發中國家的不滿與指責。⁹⁰透過加開會議的協商，以及歐盟的讓步，雙方終於同意把「2020 年減少 25%~40% 溫室氣體」等目標，不放入峇里路徑圖中。此外，加拿大與澳洲則表示願意接受在 2020 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水準上減少 25% 至 40% 的目標。美國也接受中國與印度要求應增列已開發國家支援溫室氣體減少、及氣候變遷適應相關技術予開發中國家的內容（外交部專題報告，2008）。

峇里島會議雖然有具體的成果，特別是為後京都議定書時期的協商與開展進行規劃，但由於 37 個依照路徑圖須負起減量義務的國家是以 2009 年做為期限才達成協議共識，故實際上各國的爭議仍未獲得確定解決。也因此，COP13 並沒有真正制定 2013 年開始的減量標準，而是將這個問題留待 2009 的國際協商來解決。故其所得初步成果僅是締約國決議或聲明發動長期的合作行動來完整

⁹⁰例如當時巴布紐幾內亞代表強力砲轟美國的不作為又愛干預，其要求美國負起領導者角色，要不然請讓路（get out the way），這段發言受到 COP13 與會代表的熱烈掌聲，更是促成峇里路線圖完成的重要臨門一腳（林子倫，2009）。

(full)、有效(effective)且持續(sustained)地落實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之程序，以便能夠在 COP15（丹麥哥本哈根會議）時針對後京都時期能達到一個重要結果（外交部專題報告，2008）。

故在上述的發展下，2009 年的丹麥 COP15 即成為建構後京都機制與規範的主要期待，而哥本哈根議的討論焦點有四點：第一，在「攝氏兩度」的前提下，科學界呼籲，附件一國家必須在 2020 年前，自 1990 年的水準減少 25%-40% 的溫室氣體排放，而到了 2050 年則須在 90 年基礎下減少 80%，才能有真正緩和暖話的幅度；次則，已開發國家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穩定、適切而可預計的資金與技術援助，讓發展中國家在兼顧國內溫飽與發展的同時，也有足夠的能力應對氣候變化，例如再生能源的使用、森林的保育、氣候災難的調適等；第三，發展中國家作為 UNFCCC 的締約國，在上述發達國家承諾資金與技術支援下，發展中國家應在自身的能力情況下，循序漸進地展開減排行動，制定適應與緩減政策；最後，則是討論關於確保主要的森林區域（如亞馬遜和印尼雨林）於 2015 年後不會再有非法砍伐的情況。⁹¹

因此，基於這些討論焦點可知哥本哈根會議乃牽動了全球環境保育方針的使命，故在 COP15 上 192 個國家的元首將會決定上述議題由全球元首出席議決。但顯然 2009 年的談判讓許多期待建構國際環境安全的聲浪以及許多倡議環境保護的 NGO 失望了（Germond-Duret and Howe,2010），回顧哥本哈根的氣候變遷會議，其首次在國際政治場域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視，將近四萬五千人的參與以及各國幾乎領袖代表的出席，以及主流媒體的參與，都代表環境安全的議題在國際政治場域已逐漸成為主流議題（林子倫，2010a）。

但這為期十三天的議程卻令世人失望，就本次的最終協議文本，「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 Accord)」而言，其雖具政治意義但卻沒有法律的實際約束力，更沒有個別國家的實際排減目標。其具體內容面若檢視此協定主要是由美、歐、日、加以及中國、印度等總排放量佔 80% 以上之國家所支持，而大多數國家其實

⁹¹ 詳細資訊可參閱網址：<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ch/cop15/about>。

非常不滿意。但其之所以沒有難產之主因在於該協定中有談到附件一國家須於 2010 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各自減量承諾，而附件一以外的國家則須提出各自國內排減行動的方案，此外，「島國聯盟 (AOSIS)」亦同意此項協定並定 2015 年將再依可能已達成的減量行動來檢視 UNFCCC 最終目標，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增溫限度由 2.0°C 調降為 1.5°C 以下的目標。

另外，在調適、技術移轉以及減緩森林退化等議題上，此協定也僅有原則性的描述，而儘管較具體的承諾如墨西哥提議協助發展中國家進行減緩森林退化、調適、能力建構及技術發展的「哥本哈根綠色氣候基金」，已開發國家雖承諾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間，將提供 300 億美元的資助，並於 2020 年時已開發國家共同每年有 1000 億元的資助，並談到關於基金的運作將視調適與減量並重，且對於低度發展國家、小島國家以及非洲等地區，其調適應為最優先。但對於這 300 億基金的實際分配以及未來要募集方式，此次會議亦沒有得到答案，而是一切靜待 2010 年墨西哥的 COP 16 繼續協商(胡思聰, 2010)。因此，儘管 2008 年 COP14 正式啟動調適基金以來(林子倫, 2009)至 COP15 開議已有一年的時間，但關於這最基本的援助調適基金卻也沒有具體的方案。

故這樣的結論與結果受到廣泛地批判，不難想像即是因為自 COP13 以來兩年的折衝與溝通以來，似乎只換來一個大拜拜以及推諉式的起點，而沒有一個實質的進展。因此媒體將 Copenhagen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諧音－希望之根

(Hope-hagen) 的標題，改為令人失望的破滅之根 (Broke-hagen) 亦或者二氧化碳的哈根(CO₂-hagen)。而這些無奈與失望的源頭許多國家皆認為就是源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角力與阻擾，也才造成如此多國家雖不認同此項協定，但為避免出現一個毫無建樹的 COP 15 才無奈簽署的現象(趙家緯, 2009；林子倫 2010b)。

92

⁹²例如蘇丹在會場內嚴厲抨擊增溫 2°C 的低限目標，根本罔顧非洲的利益，等於是對非洲進行另類的大屠殺；拉美國家則質疑大國關起門來協議的制定程序是骯髒的密室政治交易，更是對 UN 體制的傷害(趙家緯, 2009)。

而就 NGO 而言，綠色和平組織（Green Peace）執行長 Kumi Naidou 亦認為這種協定是「對後代子孫的背叛」，因此該組織宣示，儘管哥本哈根會議落幕了，但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動看來不能有所停歇，而須號召更多公民團體積極行動，要求各國政府回應全球的「環境永續」聲音。並要透過此草根力量、思維與決策系統的改變，奪回減碳決策論述的主軸與主導權，以達成對抗氣候變遷衝擊的目標（趙家緯，2009）。

此如此令人失望的後京都機制的談判過程，若就本文性別環境觀點的思考而言，哥本哈根的談判過程中不難發現國家間對於環境安全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仍偏向環境衝突或廣義環境安全取向的論述，因此國家間在算計環境安全的考量上，不外乎思考的是國家本身的安全、經濟的永續發展以及衛生疾病議題等，因此本質上偏向零和的賽局。這點從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的過程中，處處充滿了大國密室政治而缺乏環境正義的討論，且亦彷彿僅是集合層峰國家來場金錢與政治的探戈舞會（溫麗琪，2009；趙家緯，2009；林子倫，2010b），即可以推敲出這樣的邏輯。

此外，發展中國家雖基於公平與正義而要求對等的經濟發展權力，但顯然也是在一個零和競爭的思考邏輯下。因此，就作為締約主體的國家而言，除了歐盟國家及部分海島國家能以環境安全（且以人類安全為取向）作為外交政策外，在實際談判時大多數國家都不願在無止境競爭的邏輯上有所上讓步，⁹³此外，以女性為參與主體的 NGO 也被有形無形地打壓。故從這些過程看來，這樣的場合當然連基於人類自利動機的共識也沒有，更別談其所存在的諸多性別盲現象以及要建構一個整體主義價值的環境安全理想。

⁹³此邏輯隱含著對於自然無止境的剝削亦是不變的。

第三節、小結

近年來是國際環境政治為主流的一年，相關的書籍與著作排山倒海湧現，因此，環境作為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的選項以幾乎成為共識，但放眼望去過去失敗的環境建制則可發現，對於環境安全的觀念還相當分歧。主流環境安全論述（特別是環境衝突與廣義環境安全取向），希冀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結合，以共創雙贏，但卻始終得不到良好的結果。而過去的歷屆環境會議當中，環境 NGO 對於（整體）環境安全目標倡議常常被質疑是吃飽撐著且不切實際，但經濟發展確實與環境保護之間是零和的關係嗎？答案相信已逐漸是否定的，因為不論是在經濟誘因、道德誘因還是政治誘因，都已被結合至環境保護的議程當中。⁹⁴而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並不否定經濟誘因作為環境安保護的短期手段，而只是在目標取向上，性別環境安全觀點多了份環境倫理與社會道德的關懷，而非無止境的追求經濟發展。

此外，當前亦有基於科學不確定性或者批判視角所出現的懷疑論述逐漸成為阻礙環境建制談判的因素（Giddens,2009）。而這些懷疑論者在哥本哈根會議中亦受到部分媒體的關注。從實證資料看來，此類懷疑的論述亦在一定程度對未來後京都建制將有影響，例如統計有百分之二十六的英國人懷疑全球暖化危機的真實性（Germond-Duret and Howe,2010）。

而本文認為此種論述的出現並非代表公眾對於環境問題不重視，而是對於當前環境談判的失敗，其不免認為是否因為科學的不確定，或者其根本是為西方國家服務的社群，因此在談判過程中，國家行為者根本無畏氣候變遷所可能造成的危機，而仍把經濟發展放在第一順位。因此不難理解，這樣的論述在某種內涵上仍是對於主流結構的批判，但此類論述所造成的結果即是，其可能造成草根公眾

⁹⁴哥本哈根會議中代表 NGO 發言的國際扶貧與發展機構樂施會策略總監，費樂歌女士，同時身兼菲律賓氣候變化談判國家代表團顧問，她向與會嘉賓澄清了 NGO 並非是如過去那刻板映像，其談到：「有許多人潤為，NGO 在國際談判中只會抗議和遊行，這種理解是偏面的。專業的國際 NGO 有由各類專家組成的團隊，大部分時間是在跟蹤談判，分析進展，並通過媒體與普通公眾保持跟進，一起對發達國家施加壓力，保證談判達成公正協議。」，可參閱中國發展簡報網：<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927>。

將忽略環境問題或者對於環境建制參與的冷漠，而此由主流父權現實主義架構所導致的惡性結果將會使環境不安全的結果持續加劇。

而從當前的實踐結果而言，展望未來的國際環境建制，草根力量的集結看來才是能將整體主義環境安全帶入實質的環境議程的重要因素，而草根團體的集結從哥本哈根的會議中即可發現其已儼然成形且相當龐大，但此次的會議主辦國卻透過許多手段阻擾 NGO 在議程中抒發觀點的機會（顧洋，2010），使得其無法如 1997 年京都議定書的談判過程中那般大放異彩，這也使得以女性為主體的 NGO 無法將其基於性別結構差異所面臨環境經驗，且據此而顯露出的特別環境關懷，展露成為主流。故展望未來的議程，若欲建構實質的環境安全建制（包括性別觀點的環境安全觀），草根的 NGO 組織的力量與角色絕對不能忽視（林子倫，2010b）。



第五章、結論

在第二章中，本文透過梳理當前主流環境安全的架構，並在第三章以既有的環境與安全的性別觀點出發，分別對不同的主流環境安全論述進行批判與評估，進而藉此建構出一個初步的性別環境安全論述；第四章本文透過這樣的理論視角對京都議定書進行檢視。而藉由這樣的研究過程中，本文的研究發現與結論如下：

壹、研究發現

一、梳理環境安全論述並將性別觀點納入有助於研究與決策者對環境安全的理解

梳理環境安全論述，不但有助於研究者或決策者在連結與分析當前的實際環境議程時，可透過這樣的分類易於歸納出環境議程的論述，更可據此評估性別環境安全論述的解釋與批判力，進而影響至政策領域的運作。故本文在第四章中對於當前京都機制發展的探討，即是證明這樣的理論論述的確對於當前議程的論述分析以及政策建議上都有一定程度的解釋與說服力。

而這樣的探討本文認為，除對環境安全議程有其重要的學術意義外，透過如此多方觀點的結合，將有助於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術社群有更多的對話空間，而不是分門分派地僅能在自己的花園中玩耍。例如，對於女性主義的國關社群而言，性別觀點進入環境安全的議程所涉及的議程多元性，將有助於主流國關學者與相關論述進行討論，而不論是認同也好批判也罷，透過這樣的過程，應可期待女性主義的國關理論將有更多與主流社群對談的機會，並希冀這樣的發展最終可在實際政策過程發揮影響力。

二、「實際性別利益」的環境安全視角可填補環境安全理論的性別盲

學者Molyneux（1985）曾提出的兩種性別利益取向，分別為「實際性別利益」（practical gender interests）與「策略性別利益（strategic gender interests）」。

就前者而言，指的是女性依自身的生活經驗及所面臨的問題所衍生出的各種利益取向與需求，此種實用性的利益短暫的、與現存社會結構有一定的包容性；就後者而言是指，為建構一種與當前社會不同的更公平長遠願景所形成的一種利益需

求，因此關於策略性的利益往往具有一種基進挑戰既存結構的傾向。而這兩種利益取向往往具有衝突性，因此必須有所區隔。而本論文即是採取「實際性別利益」取向作為將性別觀點帶入環境安全議程的工具，並透過梳理環境安全的分類以及建構出性別環境的安全觀點，找到一個能在當前的經驗實踐中的分析與切入點。

而此取向的論述亦可應用在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議題，例如Detraz（2007；2009a；2009b；）透過此論述的架構對許多不同的實際環境議程進行探討⁹⁵。但此種直接進入實際的議程進行解釋與提出建議的研究取向，並非代表對主流學者倡議以主流國關的本體論來進行研究的妥協，⁹⁶而是以一個較為入世的態度，提出基於性別經驗出發的環境安全觀點。且基於性別經驗出發並非代表強調女性本質的優越性，而是在一個平等與正義的價值為前提，揭露性別觀點（或女性需求）被忽視的事實，故此種「實際性別利益」取向是邁向解構當前父權結構的漸進方法，也較能夠被當前主流知識社群所接受，並增加彼此互動的機會。

此外，本文亦認為性別環境安全的論述觀點亦可與當前國際建制中關於女性環境安全的倡議相結合，例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在2006年曾談到必須重視女性視角的分析，並提出了許多以女性需求（實際性別利益的觀點）為基礎的相關研究與援助計畫；2000年的聯合國安理會1325號決議亦談到，應關切女性在戰時與一般犯罪的處境並予以重視，也同時讓女性參與不同層級的維和行動或決策會議（Cohn et al 2004:130）。故這些相關的討論隨著女性主義在國關領域逐漸有其圈地後（Sylvester,1994；2002），筆者認為這些倡議的結合，將有助於性別環境安全觀點在主流的學術社群與政策領域發揮影響力。

因此，採取一個「實際性別利益」取向的研究與策略性別利益取向的差異在於，若以後者作為推展性別環境安全觀點的核心關懷，那麼就顛覆主流結構與創

⁹⁵例如其將性別環境安全的觀點帶入非洲、拉丁美洲的生物多樣性議題，以及恆河—雅魯藏布江—梅克那河（Ganges-Brahmaputra-Meghna）水資源衝突的問題。

⁹⁶例如Keohane（1998）認為女性主義應當以當前主流的本體論出發。

設新的依歸價值而言，必然有其相當大的難度。故暫時放棄顛覆父權結構的想法，而改以彰顯性別差異與勾勒出性別盲的現象來直接提出性別實際需求，這遠比後者的途徑來的更為實際，而透過這樣觀點與對話的過程，將可豐富環境安全理論的完整性。

三、性別視角為未來建構整體主義環境安全建制的重要力量

就安全的界定而言其與兩個存在要件有關，第一為威脅的存在，因此界定威脅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次則為，安全的指涉對象為何，即是保護誰的安全。

從此兩點出發，就前者而言，傳統國際安全論者僅認為國家間的軍事與衝突議題才是威脅；而晚近的國際關係發展，似乎開始將研究的層次向下延伸，除了全球結構與國家間層次外，社會與個人的層次也開始納入國家關係的研究途徑之中，故環境破壞所造成的生命及經濟都是也終於被視為安全種威脅。但這些新的層次分析研究出現，從上一章的討論中即可知並，其並不表示國際安全論述的主體已轉移出以國家為中心的國際關係場域。

就安全指涉對象而言，而環境問題受到全球關注的同時，安全的問題即已與環境的變數結合在一起，並在科學社群的證實下，而這個大邏輯與概念被國際關係中的主要行為者—「國家」所接受 (Busby,2007)。然而，由於環境議題所處理的面向相當多元，同時，對環境問題的立即性與否、科學評估的不確定性以及外部性因素，導致在政策的轉化過程中並非如想像中的順利。從京都機制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到，這樣的結果與國際關係仍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流論述有關，因此，南北的對立，京都機制大國杯葛等現象皆是以其論述為藍圖的繪本。故即便環境問題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衝突論述受到認可，在父權現實主義的框架下，這樣的安全不是屬於整體式的安全。⁹⁷

而當前的環境安全論述，本文發現廣義環境安全的論述取向的確是主流論

⁹⁷因為在父權價值框架下的環境安全必然將如傳統現實主義安全般，處在過度發展競爭的意圖中，而其對立的立場所帶來的安全困境就如同人類與環境的對立關係，最終將帶來環境安全的困境。

述，且這樣的取向企圖達到平衡環保與發展的最終目標，例如致力推廣全球暖化知識的美國前副總統高爾，便因其不懈的努力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⁹⁸。此外，各國內外環境組織所作的宣示與努力，均揭示了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在人類未來的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另外，學術社群對於氣候變遷的合作的討論，自從 UNFCCC 自 1992 年里約地球高峰 (Rio Earth Summit) 會開始以來，有相當多的著墨 (Mintzer and Leonard 1994; Luterbacher and Sprinz 2001; Schröder 2001)，且這些研究的共同趨勢及關懷皆是針對當前環境建制在協商過程以及機制運作能否成功合作達成目標的探討 (Paterson, 2006; Hirschi, 2010)。但從其相關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中都顯示，全球氣候變遷環境建制的國際合作確實遠比一般貿易或區域環境合作來得地困難 (Ward, 1996; Grundig et al, 2001)。

而上述的結果往往被解釋為因國家會理性地估算各自的利益考量，且環境議題所具有的公共財性質，使得合作保護環境的目在本質上即難以與理性自利動機的競爭邏輯相容 (Hardin, 1968; Dietz et al, 2003)。因此，相關研究中往往多探討基於這些邏輯在京都機制中常出現的南北對立問題，以及對於自然資源管理的議題 (Germond-Duret and Howe, 2010)。因此這樣的主流分析觀點對於如京都議定書所出現以國家利益的考量為基礎而運作不良的結果，其皆認為國家行為者所重視的是平等而不損及國家利益的制度安排，故必須要解決環境安全與經濟發展互相矛盾的困境，並調和國際社會成員的利益問題才能達到全球環境合作的目標，才能使環境建制的功能發揮到最大。

但本文認為這樣的論述仍無法將當前後京都機制談判從陷入的談判泥沼中帶出來，因為此種觀點即便如其之所願，利益的安排共識達成了，但由競爭邏輯以及二元對立論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論述與資源競爭，將是後京都機制依然成效不彰並造成環境安全困境的主要毒瘤。

⁹⁸ 該獎項為 2007 年由高爾與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 (IPCC) 共同獲得。

故就未來的環境安全建制的而言，本文認為若論述主軸能導向至性別的環境安全觀點，則後京都機制將有機會能擺脫過去京都議定書的缺失，並可期待未來能建構更為整體式的環境安全。而要達成這樣的目的，在短期而言，女性賦權（empowerment）以及廣泛的談判機制參與將有其必要（Lee,2001；2002）。而如前所述，本文認為強調女性的獲權與政治參與並非是在本質主義上強調女性與環境特質接近亦或者認為女性在本質上有其優越性，而是透過許多的研究中可發現，女性在當前性別結構下，確實對於自然環境的經驗大多遠不同於一般男性（Shiva,1989；Bord 1997；Villagrasa,2002；Merchant,2005；Detraz,2009a）。故透過女性在環境建制談判中廣泛的獲權與參與所代表的意涵是，其可將自身的環境經驗與實際性別需求推展至許多的環境議程當中，進而逐步擺脫當前不公平的性別架構。但本文認為，此僅是就短期而言欲突破性別困境的途徑，若就長期而言，應不分社會性別地擺脫傳統的父權結構的優越性，⁹⁹才能建構一個較完整的環境安全。

貳、研究結論

女性與環境的論述在過去的討論中相當豐富，而這些論述與著作中其實相當多也涉獵到了一般我們所認知的安全概念，但直接針對該概念（也即是女性主義對環境安全的概念探討）上做討論的著作則幾乎沒有（Detarz,2009）。而就一般環境與安全的面向而言，以環境安全為主題或概念的相關論述亦相當地多，但由於環境與安全的討論面向實在相當廣泛，因此在界定與分類上有相當的難度，故筆者認為這亦是過去環境安全研究理論化這塊領域尚未能成型的主要原因。但隨著本研究與其他學者對此概念的理論化與整理，相信環境安全研究理論層次的討論可更有所憑藉與方向。

而女性主義在環境安全概念中的缺乏或許有些人不覺得有什麼必然的重要性，但本文檢視了生態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安全論者的觀點後發現，此兩觀點的

⁹⁹即是，不論男性或女性，皆應放棄社會性別的層級結構關係，且在此條件下，決策者就未必在國際政治中必然要強勢、理性且非道德地進行外交談判。

結合一也即是女性主義的環境安全論述，實有別於當前所歸納出的三大環境安全論述取向，不論是對於安全主體的關懷還是對於環境倫理的觀點，女性主義（本文認為其亦是強客觀的性別觀點）都有著追求共生與永續的精神，而其批判的視角亦相當深刻地點出了當前主流論述的缺失。故筆者認為除激進女性主義外，其可作為強客觀的性別觀點的主因亦在於其不論是以策略或「實際性別利益」取向為主軸的論述，皆並非追求或強調女性本質的主導力量與優越性，而是致力追求平等的理想，而這樣的烏托邦構想也與政治學所致力追求的政治平等相同，差別或許只是存在於主體性的關懷有所不同。

但無論如何，如此相同的關懷即代表著女性主義陳述女性被壓迫的事實，所追求的是更廣義的平等，而非對於主流價值的妥協。因此，對於女性主義不對主流觀點的妥協而批判女性主義不是個理論，亦或者不應成為國際關係的入流理論見解，本文極不苟同，並提出兩點觀點予以駁斥：

首先，就是否成為理論的角度而言，理論是否必須簡約或符合科學邏輯的看法本有爭議，且簡約的科學邏輯不也僅是瞎子摸象，摸著石頭過河，亦是透過部分唯心的觀點來論證自以為看或看不到的客觀事實。因此女性主義不以當前科學方法為依歸，並不能作為其不是個理論的理由。

次則，就國際關係的領域而言，女性主義入不入流亦同樣地以前者作為主要理由，但由於女性主義對於科學論證的批判已相當擲地有聲，故國關領域的主流學者，亦以女性主義的論述似乎無法作為一個議題的解決方案或政策，來作為其抗拒性別觀點的理由之一（Keohane,1998b）。而針對這樣的論述，筆者發現此觀點若就本質論述的激進女性主義與指在顛覆既存結構與規範的策略性別利益取向論述來看，其對於當前結構下的議題解決上甚少關注，因此看來十分有道理。但若從性別實際利益取向的女性主義論述觀之，則不難發現其的確有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但主流父權結構下的決策者往往都忽略亦或者評估其不具可行性。但可行性的評估本文認為是主觀的，以社會建構論的思考而言，觀念才是建構世界的主力量，科學論證觀點僅不過是其中一個觀念（Wendt,1987），因此並不應將

其視為建構所有論述的唯一依歸，從而型塑其優越性來打壓平等的價值。

故有鑑於上述的觀點，本文即以一個「實際性別利益」取向來分析京都議定書的發展，檢視在既存結構下提出主張的女性主義論述是否只徒具批判力。而由本文第四章可知女性主義的觀點的批判力確實相當深刻，且透過這樣的批判與許多相關研究證實女性對於環境的經驗有別於男性的條件下，筆者發現普遍女性（特別是被父權價值迫害）對於環境的關懷卻實有別於一般男性（特別是擁抱或得利於父權價值的男性），且這樣的觀點本文一再強調這並非本質使然，而是後天的社會觀念建構下所致（也即是生態女性主義所談的二元對立邏輯所建構），而這樣的現象的若能被彰顯而受到同等的重視時（本文提出擴大以女性與弱勢為主體的環境 NGO 以及女性決策者的賦權兩方案），平等的價值才能逐漸被建構，京都議定書的目標也才能真正被落實，故這樣的論述不就是個解決方案嗎？



參考文獻

壹、中文部分

- Aguilar, Lorena 著，陳明君、謝和霖譯，2009，〈女性與氣候變遷：脆弱性與適應力〉，《2009 世界現況：進入暖化的世界》，台北：看守台灣研究中心。譯自 *State of the World 2009 :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USA : Worldwatch Institute.
- Dyer, Gwynne 著，林聰毅譯，2009，《氣候戰爭：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最後一場戰役》，臺北：財信出版社。譯自 *Climate Wars*. CBC Radio Press. 2008.
- Flavin, Christopher 等著，周晉澄等譯，2006，《2005 世界現況：看守世界研究中心邁向永續社會進展報告》，台北：看守台灣研究中心。譯自 *State of the World 2005 :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USA : Worldwatch Institute.
- Millett, Kate 著，宋文偉、張慧芝譯，2003，《性政治》，台北：桂冠出版社。譯自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 Ballantine. 1970。
- Sachs, Jeffery D. 著，陳信宏譯，2008《66 億人的共同繁榮：破解擁擠地球的經濟難題》，台北：天下雜誌。譯自 *Common Wealth : economics for a crowded planet*. New York : Penguin Press. 2008
- Wallace, Jennifer，廖琇玉、杜欣欣譯，2009，〈氣候變遷的安全面向〉，《2009 世界現況：進入暖化的世界》，台北：看守台灣研究中心。譯自 *State of the World 2009 : a Worldwatch Institute Report on Progress Toward a Sustainable Society*. USA : Worldwatch Institute.
- 王孝勇，2007，〈女性主義立場論的主體與權力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1：89-146。
- 王秀雲，2004，〈性別與科學：一個回顧〉，《婦研縱橫》，70：1-10。
- 吳秀瑾，2000，〈什麼是女性主義科學觀〉，《南華哲學通信》，3：4-12。
- 宋燕輝，2001，〈析論波昂氣候變化會議之得與失並探究台灣參與可能模式〉，國政研究報告：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33.htm>。

- 李河清，2001，〈環境外交與氣候談判—以京都議定書為例〉，國政研究報告，
<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D/090/SD-R-090-040.htm>。
- 李河清，2007，〈國際環境政治學〉，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
台北：揚智文化，518-557。
- 李常井，2001，〈生態女性主義論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女性與自然〉，《鵝湖學誌》，
27：139-170
- 李慎明、王逸舟，2008，《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銀河，2003，《女性主義》，台北：五南。
- 林子倫，2010a，〈哥本哈根會議後的全球氣候政治趨勢〉，《能源報導》，2：5-9。
- 林子倫，2010b，〈失落的氣候正義〉，《人籟論辨月刊》，2，
http://www.erenlai.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id=3265%3A2010-03-22-06-47-09&Itemid=297&lang=tw。
- 紀駿傑，2003，〈生態女性主義：連結性別壓迫與物種壓迫的女性主義觀點〉，《女
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6：295-321。
- 崔愷欣，2006，〈京都議定書生效一週年〉，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http://blog.roodo.com/gcaa/archives/1120130.html>。
- 梁啟源，2009，〈因應地球暖化之台灣能源政策規劃建議〉，國政研究報告，
<http://www.npf.org.tw/post/2/5952>。
- 郭秀清，2007，〈國際視野中的環境安全研究綜述〉，《山東科技大學學報》
，9(2)：頁1-4。
- 陳世民，2006，「恐怖主義與大規模毀滅武器之擴散」，「恐怖主義與國家安全學
術研討會」，12月28日，桃園：中央警察大學
- 陳欣之，2003，〈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季刊》，3(3)：1-14。
- 陳劍瀾，2004，〈生態主義話語：生態哲學與文學批評〉，文化研究網：
<http://www.culstudies.com/>。
- 甯應斌，1998，〈Harding 的女性主義立場論〉，《哲學論文集》，261-296。
- 黃兆平，2008，〈國際糧食危機 聯合國援助經費支出陡增中央社〉，中央通訊
社，4/15。

- 黃競涓，2005，〈成熟無政府狀態、文明衝突論與全球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偏狹研究議程〉，《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2（1）：81-106。
- 黃競涓，2007，〈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後實證主義學派〉，張亞中(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揚智文化，117-144。
- 黃競涓，2008，「女性主義與和平研究」，「反戰與和平權論述研討會」，3月8日，台北：東吳大學。
- 黃競涓，2010，「女性主義/國關理論：若即若離抑或各行其道？」，「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5月21-22日，台北，台灣大學。
- 楊容，2002，《解構思考：讓知識動起來》，台北，商鼎。
- 談珮華，1999，〈國際能源總署的排放交易及共同減量研討會報告分析〉，《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速報》，16：4-5。
- 羅嘉薇，1996，《女性主義對當代國家安全的反思》，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鐘丁茂、徐雪麗，2007，「生態主義的興起、演進與意義」，6月8日，第八屆《現代思潮》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
- 顧洋，2010，〈參加哥本哈根會議的心得與感想〉，《能源報導》，2：10-13。

貳、英文部分

- Adger, W. N et al.2001. "Advancing a Political Ecolog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2:681-715.
- Adger, W. N. 2006. "Vulner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268-281.
- Alcoff, Linda Martín. 1997.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 Feminism, Revisited." *Cultural Critique* 36:5-27.
- Allenby, Braden R.. 2000. "Environmental Security: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5):5-21
- Ashley, Richard and R.B.J Walker. 1990.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Exile:Dissident

-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259-268.
- Austin, Jay E. and Carl E. Bruch. et al. 2000.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ke, Richard P., Hank Jenkins-Smith and Paul Slovic. 1997. “Risk perception of men and women scientis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167-176.
- Barnett, Jon. 2001. *The Meaning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cological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new Security Era*. London and New York:Zed Books Press.
- Barnett, Jon. 2003.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3:7-17.
- Barnett, Jon and W. N. Adger. 2007 “Climate Change, Human Security and Violent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26:639–655.
- Beneria, Lourdes. 2003. *Gender, Development, and Globalization: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London:Routledge Press.
- Biermann, Frank. 2000. “Science as Power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In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BCSIA) Discussion Paper*.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ogram Press, 1-20.
- Biermann, Frank. 2002” Strengthening Green Global Governance in a Disparate World Society: Would a World Environment Organization Benefit the south?”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2:297-315.
- Biswas, Asit K. 1999.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Waters: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at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15
(4) :429-441.
- Booth, Ken . 1997. “Security and self: reflections of a fallen realist.” In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ed.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 C. William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83-119.
- Bord, Richard J. & Robert E. O'Connor. 1997. "The gender gap i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The case of perceived vulnerability to risk."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8 (4) :803-840.
- Bretherton, Charlotte. 2003. "Movements, Networks, Hierarchies: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3 (2) :103-119.
- Brown, Lester R. 1965. *Increasing world food output*. USA:Washington,D.C Press.
- Brown, Lester R. 1977. *Redefining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Worldwatch Institute Press.
- Brown, Lester and Hal Kane. 1994. *Full house: reassessing the Earth's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New York:Norton Press.
- Brown, Oli. 2005. "The Environment and Our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Peace and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May 9, Tehran, Iran.
- Brown, Oli & Anne Hammill & Robert McLeman. 2007. "Climate change: the new security threa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 :1141-1154.
- Busby, Joshua W.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An Agenda for Action." *Council Special Reports* 32:1-30.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 Butts, Kent. 1999. "The case for DOD involvement i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Contested grounds: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the new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d. Daniel Deudney and Richard A.Matthew. Albany:SUNY Press,109-126.
- Buzan, Barry et al. 1998.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Colo: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Press.

- Calvert, Peter and Peter Susan. 1999. *The South, The North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Pinter Press.
- Campbell et al. 2007. "The Age of Consequences:The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 Carson, Rachel.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Riverside Press.
- Cincotta, Richard et al. 2003. "The Security Demographic: Population and Civil Conflict after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Population Action International,
<http://www.populationaction.org/resources/publications/securitydemographic/index.htm>.
- Cohn, Carol et al. 2004.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6 (1) :130-140.
- Collier, Paul et al. 2003. *Breaking the conflict trap:civil war and development policy*.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 Conca, Ken. 1994. "In the Name of Sustainability:Peace Studies and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Peace and Change* 19 (2) :91-113.
- Conca, Ken. 2001.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ed. Paul F. Diehl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Boulder:Westview Press, 225-249.
- Conca, Ken and Gerffrey D. Dabelko. 2002. "The Problem and Possibilities of Environmental Peacemaking." In *Environmental Peacemaking*, ed. Ken Conca and Gerffrey D. Dabelko. 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20-235.
- Dalby, Simon. 1999. "Against Globalization from Above:Critical Geopolitics and the 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7(2):81-200.
- Dalby, Simon. 2000. "Geopolitics and Ecology:Rethinking the Contexts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ed. Miriam R. Lowi and Brian R. Shaw. Great Britain:Antony Rowe Press, 84-100.
- Dalby, Simon. 2002. *Environmental Security*.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 Davidson, D. and William Freudenburg. 1996.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risk concerns: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vailable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8:302-339.
- Detraz, Nicole. 2007.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ruitful Intersection or Rocky Road of Incorpor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48th Annual Convention, Feb 28, Hilton Chicago, Chicago, IL, USA.
- Detraz, Nicole. 2009a.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Gender: Necessary Shifts in an Evolving Debate." *Security Studies* 18 (2) :345-369.
- Detraz, Nicole. 2009b. "Gender and Security: The Girls of Ender's Gam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50th Annual Convention, Feb 15-18th, New York City, USA.
- Detraz, Nicole and Michele M. Betsill. 2009.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For Whom the Discourse Shif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 10:303-320.
- Deudney, Daniel H. 1993. "Dividing Realism: Security Materialism versus Structural Re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2(3-4):7-37.
- Deudney, Daniel H. 1999.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 Critique." In *Contested Ground: Security and Conflict in the New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d. Daniel H Deudney and Richard A Matthew. New York Press, 187-223.
- De Wilde, Jaap. 2008. "Environmental security deconstructed" In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re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 ed. Hans G Brauch. Berlin: Springer Press, 595-602.
- Diamond, Jared M. 2006. *The Third Chimpanzee: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the Human Anima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ress.
- Dietz, Thomas et al. 2003. "The Struggle to Govern the Commons." *Science* 302:1907-1912.

- Digester, Peter. 1994. "Performativity Trouble: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Essential Subjec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47:655-673.
- Dower, Nigel. 1995. "Peace and Security: some Conceptual Notes." In *Peace: Paradigms for Global Order*, ed Michael Salla et al.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Central Queensland Press, 8-23.
- Durant, Robert F. 2002. "Whither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Post-September 11th Era? Assessing the Legal, Organizational, and Policy Challenges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115-123
- Dyer, Hugh. 2001.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en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441-450.
- Ehrlich, Paul R. 1968. *The population bomb*.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Press.
- Elshtain, Jean Bethke. 1987. *Woman and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ton, Catherine. 2010. "Do Statins Work Equally for Men and Women?" *Time Magazine*, March 29.
- Enloe, Cynthia. 1990. *Bananas, beaches & bases :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nloe, Cynthia. 2000. *Bananas, beaches & bases :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nloe, Cynthia. 2007. *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ism : feminists make the link./*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
- Esty, Daniel C. et al. 1999. "State failure task force report: Phase II findings." I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5*, 49-72.
- Falk, Richard A. 1971. *This endangered planet : prospects and proposals for human surviv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
- Fidler, David. 2005. "Transnational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Daniel Deudney's Case against Linking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16.
- Finger, Matthias. 1994. "Glob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 military." In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 ed. Jyrki Käkönen. USA: Dartmouth Press, 155-193.
- Flynn, J. Slovic P and Mertz C.K. 1994. "Gender, race, and perception of

-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Risk Analysis* 14 (6) :1101-1108.
- Folke, Carl. 2006. "Resilience: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253-267.
- Fraser, Nancy and Linda Nicholson. 1989. "Social Criticism without Philosophy: An Encounter betwee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Social Text* 21:83-104.
- Gaan, Narottam. 2000.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New Delhi:South Asia Publisher Press.
- George, Nicole. 2002. "Women's Re-Visions of Globalization:Level Playing Field or Uphill Battl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4 (2) :268-277.
- Germond-Duret, Céline and Joe Howe. 2010. "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s in light of the Copenhagen Conference:Managerial approaches and the North-South divi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51th Annual Convention, , Feb 17 -20, New Orleans, USA.
- Gever, John. 1986. *Beyond Oil:Carrying Capacity,Inc.* USA:Ballinger Pub Co Press.
- Giddens, Anthony. 2009.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UK:Pol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2001. "Demography,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ed. Paul F. Diehl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Colorado:Westview Press, 84-108.
- Gottlieb, Robert. 1993.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 D.C.:Island Press.
- Grundig, Frank et al. 2001. "Modeling Global Climate Negoti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ed. U. Luterbacher and D. F. Sprinz. Cambridge:MIT Press,153-81.
- Haimson, Leonie. 2001. "A History of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Grist Magazine*.
- Hansen, Lene. 2001. "Gender, Nation, Rap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3 (1) :55-75.
- Hansen, Lene. 2006. *Security as Practic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 Hardin, Garrett. 1968.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1243-1248.

-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N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andra. 1991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fe*.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 Harding, Sandra. 1998. *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uge, Wenche and Tanja Ellingsen. 2001. "Causal Pathways to Conflict" In *Environmental Conflict*, ed. P. F. Diehl and N. P. Gleditsch. Oxford: Westview Press, 36-57.
- Hayes, Bernadette C. 2001. "Gender,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Environment: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4 (3) :657-671.
- Held, David et al. 2000.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s read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 Malden: Polity Press.
- Hirschi, Christian. 2010. "A Climate of Change? New and Old Realiti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51th Annual Convention, Feb 17 -20, New Orleans, USA.
- Homer-Dixon, Thomas. 1991. "On the Threshold: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Causes of Acu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6 (2) :77-116.
- Homer-Dixon, Thomas. 1994.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5-40.
- Homer-Dixon, Thomas F. 1996. "Strategies for Studying Causation in Complex Ecological-Political System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5(2):132- 48.
- Homer-Dixon, Thomas F. 1999. *Environment, Scarcity and Viol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mer-Dixon, Thomas F. 2003. "Exchange." In *Violent Environments*, ed. Thomas F. Homer-Dixon et al.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89-96.: <http://www.homerdixon.com/download/exchange.pdf>.
- Indra, Doreen et al. 1999. *Engendering Forced Migr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Press.

- IPCC. 1995.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1995:Impacts, Adaptations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Scientific-Technical Analysi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 M.C. Zinyowera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PCC. 1997.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The Region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 A Special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Working Group II*, ed. Marufu C. Zinyower et al.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PCC. 2007.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07: Mitigation.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ed. O.R. Davidson et al.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son, Barbara. 1992. "The Postmodern in Feminism." *Harvard Law Review*. 105 (5) :1076-1083.
- Kaplan, Robert D. 1994. "The Coming Anarchy." *The Atlantic Monthly* 273 (2) : 44-76.
- Käkönen, Jyrki. 1994.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An introduction." In *Green Security or Militarized Environment*, ed. Jyrki Käkönen. USA:Dartmouth Press, 1-7.
- Keller, Evelyn F. 1985.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ndall, Gavin & Gary M. Wickham. 1999. *Using Foucault's Methods*. London:Sage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9a.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Westview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9b.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Contributions of a Feminist Standpoi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 (2) :245-154.
- Keohane, Robert O. 1998. "Beyond Dichotomy:Convers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emin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 (1) :193-197.
- Lee, Theresa Man Ling.2001.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Woman & Politics* 22 (3) :35-56.

- Levy, Marc. 1995. "Is the environment a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35-62.
- Litfin, Karen T. 1999.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Global Governance* 5 (3) :359-378.
- Lonergan, Steve. 2000. "Human Secu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ed. Miriam R. Lowi and Brian R. Shaw. Great Britain:Antony Rowe Press, 66-83.
- Lowi, Miriam R and Brian R. Shaw. 2000.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ed. Miriam R. Lowi and Brian R. Shaw. Great Britain:Antony Rowe Press, 1-9.
- Luterbacher, Urs and Detlef F. Sprinz. ed. 200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MIT Press.
- Manwaring, Max G. 2002. "The Environment as a Global Stability-Security Issue." In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Global Stability*, ed. Max G. Manwaring. USA:Lexington Books,165-183.
- Margaret, Mary et al. 2000. "The Changing Defin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ed. Miriam R. Lowi and Brian R. Shaw. Great Britain:Antony Rowe, 11-32.
- Mathews, Jessica Tuchman. 1989. "Redefin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68(2): 162-177.
- Matthew, Richard A. 2000. "Integrat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to Conventional Security." In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ed. Miriam R. Lowi and Brian R. Shaw. Great Britain:Antony Rowe, 33-48.
- Matthew, Richard A. 2001.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in Northern Pakistan."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7:17-31.
- Matthew, Richard A. 2002. "In Defense of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Research."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8:109-124.
- McNeill, J.R. 2000. " Biological Exchange and Biological Invasion in World History." Paper presented at 1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August 6-13, Oslo, Norway.
- Meadows, Donella H. et al. 1972.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Universe Books

- Press.
- Meadows, Donella H. and Jorgen Randers. 1992. *Beyond the Limits: Confronting Global Collapse, Envisioning a Sustainable Future*. USA: Chelsea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 Merchant, Carolyn. 1995.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 Merchant, Carolyn. 2005.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Mintzer, I.M and J.A. Leonard. 1994. *Negoti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Rio Conv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hammed, Adan A. 2003. "Women and Conflict in Darfur"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97 (30) :479-481.
- Molyneux, Maxine. 1985. "Mobilisation without Emancipation? Women's Interests, States and Revolution in Nicaragua." *Feminist Studies* 11 (2) :227-254.
- Myers, N. 1987.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Conflic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14 (1) :15-22.
- Myers, N. 1989. "Environment and Security." *Foreign Policy* 74:23-41.
- Myers, N. 1993a. *Ultimate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al Basis of Political Stability*. New York: Norton Press.
- Myers, N. 1993b.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20 (3) : 1-12
- Myers, N. 2001. "Environmental Refugees: Our Latest Understand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356.
- Myers, N. and J. Kent. 2001. "Food and Hunger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Environmentalist* 21:41-69.
- Navari, Cornelia. 2000. "Security Regimes as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regimes."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1(3):27-53.
- Newell, Peter. 2000. *Climate for Change, Non-State Actors and the Global Politics of the Greenhou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cholson, Linda. 1992.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Boundary2* 19 (2) :53-69.

- Nordas, Ragnhild and Nils Petter Gleditsch.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Conflict." *Political Geography* 26:627-638.
- O'Brien, Karen. 2006. "Are we missing the point?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s an issue of human secur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1-3.
- O'Brien, Karen L. and Robin M. Leichenko. 2000. "Double Exposure: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With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0 (3) :221-232.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ks, B. C., and J. T. Roberts. 2006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Justice." In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d. Michele M. Betsill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329-360.
- Paterson, Matthew. 1996. *Global Warming and Global Politics*.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 Paterson, Matthew. 2001. *Understand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omination, Accumulation, Resistance*. New York: Palgrave Press.
- Paterson, Matthew. 2006.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d. Michele M. Betsill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54-81.
- Peluso, Nancy Lee and Michael Watts. 2001. *Violent Environmen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on, V. Spike et al. 1992. *Gendered States: Feminist (Re)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Press.
- Peterson, V. Spike and Anne S. Runyan. 1999. *Global Gender Issue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Peterson, V. Spike. 2004. "Feminist Theories Within, Invisible To, and Beyond IR."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X (2) :35-46.
- Pirages, Dennis. 1997.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Report* 3:37-46.
- Pirages, Dennis and Theresa M. DeGeest. 2004. *Ecological Security: An Evolutionary*

- 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 . Boulder: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Press.
- Plumwood, Val. 1993.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Poovey, Mary. 1992.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Another View." *Boundary2* 19 (2) :34-52.
- Prins, Gwyn. 1990.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66 (4) :711-730.
- Rees, William and Mees Wackernagel. 1994.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Measuring the natural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economy." In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ed. M. Hammer Jansson et al.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362-390.
- Renner, Michael. 1996. *Fighting for Survival: Environmental Decline, Social Conflict, and the New Age of Insec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 Press.
- Roberts, Paul. 2004. *The End of Oil: On the Edge of a Perilous New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ress.
- Roberts, Paul. 2008. *The End of Food: On the Edge of a Perilous New World, With a new afterword*. Boston: Mariner Books Press.
- Rogers, Katrina. 1997.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3:29-36.
- Salopek, Paul. 2003. "Shattered Sudan: Drilling for Oil, Hoping for Peace." *National Geographic* 2:30-67.
- Scanlan, Stephen J. 2009. "New Direction and Discovery on the Hunger Front: Toward a Sociology of Food Security/Insecurity." *Humanity and Society* 33: 292-316.
- Scheffran, Jürgen. 2008. "Climate Change and Security."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4(2):19-25
- Schröder, Heike. 2001. *Negotiating the Kyoto Protocol: An Analysis of Negotiation Dynamics in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Münster: LIT Press.
- Sharma, S. and K. Kumar. 1998. "Impact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Climate Change: Post-Kyoto Perspectives from the South*, ed. New Delhi: Tata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61 -78.

Shiva, Vandana. 1989. *Staying Alive: Women,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London:Zed Books Press.

Shiva, Vandana. 1999. "Science, nature and gender". In *Thinking Through the Environmen.*, ed. Mark J. Smith.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 325-333.

Siegel, Lenny. 1996. "Overseas Contamination: An Open Sore in the Pentagon's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Recor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ecurity Project Report 2*:15-17.

Sjoberg, Laura and Caron Gentry. 2007. *Mothers, Monsters, Whores: Women's Violence in Global Politics*. London:Zed Books Press.

Skolnikoff, Eugene B. 2000. "From Science to Policy: The Science-Relate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MIT:1-14.
http://w3.mit.edu/globalchange/www/MITJPSPGC_Rpt46.pdf.

Soroos, Marvin S. 1997. *The Endangered Atmosphere: Preserving A Global Commons*. US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Soroos, Marvin S. 2001.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the Futility of the Kyoto Proces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 (2) :1-9.

Soysa, Indra de. 2000. "The Resource Curse: Are Civil Wars Driven By Rapacity or Paucity?" In *Greed & Grievance:Economic Agendas in Civil Wars*, ed. Mats Berdal and David Malone. Boulder:Lynne Rienner Press.

Spretnak, Charlene. 1990. "Ecofeminism:Our roots and flowering." In *Reweaving the world:The emergency of ecofeminism*, ed. Irene Diamond and Gloria Feman Orenstein. San Francisco:Sierra Club Books, 3-14.

Stern, Nicholas. 2006.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http://news.bbc.co.uk/2/shared/bsp/hi/pdfs/30_10_06_exec_sum.pdf.

Stern, Nicholas. 2008. "Key Elements of a Global Deal on Climate Change."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http://www.occ.gov.uk/activities/stern_papers/Key%20Elements%20of%20a%20Global%20Deal%20-Final01may.pdf.

- Stone, Christopher D. 2000 . "The Environment in Wartime:An Overview." In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Legal,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ed. Jay E. Austin and Carl E. Bruc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6-37.
- Swatuk, Larry A. 2005.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Palgrave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d. Michelle Betsill Kathryn Hochstetler and Dimitris Stevi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3-236.
- Sylvester, Christine. 1994. *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ylvester, Christine. 2002.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 unfinished journe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ckner, J. Ann. 1992.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ickner, J. Ann. 1997.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Troubled Engagements Between Feminists and IR Theoris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1:611-632.
- Tickner, J. Ann. 1998.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2 (1) :205-210.
- Tickner, J. Ann. 1999. "Why Women Can't Run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ccording to Francis Fukuyama."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 (3) :3-11.
- Tickner, J. Ann. 2001. *Gendering world politics:issues and approach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Tickner, J. Ann. 2004. "Feminist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Peace Review*. 16 (1) :43-48.
- ul Haq, Mahbub. 1997. *Human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 Karac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llman, Richard. 1983. "Redefining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1) :129-153.

-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me. http://hdr.undp.org/en/media/HDR_1999_EN.pdf.
- UNFCCC. 2006.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eleventh session, held at Nairobi from November 6 to 17, 2005." FCCC/CP/2006/5:1-52.
- UNFCCC. 2008. "Report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on its thirteenth session, held in Bali from 3 to 15 December 2007." FCCC/CP/2007/6:1-46.
-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2007a. "Letter dated 5 April 2007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2007/186:1-5.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CC%20S2007%20186.pdf>.
- United Nation Security Council. 2007b. "Security Council Holds First-Ever Debate on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7/sc9000.doc.htm>.
- Villagrasa, Delia. 2002. "Kyoto Protocol Negotiations: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Wome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10 (2) :40-44.
- Vital Climate Graphics. 2000.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UNEP/GRID-Arendal,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ttp://www.unfccc.int>.
- Vogel, Coleen and Karen O'Brien. 2004. "Vulnerabilit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Rhetoric and Reality." *AVISO* 13:1-8.
-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ding M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Press.

Ward, Hugh. 1996. "Game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Warming: The State and Beyond." *Political Studies* 44 (5) :850-71.

Warren, Karen J. 2000. *Ecofeminist Philosophy*. Eng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ress.

Wendt, Alexander. 1987.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3) : 335-370.

Westing, Arthur H. 1999. "Conflict versus Cooperation in a Regional Setting: Lessons from Eritrea." In *Politics and Violent Conflict*, ed. Mohamed Suliman, Ecology . New York: Zed Books Press, 273-285.

White, Lynn T. 1967.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1203-1207.

Wicke, Jennifer and Margaret Ferguson. 1992. "Introduction: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 or, The Way We Live." *Boundary 2* 19 (2) :1-9.

